

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林万菁著

万里书局出版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 1927—1948

林万菁著



万里书局

1978 • 12

前 记

好事多磨。在研究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中的甘苦，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味。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是利用极零碎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完成的，也是半工半读的心血结晶，前后费了不及两年的时间完成初稿；在研究速度上，已经是尽我最大的能力了！这原是一篇高级学位的论文，在行文上，难免“学术化”了点，但可以向读者告慰的，是写作的真诚与保存史料的信念。

论文是一九七八年一月完成的，完成后，看到方修先生的《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78年2月出版），发现其中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关于“侨民文艺”的论争有非常详尽深入的报导与论析（见该书第三、四、五章）。我在论文里对有关问题虽曾涉及，但十分精简，读者诸君如果有兴趣，还必须对照方修先生的书，才能对有关问题得出合理的结论。

至于郁达夫的离开新加坡，颇具传奇性，在论文里，我不曾详细追究，过后在潘受先生的《海外庐诗》上册卷二（线装，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71）里见到一段诗注，对郁达夫离开新加坡的经过记述得很翔实。这段诗注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达夫自新加坡围城出走，其小电船原为洪永安备，以供余与永安两家眷属用者，约定五日黎明开往邻近之苏门答腊小岛。余告知达夫及李铁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轩待发。达夫所携小行筐，衣物数事而外，有白兰地酒一瓶，牛肉乾十余块，诗韵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与大笑，酒三人，立尽之。达夫又言胡愈老等数人尚无以为计，余念与永安两家别购得西行船票，行期为六日，因商

得永安同意，将小电船坐位尽让与之，遂分途。……………

至于冯伊湄（本论文页106），在新加坡期间，据说曾任南华女中的校长，也曾任道南小学的教员，在文教界，作过相当的贡献，这是应该补充一下的。

论文第三章提到的吴天，在六十年代已经去世了。这是最近读到楼满岚写的一篇《不老的赵丹与黄宗英》（《镜报》第15期，1978年10月）才知道的。

论文初稿写完之后，屡加删增。除了王润华先生之外，方修先生、李向先生、潘受先生曾对本文作一番校阅，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将来有机会，再把全文加以修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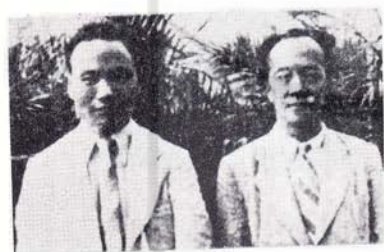


郁达夫

郁达夫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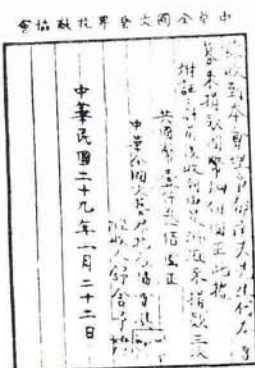
郁达夫为星洲书店题字



王纪元

胡愈之

老舍致郁达夫收据 (一九四〇年)



洪灵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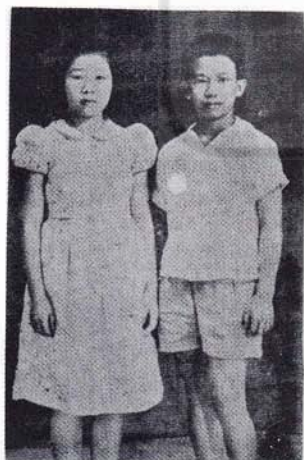


王映霞



高云览

郁达夫的儿子郁大雅与女儿郁美兰



右第一人为陈残云



海山街——当年艾芜流浪下榻处



老舍



杜运燮



老舍、杜运燮等留过踪迹的华侨中学



金山



夏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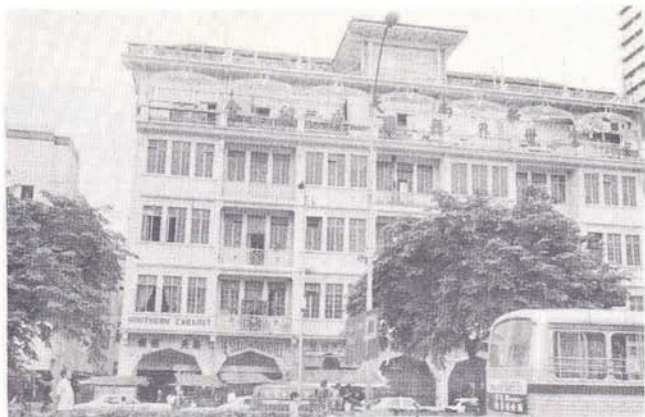
金山等演出「塞上风光」



汪金丁



岳野



南天酒楼——当年郁达夫初抵新加坡下榻处



二十年代末期的新加坡哥烈溪乾 (Collyer Quay)

敵 佔

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敵佔區之慘狀，已見諸報章，中國人民之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郁达夫来新加坡后发表的第一篇长文 (1939. 1. 1)

荒涼新禧

雄雞生機



一九三九年的希望

人類所希望者，莫過於世界之和平。人類所希望者，莫過於世界之和平。人類所希望者，莫過於世界之和平。人類所希望者，莫過於世界之和平。

南洋商報

THE NANYANG SIANG PAI

January 1st 1941 (Wednesday)

號大十日本

新

號三二五第

(三第) 日一月一十三年三十四國民華中

刊特年正

刊特年正



南洋的新時代

胡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世界大戰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中國自淞滬停戰協定簽字以來，已過了三十年。這三十年來，中國經歷了無數的變遷。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從八國聯軍到五四運動，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和挑战的時代。

戰爭中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界已進入了戰爭的時代。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在戰爭期間，各國人民都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和犧牲。然而，正是這場戰爭，也激發了人類追求和平和自由的決心。

（續前）在戰爭期間，各國人民都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和犧牲。然而，正是這場戰爭，也激發了人類追求和平和自由的決心。我們必須認識到，戰爭只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我們應該通過對話和協商來解決國際爭端，而不是通過武力。

（續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戰爭只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我們應該通過對話和協商來解決國際爭端，而不是通過武力。在戰爭期間，我們應該保持冷靜和理智，不被敵人的挑釁所動搖。

（續前）在戰爭期間，我們應該保持冷靜和理智，不被敵人的挑釁所動搖。我們應該團結一致，共同抵抗侵略。我們應該相信，正義最終會戰勝邪惡，和平最終會到來。

戰爭中的新機

雖然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也為人類提供了新的機遇。在戰爭期間，科學技術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許多新的發明和發現都是在戰爭期間產生的。這些發明和發現不僅改變了戰爭的面貌，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續前）雖然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也為人類提供了新的機遇。在戰爭期間，科學技術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許多新的發明和發現都是在戰爭期間產生的。這些發明和發現不僅改變了戰爭的面貌，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續前）雖然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也為人類提供了新的機遇。在戰爭期間，科學技術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許多新的發明和發現都是在戰爭期間產生的。這些發明和發現不僅改變了戰爭的面貌，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續前）雖然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也為人類提供了新的機遇。在戰爭期間，科學技術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許多新的發明和發現都是在戰爭期間產生的。這些發明和發現不僅改變了戰爭的面貌，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續前）雖然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也為人類提供了新的機遇。在戰爭期間，科學技術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許多新的發明和發現都是在戰爭期間產生的。這些發明和發現不僅改變了戰爭的面貌，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新		新	
（三十三年正月）		（三十三年正月）	
第一版	南洋商報	第一版	南洋商報
第二版	南洋商報	第二版	南洋商報
第三版	南洋商報	第三版	南洋商報
第四版	南洋商報	第四版	南洋商報
第五版	南洋商報	第五版	南洋商報
第六版	南洋商報	第六版	南洋商報
第七版	南洋商報	第七版	南洋商報
第八版	南洋商報	第八版	南洋商報
第九版	南洋商報	第九版	南洋商報
第十版	南洋商報	第十版	南洋商報

胡愈之在新加坡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8
一	研究的目的是与方法	1—3
二	研究的对象——“中国作家”的概念	3—7
三	局限于1927——1948年的意义	7—8
第二章	中国作家南来新加坡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9—16
第三章	1927年至1937年中国抗战前南来的中国作家	17—35
一	洪灵菲	17—19
二	老舍	19—22
三	艾芜	22—25
四	吴天	25—34
五	其他	34—35
第四章	1938年底南来的郁达夫	36—61
一	初到新加坡	36—37
二	编务种种	37—43
三	婚变	43—48
四	扶掖青年	48—53
五	抗日救亡活动	53—56
六	在新加坡留下的作品	56—61
第五章	1940年底南来的胡愈之	62—82
一	主持报馆笔政	62—68
二	其他重要活动	68—73
三	在新加坡留下的作品	73—82

第六章	1937年中国抗战后至1941年南来的其他中国作家	83 - 106
一	高云览	83 - 87
二	金山	87 - 89
三	王纪元	90 - 94
四	杨骚	94 - 96
五	王任叔(巴人)	96 - 101
六	沈兹九	102 - 104
七	陈残云及其他	104 - 106
第七章	1945年至1948年南来的中国作家	107 - 115
一	杜运燮	107 - 111
二	夏衍及其他	111 - 115
第八章	中国作家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	116 - 131
一	沟通中、新文艺并鼓舞马华文坛	116 - 118
二	几场论争	118 - 127
三	偏重社会性的文学观	127 - 130
四	结论	130 - 131
第九章	中国作家对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	132 - 140
一	筹赈救亡、一呼百应	132 - 135
二	传扬新思想、铜丸走板	135 - 137
三	是作家,也是社会运动家	137 - 139
四	结论	139 - 140
附注		141 - 183
参考书目		184 - 198
后记		199

第一章

引论

一、研究的目的是与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越来越多。一些汉学家甚至关注中国大陆以外以华文写作的地区的文学发展。近些年来，日本及西方学者都很注意搜集马华文学的资料，进行一些尝试性的研究。¹当然，由于地域及资料流布的限制，由新马地区以外的人来研究新马地区的文艺历史与演进是不很方便的；一来他们对材料不一定收罗得足够，二来他们对材料的真伪及有关的故实不一定熟悉。²为了探究出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一段与中国文学最有关系的历史，我在导师王润华先生的鼓励下，就地取材，选定了一个综合性的论文题目：“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

在这论文里，我所要探究的，是南来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在新加坡的生活、工作，及所写下的与本地有关的文学作品，同时总结出他们对新加坡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想上的影响。这种探讨，是初步性的综合研究，是前人或目前的其他研究者还未真正做过的。正因为是初步性的研究，筚路蓝缕，必须先确定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力求翔实而注重客观的归纳。至于全部的研究，可以预见不免有资料阙失或论述欠周的缺点。这是每一种初步性研究所不可避免的情形，我无须讳言，但愿其他研究者戮力匡正，而自己更应该正步于来兹！

我研究的目的，大致是：

一、从零散的史料里，找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时间限于1927年到1948年）前来新加坡的中国作家有那一些。至于怎样才算“中国作家”，在下一节“研究的对象”里将详细讨论。

三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作家，为什么要迢迢千里地南渡？我必须找出他们南来的外在与内在的原因。当然，本论文不是历史报告，不可能把太多篇幅放在历史的追溯，但中国作家的南来，确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四这些中国作家南来后，似乎都居留不久，短则几个月，长则三五年，究竟是因为什么？在这论文里，我必须涉及这个彰著的事实，从他们的生活、活动与影响各方面探究出这问题的答案。

五在这些中国作家留驻新加坡期间，对于新加坡当地的文艺活动与文化思想方面，究竟起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一时性的，还是余波荡漾？

六从有关作家在新加坡的生活与活动资料考察，再结合当地文艺发展的起伏消长，不难衡量出中国作家在马华文艺界的地位，也不难比较出他们与当地作者及当地文艺的相互关系。

至于研究的方法，主要从旧报章里找原始资料，点点滴滴地找出有关的作品或报导、评论，再访问对有关作家有认识或比较熟悉该阶段历史的前辈，获取一些珍贵的口头资料，综合比较，串连排比，从而使研究具体化。由于这是一篇文学研究的论文，我不希望太强调有关历史的问题，也不希望仔细描述若干历史事件。我希望把中国作家在新加坡时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加以突出，使人们了解他们来新加坡后与来新加坡前有些什么异同。我准备发掘出他们在新加坡时作出的贡献，从而分析他们带来的影响。正如威利克 René Wellek 与华伦 Austin Warren 两位教授告诉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莎士比亚？我们主要的兴趣显然不是在于他与其他人相同的那一方面，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任何人；我们也不在于研究他与所有英国人、所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所有伊利莎白时代的人、所有诗人、所有戏剧家、或者甚至所有伊利莎白时代的戏剧家的共同点，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将象研究 Dekker 或 Heywood 一样。我们是要发现莎士比亚的独特所在，是什么使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而这无疑地是一个有关个人特质 (Individuality) 与价值 (Value) 的问题。即使是研究一个时期，一个运动，或一个特定的国家文学，研究文学的学生的兴趣是把它们当为具有若干独特形象与性质的个体加以研究，而这些独特的形象与性质使有关个体不同于其他类似

基于上述的出发点，我不能单单平面地铺叙中国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相反的，我必须从研究中，寻找出中国作家与当地作家不同的特质与面貌。

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涉及的对象与范围都比较广泛，如果单单研究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把它们孤立起来，将使这个研究变成偏狭而失去原来的意义。而且，局限于一个人或一篇作品，将没法展示整个文学图景。除了老舍、艾芜等之外，中国作家到新加坡来，仿佛是结群而来或相继来后联成一气，有共通的工作范围与作风，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前一年最为明显。就这样，他们组成一“代”(generation)。这一代，是不同于往后的任何一代的，而这之后，再也没有中国作家南来了，更不可能组成“代”了。⁴为了探究出这其中的奥妙，我披沙拣金，找出他们南来前与南来后的相互联系，然后尝试解释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吃重的。因为，足资参考的同类材料几乎没有。象郁达夫，历年来都是汉学家研究的热门对象，Anna Doléžalová、Jaroslav Průšek 布鲁克、Gary Melyan 梅其瑞及铃木正夫等都曾写过有关郁达夫的专论，但他们集中研究郁达夫的一生作品或追探郁达夫的死因，对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的生活与作品，其实着笔极少，论述极简。至于胡愈之，时至今日，仍没有一篇专门研究他的论文，虽然郑振铎写过一篇《忆愈之》⁵，李立明写过《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⁶，所谈也是胡氏在中国及香港的生活，对他在新加坡的生活只是一笔带过。至于其他作家如王任叔、杨骚、夏衍等在新加坡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人纪录，罕为人知。在“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情况下，我抱了尊重前人、发掘史料的决心，采铜于山，毅然地向前摸索，凝聚概念，扩展思路，开始这项意义深长的研究。

二、研究的对象——“中国作家”的概念

本论文所指的“中国作家”，只限于现代文学的作家，换言之，是五四运动以来从事新文学活动的作家。那些旧文学作家或从事旧文学创作的中国作家，即使曾经来过新加坡，一概不列为研究的对象。不过，这里触及的问

题，是怎样在芸芸的南来的所谓“作家”或所有马华新文学作家里分辨出我们的研究对象？为了方便论文的论述，我不得不把“中国作家”的概念加以釐清：

一“中国作家”在本论文是不作泛指，并不是凡从中国来的“作家”都可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如果这样，就战前来说，来自中国的作者群比比皆是。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变成没有界线了。因此，所谓的“中国作家”，必然是对“新马作家”而言，他们的身份是属于中国本土而不属于新马地区。这是从比较得出的概念。

二“中国作家”必须在中国时就已经知名（当然，并不是以出书的多寡来衡量），从事过文学运动。照例的，他们都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列入有关的史料里，不容混淆的。譬如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巴人）、杨骚、洪灵菲、老舍、艾芜、夏衍、杜运燮等都是人所共知的道地的中国作家。虽然一些研究者偶然间把他们的一些作品归入马华文学史之中，那其实只是尊重他们在该时期为马华文艺耕耘的成绩，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贸然称他们为“马华作家”。

三本来新加坡之前是作家，但文名还不彰著，来后继续写作，回中国后则成为全国性作家者如吴天、高云览等，我们也列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毕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作家。至于其他南来的一大批的文化人，可能在报界、教育界、商界服务，间或有所写作，而后也回国，但他们在中国文艺界并不算作家，这些文化人我们就不列为研究对象，如张楚琨等。

四“中国作家”既是中国的作家，倘非意外，当是会从海外回国的。在我们所要论述的研究对象里，除了郁达夫不幸死于苏门答腊（1945年8月）外，其他的中国作家，几乎都回中国。那些来自中国，然后落根新马，不再回返中国而在新马继续文艺事业的如林参天、铁亢（郑卓群）、李润湖（宋千金）、韦晔（上官豸）、刘思、杏影（杨守默）、丘絮絮、以今、柳北岸、李汝琳、范统（王秋田）等等，都只能说是新马华文作家，而不能称为“中国作家”。

五至于那些从新马回中国（不论原本生于新马或生于中国或其他地区）的马华作家，在新马虽然有著作，但回国后便不见再有作品，当然不能算

“中国作家”。这类例子颇为普遍，如曾圣提、戴英浪（田坚）等是。

六另外有一些不属于全国性的中国作家，但在中国某个地区是有卓越成绩的地方性作家，如岳野、米军等活跃在华南地区，但论全国的文艺活动，自然无法与前述的洪灵菲、杨骚等相提并论。又如汪金丁、马宁，来前在上海北平一带有文学活动，但文名也不能与郁达夫、巴人并列。基于他们是中国某一地区的知名作家，在论文里当然仍得提到。

釐清了“中国作家”的概念，接着是确定那一些作家应该列为研究的对象。这也是相当棘手的，因为从来还没有人比较全面地把南来的真正的中国作家集中起来统计，系统地加以研究。几位研究马华文学发展史的重要学者，在提到中国作家南来时都是顺笔带过，所说的对象或则泛指，或则例举，概括性不大；只要比较之下，不难发现其中的出入。以下将方修先生、李汝琳先生、苗秀先生、赵戎先生、王赓武教授五位的说法胪列如次：

一 方修先生在《马华新文学史稿》内往往个别提到某某作者南来，但特别集中起来提名的是在谈到马华文学繁盛期（1937—1942）时指出：“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文人由上海各地先后南来”；他举出了铁亢、叶尼、金丁、一倩、郁达夫、王任叔。⁷在谈到1940年初及1941年11月的文学阶段时，又说：“中国成名作家南来，这时候算是为数最多的”；他举出名字的有胡愈之、王任叔、王纪元、陈残云。⁸方修先生说从上海各地来的“文人”，范围很广，并不特指他们的身份属于“中国作家”。

二 李汝琳先生在1960年8月18日南大中国语文学会举办的“马华文艺的发展路向”座谈会上主讲《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他说：“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有一批作家如许杰、马宁、吴天等陆续南来，七七事变之后，又有一批作家如郁达夫、巴人、杨骚、陈残云、金丁等陆续南来，便助长了马华文艺运动的发展……”⁹李汝琳先生举出的作家有许杰、马宁、吴天、郁达夫、巴人、杨骚、陈残云、金丁八个名字。他用“如”、“等”来概括其他未提到的中国作家。

三 苗秀先生在他的《马华文学史话》里指出战前在新马两地留居过一个时期的“较有名气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为数不少。他把他们分为两类：一

类是在居留期间没有什么文艺活动，不曾直接参加马华文学运动，如老舍、洪灵菲、艾芜；另一类是在居留期间不但没有中断创作，而且实际参与当地文艺活动，直接推动当地文运，如许杰、郁达夫、杨骚、巴人、陈残云等。¹⁰ 苗秀在1960年南大“马华文艺的发展路向”座谈会上主讲《马华文艺的创作方向》，指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很好，结果一些文艺工作者便到马来亚来。加上战前南来一批作家，他们自成一个集团。这些人包括汪金丁、胡愈之、丁家瑞、杨嘉、白寒、陈北平等人”。¹¹ 统括苗秀先生所举的作家，共有老舍、洪灵菲、艾芜、许杰、郁达夫、杨骚、巴人、陈残云、汪金丁、胡愈之、丁家瑞、杨嘉、白寒、陈北平十四个名字。

四赵戎先生在《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一文里提到南来的中国作家名字最多。在“九一八国难时期”之下，他提到的“南来作家”名字有许杰、马宁、林参天、丘家珍、陈如旧、丘康、铁亢、王哥空、李润湖、吴天、文翔、英浪、孟尝。¹² 在“七七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之下，提及的南来作家名字有郁达夫、金丁、张一倩、巴人、杨骚、陈残云、上官豸。¹³ 他又提到金山、王莹主持的中国剧团南来，刺激了剧运。¹⁴ 在“从光复到一九四九年紧急法令颁布后的活跃期”下，举出的“南来文人”的名字有夏衍、马宁、米军、韩萌、丁家瑞、白塔、白寒。¹⁵ 在《论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一文里又提到三十年来的马华文学运动史，大半是南来作家们所写下的。他举出的例子是许杰、马宁、林参天、郑文通、吴天、金枝芒、铁抗、金丁、郁达夫、张一倩、陈如旧、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丘家珍、杜边、韦晕、絮絮、夏衍、韩萌、米军、李汝琳、李星可、汉素音。¹⁶

五王赓武教授在《马华文学导论》一文里虽然没有明确地举出南来的中国作家的名字，但所说的情形，却也与上述几位学者的说法互为表里，对有关作者的身份及工作说得相当坦白。他认为三十年代稍后的日子大部份的作品都是那些被驱出境的人，教员，和新闻工作者所写的，他们只在本地住了三五年。……………”。¹⁷

以上诸说，赵戎所说范围最广，他连丘家珍、陈如旧、丘康、铁抗、王哥空、李润湖、上官豸（韦晕）等都与马宁、许杰并列，显然是着眼于“从

中国南来”的“作家”，并不特指“中国作家”。至于苗秀，把白寒、杨嘉、陈北平等与胡愈之并列，也是与本论文所举出的概念有出入的。我们总不能说凡从中国来的会写作的人都是中国作家。¹⁸ 即使方修先生在谈郁达夫等南来时，顺带提及铁抗、一倩，也容易使人混淆。其实，方修先生是泛指从上海各地南来的“文人”而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来而后成为马华作家或只在逗留新马期间为马华文艺努力（来前及回后都在写作上寂然）的作者，在当时是与中国作家并肩耕耘的。在“由中国来”的这一根源上，彼此很相似，但往后的情况则不能混为一谈。为了探讨的方便，我们对“中国作家”的界线不能不严格规定。综合学者们提到的作家及自己的发掘结果，符合“中国作家”的涵义而适合作为本论文研究对象的有：

洪灵菲、老舍、艾芜、吴天（叶尼）、郁达夫、胡愈之、高云览、沈兹九、杨骚、王任叔（巴人）、金山、王纪元、陈残云、杜运燮、夏衍。”

此外，也得提到过客式的巴金、徐志摩，旁及马宁、汪金丁、冯伊湄、王莹、岳野、米军等。

三、局限于1927—1948年的意义

中国作家南来新加坡，源远流长。五四运动以前，许多擅长旧文学写作的中国文人即曾来过新加坡，康有为（1858—1927AD）、梁启超（1873—1929AD）是为人熟知的例子，黄遵宪（1848—1905AD）、邱菽园（1871—1941AD）更是其中的佼佼者。²⁰ 不过，中国新文学作家南来新加坡，且在新加坡稍住的，可考的是从1927年开始。我选定1927年为研究范围年代的启始，为的是第一个研究对象洪灵菲是在1927年逃难到新加坡的。而且，1927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前的这段时期，是中国作家南渡的第一个热潮。至于选定1948年为研究范围的终线，为的是1948年新马颁布了“紧急法令”，许多南来的中国文化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影响，被遣回国。这之后，中国新文学作家几乎没法子南来了。所以，1948年是一个分水岭。一直到五十年代，有若干中国知名作家由台湾或海外前来新加坡，如林语堂（1895—1976AD）被聘来南洋大学任校长，但也只是短暂的日子。²¹ 而后有凌淑华、苏雪林到南洋大学任教，²² 谢冰莹1958年也曾来

过。²³我不把研究扩大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为的是谈中国作家南来，不能漠视他们南渡的时代背景。林语堂等的南来，与战前及战后初期南来的中国作家，情况截然不同。我选择1948年的另一个意义，是隔一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方面的作家与文艺发展都与“解放”前同样，中国作家不需要或者不可能南渡新马。在1948年，恰逢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还在争论阶段，而且当时中国作家仍有南来的可能，定它为本研究的终线，应该是既合理，又具有历史意义的。

其实，方修先生在谈到中国作者南来时，曾经指出几个年份是特别大批的：

一1927年北伐失败，宁汉分裂，国民党在中国各地进行“清党”、妄杀无辜的时候。当时很多知识份子纷纷从厦门，汕头，海南岛各地南来，形成一阵移民的大浪潮。

二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到1942年星马沦陷的时候。多数是从华中、华南各沦陷区避难而来的。

三在日本投降后以至中国发生内战的时候。当时有的由印度，缅甸，安南，暹罗各战区复员来马，有的是因内战关系亡命海外，原因比较复杂一点。²⁴

既然截至中国内战结束前，还是中国作家南渡的时期，把有关的三个时期合在一起，从1927年研究到1948年，正好概括了中国作家南渡新加坡的历史阶段。

第二章

中国作家南来新加坡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釐清了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下来必须检讨中国作家南渡的时代背景与目的。在这论文里讨论到的中国作家，在当时及稍后的中国文艺界几乎都是建树斐然的人物，尤其是郁达夫，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是响当当的小说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晚出，名望不很彰著，譬如刚从日本留学结束，未回国而先到新马的吴天（叶尼），以及原籍福建的高云览等。不论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名望是大是小，他们到底是迢迢千里地南渡了。为什么他们要去国南渡？是为了游山玩水？还是为了移民久住？

在客观上与主观上，中国作家所以南渡新马，绝不是无牵无挂地为了遨游异邦，更不会是为了远走他乡，易地而居的。除了聂绀弩、徐志摩或巴金等路过上岸；在新加坡逗留片刻的一类中国作家，其他南来新加坡的中国作家可说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如果不是出于不得已，实在不会离开北国，到这长年盛夏的热带之岛。他们或则出于个人忧患，或则出于为国输将，总之，万方多难、劫运浩大的时代，促使他们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而企图保全一芥性命，竭力救难，或者发挥力量，慷慨呼吁，以“纸弹”配合“子弹”，‘求一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因此，在本质上，1927年到1948年间南来的中国作家与一般在中国无法立足，或在政界、文教界失败落魄而来的其他“文化人”不同，更与一般为了经济因素，图谋生存的闽粤移民不同。中国作家的南来，几乎都是暂时性的。他们南来后，在文化圈内居要职（象郁达夫、胡愈之都是大报编辑），即使是服务教育界（如巴人、高云览、杜运燮等），也仍孜孜地为文化事业戮力耕耘。

在上一章的引论里，我已经说明为什么把探讨限制在1927年到1948年这二十一年之间。现在把这二十一年分为三个时期，分别说明中国作家南来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第一个时期：1927年—1937年中国抗战前 这时期南来新加坡的中国作家计有洪灵菲、老舍、艾芜、马宁、吴天等。

第二个时期：1937年中国抗战后—1941年 这时期南来新加坡的中国作家计有高云览、郁达夫、胡愈之、王纪元、沈兹九、杨骚、巴人（王任叔）、金山、陈残云等。

第三个时期：1945年—1948年 这时期南来新加坡的中国作家计有马宁、杜运燮、夏衍等。

其中1942年2月—1945年8月为日本占领新马时期，中国作家一概消声匿迹，中国作家南渡暂时中断。

第一个时期1927—1937年中国抗战前

一时代背景：

1 北伐后局面危乱紧张，国土不安。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南北混战，屠刀遍地，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无一宁日。1926年7月开始著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²，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成为西方列强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武汉，则以汪精卫为首主持另一国民政府。这就是所谓“宁汉分裂”。未几，国民党举行“清党运动”，国共进入内争，许多作家都被迫流亡。³在1928年初，郭沫若、茅盾已经亡命日本，成仿吾也出走法国，郁达夫则脱离创造社。1928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国势日危。1929年武汉反中央失败，1930年7月湘赣共党乱炽。早在1927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经酝酿筹组。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民生日困。夏衍、冯乃超等到上海与鲁迅策划左联成立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⁴当时，许多左翼作家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新军阀盘据的局面下，中国黯云密布，而日本蠢蠢欲动，真是风雨满楼。洪灵菲、许杰都是直接受环境驱迫而南渡的中国作家，倘若时局没有那么紧缩，他们断不会远道流亡的。马宁在1930年南渡，先在马来亚檳城，后下新加坡，约在1936年左右回去，直到战后才二度南来。他在抗战前夕回去，可见与一般逃难的文化人截然不同。说到艾芜，则早在1925年秋已经离开中

国，当时时局尚缓，但1930年辗转流浪到新加坡，在1927、1928、1929几年间也没有回国，大约也是知道时局太坏，无处藏身。至于老舍，本想回国，不料却转道新加坡，顺便留下半年。他离开英国时是在1929年中，大约也知道国内一时纷乱，所以决定暂时飘泊海外，其实他并没有移居南洋的任何打算。

除了洪灵菲、老舍、马宁等作家的蛰居新加坡，当时有大批知识份子因为受宁汉分裂事件波及而从闽粤各省避难南来，散居新、檳各地，然后加入马华文艺行列，以致成为马华新文学的一批生力军。⁵ 后来他们落脚不回，归化为新加坡或马来亚公民，渐趋老熟，成为有贡献的马华作家。他们虽然来自中国，但已经不算是中国作家，本文不列为研究对象。

2 中国内战频仍，外患催紧。 1931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沈阳事变），东三省丧失。1932年1月28日，爆发“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争）。日本的军事侵略，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抗日运动很快扩大，一致对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是，南京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两百万大军忙着剿匪，丧权条约订了一个又一个（如1933年著名的“何梅协定”），监禁杀害爱国军人、抗日志士，政治气压的低沉臻于极点。1934年，废帝溥仪出任“满州国”的傀儡皇帝。1935年，殷汝耕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1935年底，北平学生发动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争取民主”。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导致国共重新合作，内战方告停火。在这之前的两个月，鲁迅逝世，左翼作家联盟也自动解散。这时的中国，纵是万马齐瘖，满目疮痍，也要面临强敌，决无其他选择。

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前从中国本土南渡到南洋的知识份子或半知识份子为数不多。这是由于1933年马来亚公布“外国条例（The Aliens Ordinance of 1933）”，禁止男性移民，祇准女性及儿童入境影响所致。这种限制，一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才有所改变。⁶ 吴天（叶尼）1936年中到马来亚，1937年到新加坡；他并不是从中国本土来的，而是在日本留学后经过这里而留下一段时期。他的本意，不过

是办完一点小事就走，不料却住了下来，而且教书、编副刊、写文章、搞戏剧，为马华文艺尽了很大的推动力量，这是始料所不及的。倘若不是时局的巨变，他是没有理由在新马呆下的。

三目的：

综合有关作家南渡的情况，探究出他们来新加坡的目的是：

1 避难逃亡。 国不容身，只好去国。象洪灵菲，当时根本是被追缉的一个作家。在那个军阀统治的局面下，作家不甘依附权势，只好避其锋刃，蜷居千里海外。象老舍、吴天之不直接回国，相信也是鉴于国内的骚扰不宁。

2 寻求生计。 既然身在海外，以本身的条件，也必须求一生路。当时中国之外，有华人聚居并发展的地区，除了香港、中印半岛，最发达的要算新马地区了。艾芜所以一路流浪，从北到南，由缅甸经暹罗（泰国）南下，最大目的是定一安身之地。不过，情格势禁，终究也被遣送回国。⁷至于老舍，所以前来新加坡及逗留下来，据他自己所说，原因是：第一，钱只够到新加坡；第二，久想看看南洋。⁸他是坐三等舱到新加坡的，⁹可见经济情况并不宽绰。在航程上，既然没法直透中国，于是顺道逗留在这远东的直布罗陀——新加坡了。可惜，结果老舍找不到旁的事做，只在华侨中学教书。¹⁰

3 寻找写作材料。 老舍到新加坡的一个目的是寻找小说的材料。他当时创作热情很高。他本想写一部反映华侨奋斗的血泪史式的小说，不料由于种种客观条件与主观限制，未能如愿，根本无法广泛蒐集到材料，于是退而求其次，就切身生活所及的小圈子，发掘一个孩子的故事，写下《小坡的生日》。¹¹

4 发展海外文艺。 吴天当初来新马的目的，据他自己提及是办一点小事，究竟什么事，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不是来这里观光养病。¹²不料来后被这里朋友的热情感动，¹³于是合力推动文艺，变成在海外协助发展文艺的成功例子。当然，倘若他自己无心于此，即使这里的朋友怎么留他，相信也留他不住的，因为那时已是抗战前夕，不久就全面抗

战，照理他更应该及早回国才对。恰恰相反，吴天一直逗留到1939年初才回去中国。

第二个时期1937年中国抗战后—1941年

一时代背景：

1 政治前途阴暗，国土沦丧。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对中国发动正面性的大规模侵略，中国迅速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三”事变，上海告急，终于沦陷。日本占领上海后又占领南京。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出南京，退到重庆。1938年中日武汉大会战，后来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不久厦门也陷落。汪精卫在1938年11月离开重庆，1939年公开投敌，1940年在南京成立汪政权。自从“八一三”淞沪战争失败，许多作家都从上海撤退到内地去，越退越下。¹⁴ 1939年6月，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日本军事攻势加紧，许多爱国者被秘密逮捕及处决。从1939年以后的两年，军事抗战可说是停滞在相持状态，而政治抗战则逐渐退后。全国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一直发展到1941年1月严重的最高点，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摩擦达最高潮。¹⁵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1941年成为抗战期中最黑暗的一年。¹⁶ 屠杀日盛，国是日非，内外煎迫，腥风血雨，民不聊生。中国作家的南渡，都在1941年底以前。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战争，战区大为扩大，中国之外的东南亚地区，也无宁日，无一寸净土了。

2 后方宣传支援，至为迫切。 作家而能拿枪杆上战场的为数微乎其微。抗战初期，还有若干文人敢于上战场，以获取宝贵的实战经验，但郭沫若、田汉等到过的浦东战线，其实初期是根本没有战事的，一俟有了战事，战线一天数变，连参谋处都应付不暇，再也不可能让文人去观战了。¹⁷ 既然作家上前线是很难办到的事，退而求其次，他们都在后方负起“精神动员”的工作，以笔杆代枪杆，以纸弹代子弹。本来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中国文艺界大体分为三个阵垒：聚集在重庆一带的是一个；聚集在所谓的“苏区”的延安是一个；聚集在日治沦陷区的上海的又是一个。¹⁸ 随着局势的剧转，留在上海的作家（如周作人）变成吟风弄月，脱离战火的

时代，提倡一种不关抗战的文风，”其他作家如郑振铎、胡愈之、巴人（王任叔）等，都相继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当时，退向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或投向苏区，是中国作家的两大退路。苏区并未稳固建立，白区又诸多危机，一些作家于是从大西南（昆明、桂林、重庆）退向香港这个大后方。香港一时成为文化据点。1941年底香港沦陷，成为孤岛，一些作家又突围回到大西南。

照上述情形分析，退向后方的作家可说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在无路可走的情形下，在局势逆转之前，他们就从香港转道到更后的后方——新加坡和马来亚来了。其实，新马也非和平之区，烽火随时会蔓延过来。在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后，新马地区的华侨就掀起救亡热潮，纷纷成立筹赈会，慷慨输将，积极支援中国的抗战。从历史考察，没有南洋华侨的在后方支援，中国抗战也不容易争取最后的胜利。而呼吁华侨救助抗战，亟需宣传，以事实说服人心，以理论启导大众。这些任务，对于来自中国，切身体验过抗战况味的中国作家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基于这种客观需要，《星洲日报》聘郁达夫，《南洋商报》聘胡愈之、王纪元，请他们南来主持编务，也就一拍即合；因为，在他们本身，是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

三目的：

综合这个时期各有关作家南渡的情况，探究出他们来新加坡的目的是：

1 从事海外宣传。这个时期南来的中国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抱着一种在海外努力宣传抗战救亡的心理。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竟逼得要逃离战区，遁入大后方，由上海而武汉，由武汉而香港，由香港而新马（如郁达夫、胡愈之都是），目击烽火而又上不得前方。严格说来，这仍是属于“逃难”性质，所以在新马，有人指郁达夫、金丁、胡愈之、巴人等为“逃难作家”²⁰，颇多揶揄。不过实际上，就他们的表现，与当时从闽粤一带大批涌流过来的一般“文化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²¹他们不是怯懦地逃到“安全区”，更不是一味图谋苟安全命，他们更没有变节附逆。相反的，在积极方面，他们早在抗战开始时就已经负起唤醒民众的任务，在未逃难前也都已经为文化事业尽过很大力量。杨骚、高云览、王任

叔、郁达夫等都曾经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愈之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目睹“清党”的血行，悲愤之余，变成一个实际行动者，在上海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从事济难会工作，站在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反对暴力、反对杀戮。²²就立场而言，他们各有歧点，但为民族事业的大原则是不二的。

在汉口沦陷前（1938年7月），郁达夫曾经任职于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且担任汉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胡愈之与郁达夫一样在武汉军委会政治部工作。²³后来郁达夫先离开，到福州任福建省主席陈仪的参议。汉口沦陷后，文艺界议定能赴敌后者，能随军队者，能赴海外者，各尽力奔走。²⁴郁达夫和胡愈之都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赴海外。

与逃难而赴海外的情形略有不同的，是金山（赵洵）、王莹的组“新中国剧团”，他们纯粹为筹赈及宣扬新兴艺术而来，目的性似乎更强。

2 个人转换环境的需要。 就这时期南来的中国作家考察，胡愈之与郁达夫是早有南洋之思的（胡受曾到过南洋的许地山影响，郁受由南洋回国读书的温梓川影响）²⁵，他们在心理上，都对南洋有所向往。就当时南渡的情境，在作家本身来说，可能都有转换环境的需要，所以结果没有蛰处香港，而改赴南洋。如果他们不在香港沦陷前即南渡，相信也会失去机会，反而转道回中国重庆的，象茅盾、郭沫若、夏衍等便是这种情形。以郁达夫来说，他是负着心灵的创伤，带着家庭破裂的新痕来到新加坡，自己时刻梦想回返故乡²⁶，他自己感到“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²⁷，充分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境。他赴南洋的主意是在回福州的路上立定的；在“毁家诗纪”第十六首中，他说：“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于君唯一语，为侬和顺抚诸儿。”所附纪事说：“建阳道中，写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已决心去国，上南洋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其实，郁达夫虽说希望“终老炎荒”，实则仍存返国之思，时不时在论文里表示对故土的怀念。后来郁达夫在致给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信也曾透露回国之念。²⁸在映霞方面，则认为郁达夫南渡是为了逃避恶名，因为他的浪漫事迹在中国已经使他无处立身。²⁹总之，郁达夫在主观上，是希望摆脱腌脏的官僚氛围，所以抛开在中国所担任的政治部

工作，远道南来新加坡做个报馆编辑，也好清一清内心芜乱的世界。

除了郁达夫，据说沈兹九是南来养病的。³⁰ 她的婚姻生活也不愉快，在国内本与徐庆誉结婚，后来兹九不满丈夫而出走³¹，来新加坡后不久与胡愈之结婚。她来养病，恐怕只是个人理由；但如果确实，也算是出于转换环境的需要。

第三个时期 1945—1948 年

一时代背景：

和平初期，时局未见统一。1946年，国共双方在美国特使马歇尔调解下，停止内战，但不及四个月，战事又起。1946年至1949年，国共双方虽然作过多次谈判，并且发表协议、宣言，但终于因为歧见太深，合作均告失败。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各地广泛展开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随着时局的压力，文化发展紧缩，许多作家被迫纷纷流亡香港。³² 在这种情形下，南渡新马的“文化人”又是为数不少，一些知名的中国作家也一度抵达新加坡。

在新马方面，光复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抬头，争取独立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战后初期，文化事业一时蓬勃起来，除了原有的文化工作者努力耕耘之外，实在也很需要外来的刺激与滋润，这无形中为中国作家南来铺下一条路。

二目的：

这时期南来后不再回去的中国知识份子或文人，数量很多，但就本文研究对象的“中国作家”而言，却是寥寥可数。夏衍南来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私人的一点事情，实际上可能与民盟的活动有接触。逗留期间，他也主持《南侨日报》的编务，写过一些社论，发表几篇论文，为期甚短，对于当地文艺说不上有什么积极推动的目的，但关心它的现状与发展是可以肯定的。³³ 马宁二度南来，在中学里教书，时时参与文艺讨论，写作也勤，在推动战后初期马华文艺方面是比较有抱负的。杜运燮的情形也一样。胡愈之、沈兹九一和平就从印尼回来新加坡，巴人及杨骚曾回来一下子，又再返印尼，他们都继续为南洋的民主运动尽宣扬之力。至于岳野，随中国歌舞剧艺社而来，目的是宣扬新兴戏剧艺术，介绍有水平的戏剧艺术，目的倒是在提高新马民众的思想认识。

第三章

1927年至1937年中国抗战前 南来的中国作家

在上一章，通过分析，我们归纳了中国作家南来新加坡的特殊原因与目的，从而了解他们的南渡，是有阶段性的。从这一章到第七章，将分别考察有关作家在新加坡逗留期间的的生活及工作。本章集中讨论第一个阶段（1927—1937年中国抗战前）南来的中国作家。

在1927年南来的，有巴金、洪灵菲。1928年南渡的有徐志摩、许杰，后者在吉隆坡活动。1929年老舍从欧洲飞抵新加坡。1930年有马宁、艾芜南渡。1931年至1935年没有什么可记的中国作家南渡，至1936年吴天前来，居留甚久。前章叙及1927—1937年这个时期的时代背景，曾指出1931年后作家少来的原因，这主要是政治环境及移民条例所使然。其实除了这批身份属于中国文艺史的中国作家外，另外有大批的中国知识份子移居南洋，不少驻足新加坡，不再北返，以致成为当地的文化人，其中自然也不乏“作家”，但不属本文论列的对象。

一、洪灵菲

洪灵菲（1901—1933）¹，比老舍、艾芜等都早到新加坡。他并不象后来的郁达夫或胡愈之那样，有好长一段时期在新加坡从事文化工作。

毫无疑问，洪灵菲是避难而逃经新加坡的。

他本名伦修，灵菲是笔名，另有洪灵斐、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笔名，惟用灵菲的时候最多，本名反而不为人知。²他是广东省潮安县洪砂寮村人，家境贫困破落。年纪很小就随同邻近的穷孩子去拾粪、锄草、拣蔗渣等。在劳动中，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农民悲惨的处境与他们变革现实的要求。在家乡读完中学后，考进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³这学校就是中山大学的前

身。1924年，国民党改组，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了联俄容共政策。那时洪灵菲在学校中就参加了政治活动。高师毕业后，1926年进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彭泽民。⁴

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清党，发生“四·一二”事变，四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洪灵菲被通缉追捕。四月到六月间，他开始艰辛的逃亡流浪生活，从香港转赴新加坡，流亡到暹罗（即泰国），不久北返，经香港抵上海。⁵那时不过27岁。

回国后，洪灵菲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流亡》，于1928年4月15日由现代书局出版，启用“洪灵菲”这笔名。⁶这部《流亡》，是他的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曲为《前线》，第三部曲为《转变》）⁷所写是他的亲身经历，逃亡生活，传诵一时，一版再版。⁸《流亡》的主人公沈之菲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一再出现过“不死于战场，便当死于自杀”的在醇酒妇人中麻醉自己的疯狂愿望。⁹他由于持论激烈，被视为危险人物，被迫流亡，短短数月，到过暹罗、新加坡，到处流浪，到处奔波，没有同情，没有鼓励，家庭不了解他，社会给他的唯有监禁、追缉、驱逐、唾骂，他几乎陷入迷途，悲观消极。但是流亡生活使他愈加了解人生的意义和对于革命的决心，明白了那时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欺诈，以及旧社会的丑恶。为了寻求光明，他悄悄离开家庭，又走上流亡的征途。¹⁰这篇作品的时代背景是1926年至1927年。在小说内，有部份的篇幅是写主人公沈之菲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与生活遭遇。作者主要写大坡一带，包括漆木街（South Bridge Road）、吊桥头、新加坡河、皇家山脚等。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之菲晨起，立在楼前眺望，横在他的面前的是一条与海相通的河沟，水作深黑色，时有腥臭的气味。河面满塞着大小船只，船上直立着许多吉宁人和中国人。河的对面是个热闹的巴萨，巴萨的四围都是热闹的市街。西向望去，远远地有座高园，园上林木蓊郁，秀色可餐。……

街上满塞着电车，汽车，“𨋖厘”，牛车，人力车。他想如果好好地把他平均分配起来，每人当各有私家车一辆……………¹¹

由于作者只是流亡暂住，没法深入体会新加坡的生活状况，所以不曾写出太多有关材料，但对新加坡的市民生活水平及各民族共处的情形则略有反

映。

回国后的洪灵菲，于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且居要职，是七常委之一（其余六人为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¹² 他一生从事文学活动其实只有五六年时间，中间还辍笔一年（1930年左右），但留下作品相当丰富。¹³ 1933年被执就义，死时只有三十三岁。

二、老舍

老舍（1899—1966）1924年秋到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教中文。¹⁴ 1929年6月，他完成长篇小说《二马》，由于执教合同期满，便离开伦敦。¹⁵ 接着，到欧洲大陆游览，先后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玩了三个月，十月间抵达新加坡。¹⁶

在新加坡，他找不到其他事做，就在华侨中学担任教员。¹⁷ 他原来的计划是写一部以南洋为背景，以中国人为主角的《华侨奋斗史》，一反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6—1924）小说的以白人为主角。¹⁸ 可是，当他着手找材料时，发现如果要深入地去了解华侨的情况，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得在城市中研究经济的情形。

二得深入马来亚腹地，观察老华侨的生活，并探听他们的历史。

三得学会广东话，福建话与马来话。¹⁹

老舍本是北方旗人，要学广东话、福建话一时并不容易，更不必说学马来话了。至于时间与金钱，都不容许他到各处观察。他有点心灰意冷，感到“梦想眼看着将永成为梦想了”。最后，退而求其次，他决定动笔写《小坡的生日》：

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我爱小孩，我注意小子们的行动。在新加坡，我虽没工夫去看成人的活动，可是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各种各色的小孩，是很有意思的，可以随时看到的。下课之后，立在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两个中国的或马来的小儿在林道或路畔玩耍。好吧，我以小人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²⁰

这是一部童话小说。虽然内容简单，可是，创作过程也很多障碍。他上半天在树荫下，坐在电扇上上课与改卷子上，下半天天气大热，非四点以后不能作什么。于是天凉下来就写一点。老舍自己回忆当时写作的情景，自感进屋凉快，因为“一边写一边得驱赶蚊子”，而且“老鼠与壁虎的捣乱也使我心中不甚太平”。何况热带的情调，使人意兴阑珊。他说：

屋外的虫声，村中吹来的湿而微甜的晚风，道路上印度人的歌声，妇女们木板鞋的轻响，都使人觉得应到外边草地上去，卧看星天，永远不动一动。这地方的情调是热与软，它使人从心中觉到不应当作什么。我呢，一气写出一千字已极不容易，得把外间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笔放在纸上。这需要极大的注意与努力，结果，写一千来字已是筋疲力尽，好似打过一次交手仗。朋友们稍微点点头，我就放下笔，随他们去到林边的一间门面的菜馆去喝咖啡了。……²¹

直到老舍离开新加坡，他仅仅完成四万字，平均一个月只写一万字多一点。结果《小坡的生日》还有三分之一要带回中国续完。这竟然是一本最使老舍满意的小书！他认为“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²²他还希望能够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因为写这样的书使他觉得年轻、快活，他愿永远作“孩子头儿”，他爱孩子，感到“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望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²³可是，直到老舍投湖自杀之际，仍没有再写出象《小坡的生日》那样以小孩为主角的小说。

《小坡的生日》在上海写完后，在《小说月报》发表。登完，单行本已打好底版，不幸被一二八的大火烧掉，到1934年才交由生活书店印出。²⁴《小坡的生日》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由一系列的小事串联成章。从第十章《生日》一直到末章《醒了》，都是叙述小坡渡生日时的遭遇。这之前，是交代小坡及他哥哥大坡、妹妹仙坡的一些生活。故事有地方风味，描写新加坡的一些情调，也描写马来族、印度族小孩的生活侧面。老舍在书中写道：

小坡所住的地方——新加坡——是没有四季的，一年到头老是很热。不管是常绿树不是，（如不知什么是常绿树，请查一查国语教科

书。)一年到晚叶儿总是绿的。花儿是不断的开着，虫儿是终年的叫着，小坡的胖脚是永远光着，冰吉凌是天天吃着。所以小坡过新年的时候，天气还是很热，花儿还是美丽的开着，蜻蜓蝴蝶还是妖俏的飞着；也不刮大风，也不下雪，河里也不结冰。你们要是送给他礼物，顶好是找个小罐儿装点雪，假如你住的地方有雪，给他看看，他没有看见过。

.....

小坡看见过的东西也许你们没有见过，比如：你们看见过香蕉树吗？小坡的后院里就有好几株，现在正大嘟噜小桂结着又长又胖的香蕉，全是绿的，比小荷叶还绿：你们看见过顶上带着肉峰的白牛吗？看见过比螺丝还大一些的蜗牛吗？.....²⁵

书中描绘了引人入胜的热带风光，时不时提到“马来巡警”、“咖喱饭”、“槟榔”、“椰子树”、“牛车”、“红毛丹”、“阿拉伯人”，又写小坡到二马路听评书——《张飞大战孔明》（原书页161）、去“植物园”（原书页111—116）等等。书的后半部穿插梦境，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创作，原来小坡生日做梦，由此结束故事。《小坡的生日》也刻划了小坡的性格：好打不平、好助人、尊敬女子和公道、天真无邪。故事以小孩子的口吻叙述，一开始便提到“小坡”的名字的由来：因为小坡是在新加坡小坡一带出生的，所以名唤小坡。²⁶此外，老舍也很细心地刻划小孩的心理。如对于种族与地理问题的瞎辩（原书页18—19）、对假期的渴望（页53）等。老舍写作《小坡的生日》，还有更大的意图。他是想借此反映一下南洋的社会。他以小孩子为主人翁，写小孩子的梦境，又让猫狗说话，所以是童话。可是，他又加进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同时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结果变成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起，成了“四不象”。根据老舍自己的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他脚踩两只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他所谓的“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就是“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²⁷确实的，老舍是以“纯真的心”去写小说，这种写作的心情也流露在老舍以后的其他创作，使人倍觉温暖。²⁸老舍本身很喜欢《小坡的生日》，他说：

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

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为耻！²⁹

老舍在离开伦敦，漫游欧陆期间及来新加坡途中，曾经写了一本《大概如此》的小说，但到新加坡后，他决定舍弃它。因为他发现所写的“题旨”距离现实太远，他已离开欧洲，目击新加坡的现实，两相比较，自然不满自己所写的东西。在教书期间，他发现英国中等阶级的学生，根本不想天下事，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学生，除天下事外什么也不想。³⁰他认为“新加坡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家中很有几个钱的，可是他们想打倒父兄，他们抓住一些新思想就不再松手”，因此，“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³¹

老舍自从在新加坡住下后，人生观与写作方向都有了改变。他不再写爱情小说，他自己说“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可见老舍在新加坡的这段短时期，正是他生命史上一个小小而重要的转换点。³²

他除了写作《小坡的生日》，教余并没有参与当地的文艺活动，并不象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的积极推动文艺。住了半年后，他觉得没有什么发展，又急于回国看看北伐后的新局面，于是在1930年4月赋归。

三、艾芜

艾芜（1908—）于1930年，从缅甸仰光经马来亚流浪到新加坡。次年当地政府驱逐回中国。³³回中国后，并没有回故乡四川，³⁴而是到上海。究竟艾芜何以被逐，详情难考。以他在新加坡时的年龄，不过是廿二岁；³⁵就他当时的思想水平，也不见得对当地会提出什么过激的言论而导致“被逐”。“被逐”的说法，或许是从艾芜自己的话来的。艾芜在《南行记》的序里曾说：“随后，放逐回国来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

候，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作于1933年11月1日）³⁶所谓的“放逐回国”，该是自称流浪归国，“放逐”与“被逐”意义并不等同。就语气上推测，也没有表示不容于新加坡英政府的意思。再从后来写的以此地为背景的小说如《海》（1947年作）考察，也没有被逐的可能。³⁷不过，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却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推断。他说：

至于艾芜怎样最后从星埠流浪到上海来的，有人说是他被放逐回国的，详情情形则讳莫如深。他在《人生哲学的一课》中说过这样的话：“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又说：“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这已是回到上海写出来的话了。不过那时他既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就难免受到当地殖民政府的放逐了。……”³⁸

这推断是否可以成立，还待更完备的资料证明，此地只好存疑。

艾芜到新加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而是偶然性很大的流浪性质。他原名汤道耕，字爱吾，艾芜是他写小说的笔名，另有一个写散文的笔名，叫刘明。³⁹他出身于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家庭，家境贫苦。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之类的古典小说。⁴⁰他从小就有漫游中国各大城市的心愿，又受着“五四”运动狂澜的冲击，时常埋首在《新潮》、《新青年》及《少年中国》等杂志上。⁴¹他曾梦想到“五四”的策源地去读书，尤其想见进大学，但小学毕业后，做父亲的便无力供他进中学。幸好，省立城都第一师范学校是免费的，于是艾芜考了进去。第一师范学风保守，校政腐败；他强撑着读了四年，后来因为不遵从教师规定作文用文言文的命令，没有毕业，就愤然离去，决定到外面的世界找生活。⁴²就这样，艾芜离开了乡土，远走他方！——出四川，到云南，抵达了昆明，这是1925年秋天的事。⁴³

他出境前往缅甸，南下马来亚、新加坡，足足流浪了六年岁月。六年间，他未曾跟家人和朋友通信。⁴⁴他在自己的小说选集《自序》上曾叙述到这段时期的生活：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落在云南昆明的街上，上了人生哲学的第

一课，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也是任何大学所不能授予的一课。但我把这一课写成文字的时候，已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了。因为一九二五年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作文学工作者，只想在那个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里顽强地生活下去，并要工作、读书、学习，把社会当成一个大学。

我在云南昆明的红十字会作过一年半的杂役。在云南西部的群山中流浪过一个时期。在滇缅界上山头族人居住的山——一般汉人把它叫作野人山——里，替路边汉人开设的马店打扫过五个月的马粪。在缅甸仰光帮中国和尚煮过一个时期的饭。又流浪到过马来亚和新加坡。我最初写作的材料，就从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生活里汲取来的。

在一九三一年前，即在流浪期间也偷闲写过新诗和小说。在昆明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在仰光无以为生的时候，也靠投稿到华侨报纸的副刊上生活过一个时期。这也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深深爱好白话文学，即在无法写作的条件下，也忍不住不写。⁴⁵

从上引的文字，可以察觉艾芜在流浪的当初，并没想到成为文学工作者，但他在回中国前，已经执笔写小说和新诗了。他只提到在仰光投过稿，究竟在新加坡时是否写过作品，则没有提起。

艾芜在新加坡，是寄住在海山街一间俱乐部的楼上。⁴⁶那究竟是什么俱乐部，全名叫什么，颇难稽考。在艾芜以自己生活为素材写的小说集《南行记》里，有一篇《海》，即写出这些事实。小说一开头，就这么写：

在马来亚的原野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便到新加坡一家俱乐部内，息了下来。俱乐部内接待我的主人，我还是初次见面的，只凭一个水手朋友的一封信，我就把他当做一个极熟的人，他也非常高兴地接待着我。他姓符，大家喊他阿符。水手朋友在缅甸仰光谈到他的时候，也口口声声叫阿符，连那封字写得歪歪斜斜的信，也只在封面上写着：“新嘉坡××路××俱乐部内问交阿符大哥亲拆”。阿符在俱乐部内，是做着侍候人的杂务工作，并管理俱乐部一切琐碎的事情。……”⁴⁷

原来艾芜是靠了缅甸仰光一位水手朋友的介绍信，才得以找到新加坡的某俱乐部“歇脚”。小说里，还稍微描述到该俱乐部的一些情景：

俱乐部的主人，都是些做大生意的头家，白天给那些数目字和花花绿绿的钞票，弄得十分厌倦了，晚上便在俱乐部的鸦片烟灯上，妓女微笑的脸上，取得了满意的补偿。俱乐部是设在二楼和三楼头，他们一到来的时候，便从门口的楼梯，走了上去，全不在楼下待一会儿的。……他这座俱乐部的下层，虽然有些潮湿、阴暗，看不见日光，但还使人感到清凉，到处可以坐，可以躺，给人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过这只是白天，若在晚上可不成了。……⁴⁸

艾芜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窒闷阴郁的“底层”人间。他也写到对新加坡的观感和自己的心境：

我起先是随一两个失业的人，到各条街上去东张西望，尽量看看新嘉坡的街头景象。这里跟中国的大都市，极相仿佛，满街都是中国人，满街的招牌和飘动的布招，都是写的中国字，除了长年空气热而外，简直看不出有更多的异国情调。不久也就街头走厌倦了，我就常常一个人，在海边公园的石凳上，去坐着望海，成一两个钟头地眺望。……

……为什么要把自己终年拘束在一块小地方，做着伺候人的卑贱工作呢？我在海边石凳上久坐的时候，便不禁想着这些问题。……⁴⁹

最后他说：“在新加坡没有找着事做，后来我回仰光去”。⁵⁰如果这自传体的小说是生活的纪录与写照，那么，艾芜在新加坡的生活可说是十分困阨的；他根本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以致被迫要流浪北上了！

四、吴天 1936-39

吴天是著名的剧作家。⁵¹他在新加坡期间以“叶尼”为笔名发表作品，又署马蒙、天。与郁达夫、杨骚一样，留学日本。1936年中南来，先在马来亚芙蓉某中学执教，后才南下新加坡。⁵²他是属于1937年以前南来的中国作家中贡献最大的一位。

从1937年初开始，吴天即在《星洲日报》的“晨星”和“文艺”周刊

陆续发表散文、报告和评论，同时为新加坡业余话剧社编写《救伤病院里》一剧（后改名《伤兵医院》）；演出后曾引起一场关于剧本的地方性的论争。1937年冬，接编《星中日报》的“星火”副刊，1938年中离职。⁵³这之后，为马康人主编的《南洋周刊》大量撰稿，并积极参与话剧活动。1938年底业余话剧社在新加坡和檳城各地演出的曹禺名剧《日出》，即为吴天所导演。1939年初，离开新加坡，先到香港，再到上海，一面协助《文艺长城》的出版工作，一面编印两册专集——《没有男子的戏剧》和《怀祖国》。前者汇集《赤道小景》、《大家一条心》、《耳朵》、《伤兵医院》、《没有男子的戏剧》、《海外》……等八篇剧作；后者收录《热之国》、《那件事》、《说服》、《南海的咆哮》、《无题》、《怀念》……等散文与报告十多篇。这两部作品集内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作者居留新马期间写的。⁵⁴

散文与报告文学的成就

吴天的抒情散文写得很有深度，他的杂感与报告文学也富有时代气息、凝炼有力。《怀祖国》这本结集并没有销行新马，欲觅已难，但从萧克的评论《怀祖国》一文，还可略窥吴天作品的特色。萧克认为这是一本“以南洋的现实为题材”的散文集，虽然份量不大，但每篇都“紧紧地把握着现实”，而没有一般散文那种“充满着想象梦境的传说”。⁵⁵他精简地评介了集子中的一些出色的散文；在今天看不到原文的情况下，这评介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以下是萧克的评介：

“在殖民地”，作者是巧妙的从各个小小的角度去反映出整个《热之国》（借用作者另外一篇文章的命名）的情况，并表现出蕴藏在这“永远是绿”的地方底内质，作者大胆的给它一个预示，认为这永远是绿的地方是将浸透新流了。

这里面有两篇描写着华侨救亡运动中的壮烈事件，《那件事》与《说服》。作者对题材的熟悉，在作品表现出生动的图画，在这里面，它创作了活生生的“事”与活生生的“人”。这两篇是报告，而且是以写优美的散文手法去描写，可说是两篇出色的报告文学。其中还有《南海的

咆哮》写出南国动人的事件，人类最伟大同情的表征——印度的“中国日”。

《无题》是作者个人的悲痛遭遇，想写出个人的悲哀。然而，作者是有着更高的热情，有着更广阔的爱，他还要跑着更远的道路，而决不去迷恋着个人的小小的损失！

“死去的孩子只生下六天便死了！我哀痛于他寿命的太短，但一想到未来悠长的，不安定的，难以照应的生活，我终于在眼泪中寂寞地微笑了！

“死了人性的人啊！”

“终于又诅咒起自己的自私来……”（第101页）

我们只要从这里便可以看出作者的整个灵魂。

《怀祖国》是作者在海外时期对热爱祖国的怀念，现在，他已在祖国的怀抱中，他又是更想念着海外，因为，在这《热之国》也曾留下了作者生命的一页，“斗争的痕迹”，而且也洒下了作者的血汗和爱液。在最后一篇《怀念》（代跋），他倾吐如何爱这“永远的绿”中的伙伴，在这里面，他写着因为他们，给他感到“世界是多末可爱啊！”

然而，他又不作个人的迷恋，在这里，我们又可从那篇洋溢着他灵魂血泪的《无题》中去得到了解：

“路必须要走的，纵使寂寞……”

在黑暗中，人类是象铁一样地坚硬了！”

最后，我们更可感到作者的理智与勇气：

“而今日，我们将为了世界的可爱，艰苦地活着。”（怀念）……”

吴天较早写的报告文学是一系列发生在军国主义黑暗统治下的日本的故事，总题为《秘密的日本》，1937年上半年发表在《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当时吴天刚从日本东京南来，写的都是他亲身所见所闻。据他自己说，写这些故事时是连自己都感到浑身战栗的，他认为“写出来的不及知道的十分之一”。在《大学教授疯了——秘密的日本之七》里，写一个日本大学的经济系教授有马，少年时留学欧洲，因为写论文反对政府强化军备，加紧统制政经文化的政策而被捕下狱，又因为拒绝悔过而被当做神经病患者，送到疯人院去休养。吴天写道：

“我是一个学者，你没有权力剥夺、转移我的信仰，除非你用更高的学术说服我的时候。”

不用说，这是没有结果。

想借着有权威的学者的话来说服一班人民不能成功的人，继着失望便是愤怒了。

有马遭到从没有想到过的肉体的酷刑。可是他没有说出一句妥协的话来。

“随你们，我是不能收回代表真理的话的。”

结果，聪明的读者啊！你想得到吗：

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新闻！有马教授患神经病，被送到远离城市的乡间的神经疗养病院去了。”

他也写了一个毕业于日本航空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王钢，由于成绩优越，名列前茅，引起妒嫉，终于在校方特别安排的一个飞行表演中遭了暗算（《失踪——秘密的日本之十六》，1937年4月23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诸如此类事件，倘非吴天写出，实是秘闻而不为人知，一经写出，则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抗战发生后，吴天的报告作品就集中反映当地的救亡活动，如发表于《南洋周刊》的《一件事的始末》、《胜利》等。⁷⁸又如《卖花队》，写卖花救国，小女孩阿香只有十四五岁，就知道救亡工作的重要，一大清早去领纸花，谁知大家都想卖多一些，结果花不够派，领得不够多，而有些人甚至领不到；可见救国的热忱人人有。在文中，作者以满腔热望描述当时的情景：

纪念日的街上飘着血红的国旗，也到处点缀着血红的纸花，在衣襟上、在胸前、在手上、在发上……………

满街是花呵！

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南洋人，都一齐戴上了血花。

每当一个人走到街心时，总可以碰到那些不顾风雨，汗珠满脸的青年热情地拦住你，给你插上一朵花，然后在你投一个银币进封条封好的箱子后，她们笑了，比任何时候的笑更天真、更美的。

蓝色的天，明朗的日子，人类变得更年青、更相爱了。…… 59

吴天在离开新马前夕，还写了一篇多姿多采的散文——《向马来亚的朋友告别》，洋溢着恳切的友爱：

……朋友们！当我初来马来亚时，并不是想来养养病，或是观光风景，只是为了一点小事而来，可是却终于住下了。我发现这儿青年的不可多得的热情；他们如火的热情，鼓起了我最大的勇气，点燃了我的心，我记着他们正如记着我已往的经历一样。

两年半的生活足以使我长期地追怀。我本来是一个从事文艺戏剧工作的人。当初我曾梦想着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抗战的炮火却告诉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更得参加民族新生的事业。因此我牺牲了一切，忘了一切，而今后当更抱着继续牺牲的决心。……

马来亚，使我留恋的马来亚！我留恋的是那些年青的、努力的朋友们，我并不留恋那些椰子树和蓝色的海的风光。我对于那些在后方加紧工作的人们充满了敬意。我决不以为跑返北国就了不得；不，决不。

这是留在马来亚的最后一天了。我愈到离开时间的迫近，便愈感痛苦。朋友们勉励我的话是在耳中，并且希望我再回来。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朋友们，我们以抗战胜利为期吧！…… 60

✓ 吴天是个热烈响应抗战救亡的作家，倘若不是情势所趋，他恐怕会留在新加坡更久的。在他离开后，还寄回一篇《船上》，发表在《南洋周刊》第33期上。他以日记的方式写出他离开新加坡后的心情，感到“越离星加坡远，越想星加坡”。他是在1939年1月25日决定离开新加坡的，说走就走，但走后又留恋不已。⁶¹

戏剧创作与戏剧活动

吴天南来时还是一个青年人，敢于尝试。⁶² 南来后第一个剧本（独幕剧）《南岛风光》（后来改名《赤道小景》）是为他执教的那间芙蓉中学学生的戏剧演出而写的。这之前，在日本东京写过另一个剧本《决堤》，上演效果

不错。⁶³初到南洋，他感到相当生疏，“找不到一个朋友，不知如何干才好”。⁶⁴后来到了新加坡，在“业余话剧社”同人的催促下，要他“在劝捐的前提之下，写一宣传剧”，⁶⁵这就开始了《伤兵医院》的写作。当时吴天一方面负责报馆的编务，一方面落力搞戏剧，真是双管齐下。

《伤兵医院》在演出前，是在《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连载刊登（1937年10月12日至26日）。在当时戏剧界，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救亡独幕剧。故事发生于1937年9月某日，以上海为地方背景。人物包括伤兵甲、乙、丙、丁，看护妇甲、乙，医生，救伤队员甲、乙，小孩及其母共十一人。⁶⁶内容表现前线战争的惨烈以及迫切需要后方的药物接济。幕一启，在某后方救伤医院内，倒躺了三位战士。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其中张排长伤势比较轻些，快要复原。他向看护李小姐叙述他怎样由日本拘留所逃出的悲惨经过，而罗队长（飞机师）虽然伤了眼睛成了盲者，却也热烈地坐在床上参加这个叙述。另一个王飞机师的伤势很重，神经已经失常，不久也就死在这医院里。后来救伤队员又抬进了一位叶先生，那是一个由南洋回国参战的青年，是和那位看护李小姐同船回国的。这时叶先生的伤势很重，药品又没有运来，据医生说，再过半点钟没有药品运到，叶先生就没有性命了，所以李小姐很着急。至于火线上，则不停地战斗着。忽然，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全院都震动起来。不久，一个小孩子用了全身的力量背了受炸伤的母亲进来求治。罗队长虽然是个盲者，但在小孩的哭诉中，他认得那是他的儿子大保。于是悲惨的遭遇立刻呈现在他的面前。他的第二个儿子已被炸死了，现在他的妻子又死在他那不能看见的目前。他从极度沉痛转变成愤怒，他走出伤兵医院，准备再与敌人作战，不论是前方或后方。这时候外面吹起集合的军号，召集医好了的伤兵再上火线，张排长也跟着出去了。接着，天已大亮，只听得报贩的叫卖声不断发出，看护李小姐从外面拿了一张报纸进来，对叶先生报告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并且药品也运到了。⁶⁷

吴天写剧，善于渲染悲剧气氛，他甚至以观众的流眼泪为剧本成功的证明。不过，他来新加坡后，尝试改变自己创作剧本的偏差。他在谈写《伤兵医院》的经过时，指出自己的作品“不成熟”，是“利用每夜的睡眠时间写的”，他也说明写剧是“为了宣传”。⁶⁸他自认自己对于人物个性的刻画还不深入，但也表示他主观上的努力是希望摒弃感伤、缩短对白。他本身没有

✓ 机会上上海的战场体验有关的生活，他是从朋友那里探询许多上海伤兵的情况，又参考报上一切的新闻、杂志的访问记、慰劳印象、实地图片等等，才动手写作《伤兵医院》一剧的。⁶⁹他对这剧本很重视，因为他付出巨大的心血。他在演出前曾恳请演员不可把它演成“文明戏”。⁷⁰他对这部戏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希望“在宣传之外，还加上一点提倡戏剧艺术的意义”。他很想在新马地区把戏剧艺术认真推广。⁷¹

《伤兵医院》终于交由业余话剧社排演，在排演过程中导演有作了一些修改及技巧上的补充。⁷²此剧于1937年12月3日至5日，参加星华筹赈会假新世界主办的筹赈游艺大会公开演出。⁷³同时演出的，有吴天的另一部剧本《父与子》，以中国抗战后方为背景，写一个热心青年大义灭亲，击毙一个买办劣货的汉奸。剧本由华侨中学演出。⁷⁴其他一起演出的戏剧团体很多，如爱同校友会演出《怒涛》。⁷⁵筹赈游艺会过后，引起一场“南洋地方性剧本”问题的论战，涉及《伤兵医院》及《怒涛》。吴文翔为文推崇《怒涛》富有现实意义，本意并不在批评吴天的《伤兵医院》，只是旁敲侧击，稍为举《伤兵医院》为例，不料结果引起业余话剧社的导演黄觉等的出而答辩，双方竟各为“地方性”申辩。在这场论争中，吴天反而缄默，其实他有作品为证，也不必费言了。⁷⁶

除了《赤道小景》、《伤兵医院》、《父与子》外，吴天还以田汉的三幕剧《回春之曲》为基础，改写并创作出四幕剧《春回来了》（人名取田汉原著），又特应某女子中学的需要写了《没有男子的戏剧》，又写了纪念八一三的街头剧《同心合力》，其他还有《海外》、《活该》（独幕剧）、《串好的把戏》（街头戏）等。⁷⁷《串好的把戏》一剧，在当地竟演出达数百次之多，真是名符其实的街头剧了！⁷⁸

吴天不仅勤力写剧，更热心协助剧团组织，培养演员。1938年“救亡”剧运继续发展，演出次数比1937年增加，各方面的演技与演出效果也更好。街头剧广泛地流行起来。业余话剧社于是发起组织“马华巡回剧团”。吴天与戴英浪、黄康三人负责新加坡的办事处，团长是朱绪。该团走遍马来亚西海岸，计有八十一处，上演一百四十五场，筹得赈款廿余万元。⁷⁹1938年下半年，由于英国在远东开始执行其“现实外交”，政治气候改变，马华剧运逐渐走下坡，救亡短剧的演出因受限制而减退，几乎销声匿迹。基于有

戏难演的情况，业余话剧社于是在是年十一月间假维多利亚纪念堂演出曹禺的名剧《日出》。当时由吴天执导，废寝忘餐，大花心血。⁸⁰演出后不久，吴天即离开新加坡。

在《日出》演出时，吴天写了一篇《我们是怎样演〈日出〉的？》。在文中，阐明在没法演《救亡剧》的情况下，改演曹禺这部社会剧的初衷与排演的苦心及强调的重点。他为了补偿这种遗憾，强化《日出》的第四幕，甚至把达生演成一个极有希望的青年。他说：

这并非是想把抗战前作者的观点加以改变，而是因为一切中华的儿女（除了汉奸托匪）现在已经起来了。同时，我们也只想把《日出》做为一个桥梁，这个过渡的期间越快越好，如果环境允许，我们衷心的志愿是上演那又能提高戏剧艺术，又能增加救亡宣传效果（实际上这二者并不冲突而是互相关联着）的戏剧。自然，我们绝不想用《日出》的演出取消独幕的简单的，以鼓励大众救国情绪为第一要义的短剧，不，我们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展开这一运动。

《日出》并非和“抗战”绝缘，金八等在今日大概已经流为汉奸，而达生工人现在怕已出死入生地 and 敌人在战场上搏斗了。……⁸¹

吴天对于马华剧运的推动与表演艺术的提高，实是贡献不小。

理论批评方面

除了创作、导演，吴天还擅写评论。所谈的理论，颇见深度，大抵对时立论，实事求是。1938年年头，在《星中日报》上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论战时文艺》，是抗战文艺运动发难初期的代表性文章。作者除了论述战时文艺的内容，形成的诸特点外，还提出几个重要的原则：

一、战时文艺作品必须成为一种救亡的武器。因此，它必须配合抗战形势，把握每一个必须叫出的口号，具体化于作品中，完成宣传和鼓励的任务，使救亡意识铁一般地生长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二、战时文艺作品应该有暴露和报告的能力。暴露敌人的伪装、凶残，与即将崩溃的趋势，报告前方的英勇抗战情形到达后方，使前后方取得联

系，加强对抗战的认识，加强抗战力量。

三战时文艺不仅要宣传（使得群众援助抗战）、报告（使得群众明瞭抗战），还要更进一步指示群众应该如何参加抗战，得文艺力量作为一种组织的动力。

“为了争取广大的群众，战时文艺作品，首先要大众化，适应大众的需要，使大众理解而获得大众的拥护。但群众所爱好的东西并不就是大众化，大众化的作品应该是适应大众的需要，为大众所理解，且能教育大众，提高大众文化水准的。……”⁸²

不过，“战时文艺”的名称并不通行，经过一番论争，大家还是同意以“抗战文艺”为口号，因为“战时文艺”意义稍嫌不够明朗。⁸³

在讨论“战时文艺”之外，吴天还在《南洋周刊》上发表两篇长文：《论南洋文艺的大众化运动》和《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论南洋文艺的大众化运动》在当时文艺界提倡文学通俗化运动的热潮中，力排众议，强调着重内容的大众化与新形式的创造，与以汪金丁为首的“狮声”派作者包括陈南（东方丙）等展开笔战；当时意见与吴天接近的，有铁亢等。⁸⁴

《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则总结了关于救亡剧运与戏剧问题的辩论，批判了强调救亡内容与强调艺术形式两方面的偏差，提出了“用提高艺术水准去展开马华救亡戏剧运动”的主张。其分析的周详、思考的深刻，代表了当时马华文艺理论界的最高水平。⁸⁵

1938年，吴天出席一个“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的座谈会，其他与会者有春其、张一倩、啸平、郑允文、殷序、云览、陈广福、朱绪、培能、道鸣、李承、荷耕、英浪、禁坡、陈少鸣、赖昌杰、流冰、陈英、陈娟、金玻等二十人。会上谈到戏剧工作者的团结问题、争取观众问题、利用旧剧问题、提高艺术水平问题、检讨演出效果问题等等。结果得出相当具体的结论，由吴天作出总结，认为剧运应以抗战第一，努力筹赈，至于戏剧艺术本身，不可忽略其艺术本质，要深入研究，建立统一组织，出版话剧刊物、建立剧评、使剧团职业化等。这些问题，似乎也适合于其他的艺术样式的发展与推动。⁸⁶ 吴天回国后，战后初期，也曾寄文章给胡愈之主编的《南侨日报》发表，如《话剧的厄运：兼谈话剧的形式》。⁸⁷

吴天在1937年尾至1938年中所编的《星中日报》的“星火”副刊，与铁抗于1939年下半年所主编的总汇报《世纪风》副刊，同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文艺副刊之一。他主编的时间很短，不及一年。回国后，仍致力文艺工作，当《文艺长城》在上海印刷时，他对编印、校稿以至销售各种工作，都曾付出不少心血。⁸⁸ 战后，1946年，还与于在春在上海联合主编《文革》杂志。⁸⁹

五、其他

前面四节已经谈过洪灵菲、老舍、艾芜和吴天，这里顺带提一下许杰（1900—）。许杰南来，主要是留居在中马的吉隆坡。他出任《益群报》主编，发刊《枯岛》副刊，一时成为中马一带新兴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对文艺的提倡，厥功至伟。⁹⁰ 那是1928年的事。许杰回国后，出版一本南洋题材的散文集《椰子与榴梿》。⁹¹

许杰之外，有马宁。马宁原名黄梅邨，又名黄德福，⁹² 1930年南渡，先在马来亚檳城，后才南下新加坡，逗留时间甚长，约莫到1936年才离开新马。在新马期间，以静倩为笔名发表剧作，最重要是提倡新兴戏剧，代表作有《夫妇》（又名《芳娘》）、《凄凄惨惨》（又名《绿林中》）、《女招待的悲哀》（又名《一侍女》）等。⁹³

至于过客式的著名作家有巴金（1905—）、徐志摩（1896—1931）等。巴金是在1927年1月15日离开上海到法国留学途经新加坡。他乘Angers（昂热）号在1927年1月24日上午八点抵达新加坡。由于他对“新加坡”这地方的名很熟悉，所以上岸看个究竟。⁹⁴ 他前后只逗留八个钟头，下午四点船即开行。他得到一个姓陈的广东人的帮忙，才解决了换钱的问题，又买了两条现成的帆布西装裤，过后还到中华书局逛逛。巴金在《海行杂记》散文集内《新加坡》一节，略有抒写他对新加坡的印象。他写道：

我们所经过的新加坡的街道并不怎么好，只有初上岸时还看见几条很好的马路，两旁有树木，路中有印度巡捕站岗，有电车汽车和黄包

车。中国人在这里开店铺的很不少。印度人和马来人也有些……”⁹⁵

巴金所见的新加坡与今天的新加坡当然是别之天渊了！

徐志摩途经新加坡，期限甚暂，不过数天。他给新加坡的评语是“浓得化不开”。⁹⁶《浓得化不开（新加坡）》写于1928年，则徐志摩大约在这一年路过新加坡。徐志摩形容新加坡的芭蕉、气流、女人等，都用“浓得化不开”这句话。例如：

大雨点打上芭蕉有铜盘的声音，怪。“红心蕉”，多美的字面，红得浓得好。要红，要热，要烈，就得浓，浓得化不开，树胶似的才有意思……⁹⁷

气流似乎是密一点，显得沉。一只疎荡的胳膊压在你的心窝上……确是有肉糜的气息，浓得化不开。……⁹⁸

可惜不曾看清她的眉目，望去只觉得浓，浓得化不开。……”

巴金与徐志摩都是天涯过客，对新加坡的文学发展都没有作出什么实际的努力，倒是他们在中国创作的作品，相当深远地影响了海外的读者，曾经风靡了新加坡的读者。

第四章

1938年底南来的郁达夫

研究过第一个时期（1927—1937年中国抗战前）南渡的中国作家的生活与工作后，现在，必须探讨第二个时期（1937年中国抗战后至1941年）南来的有关作家。在这批南渡的中国作家中，郁达夫与胡愈之是两大柱石，为了突出他们与更详细地研究他们，我特辟独立的两章来写他们。

郁达夫在南来的众作家之中，影响最大，成就也格外显著。自他罹难逝世（1945年9月17日）后，新马各地以至中国、香港、日本、欧美各国，都纷纷注意搜罗他晚年的作品（包括散文、杂文及旧诗词），研究他晚年的活动与贡献。本章希望在一些已经发表的资料的基础上，作比较全面的整理，勾勒出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形象，进而突出达夫对当地文艺界作过的努力。

一、初到新加坡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1896—1945）从香港抵达新加坡。¹他是挈妇将雏而来的。抵步后，与妻子王映霞，儿子郁飞，下榻南天旅社八号房。²当时有友人访问他，他说：“我这次来《星洲日报》做工，打算长住在南洋，不愿再回中国去了。”³

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三天便遇上新年假期（战前报业新年假期有一星期之久），又恰逢檳城的星系报之一的《星檳日报》在1939年1月1日创刊。他接受了《星洲日报》社长胡文虎的使命，以及北马友人之邀，便和当年《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结伴北上。元旦日抵檳城，在《星檳日报》对门的杭州旅馆歇宿一宵。他赋了一首旧诗《抵檳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寝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

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

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

在这诗里，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他悲愤投荒，无可奈何的怆凉心境！

第二天，他搬到附近的现代旅馆三楼去。报上发表了他行踪的消息，檳城一般文艺界朋友便定于四日下午五时在郊外的一家酒肆公宴他。事前他们派温梓川和李词侗去旅邸约访。那天晚上，在席间，他报告了中国文艺界抗战工作的近情。他说中国文艺界自抗战一年半以来，未有伟大的抗战作品产生，原因在于文艺界中人此刻正从事抗战的实际行动。一般文艺界中人，莫不认定行动第一。当汉口沦陷前，文艺界人士就曾议定，能下乡者下乡，能赴敌后方者赴敌后方，能随军队者随军队，能赴海外者赴海外，一切不能者，即集中重庆，议定后各奔前程。他本人初赴长沙，继转南昌，视察各前线军士，看到前方军士衣具不足，天寒衣单，且适逢淋漓秋雨。达夫归乃联合同人，提倡募集寒衣，送往前方。后由福州南来，准备与马来亚同人共同努力提倡文艺，希望文艺作者一齐努力。达夫报告完毕，温梓川曾代表大家的意思，即席提出“几个问题”，达夫表示回新加坡后用书面或在报上答复，这就是后来引起的一场论争。有关这“几个问题”的纠葛，留待第八章再详细讨论。⁵

五日晚达夫附车南下，檳城的朋友都以为他三两天工夫便可以安抵新加坡。不料在一月十一日《星檳日报》的地方新闻版上发表了令人骇异的《复车小记》，人们才知道他坐的火车出了轨，以致耽误了返星的时间。⁶在这次小小的北游南返中，达夫写了旧诗四首，散文两篇。⁷

郁达夫从檳城返回新加坡后不久，一家三口，从南天旅社搬到中峇鲁中保路二十四号三楼的房子居住，那是三房一厅的组屋。据他说是朋友让给他的。⁸当时达夫在报馆编副刊，月薪两百，以战前生活水准衡量，待遇已是不错。⁹他住中峇鲁。¹⁰他的书都在摆在地上，或放在牛奶箱里，并没有装置书橱。后来这小客厅还悬挂了一幅徐悲鸿南来开画展助赈而送他的“奔马”图轴。¹¹

二、编务种种

达夫从檳城返回新加坡后，即接手编务。¹²他是在1939年1月9日正

式启编《星洲日报》日版副刊“晨星”及晚报副刊“繁星”。这两个副刊本来都由林健庵主编，是当时的重要副刊，尤其以“晨星”为时最久而又刊期最密。”在接替编务的当天，新旧编辑各发表一小段声明。关于“晨星”版，声明如下：

从今天起

健庵

“晨星”出版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从开辟这园地起，就由我负责编辑。这中间，我没有离开过这园地。因为得到许多爱护本报的读者与作者的帮忙，这园地已经由荒芜而日渐繁荣起来。自然，这是非常使我感慰的。但“论功行赏”，应该属于诸位爱护本刊的作者。

从今天起，“晨星”已由郁达夫先生来编辑。我却变更工作，调编其他的新闻了。郁先生在中国文坛上的文名，大家早已知道，作品更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由他编辑起“晨星”来，一定可以使这一块园地，更加花团锦簇，精美充实。希望过去在本刊投稿诸君，本以往爱护本刊的精神，继续以佳作见惠为盼！¹⁴

《晨星》的今后

郁达夫

自本日起，星洲“晨星”的一栏，由鄙人来负责编辑了。林先生的规模俱在，我是新来晚到，当然仍旧是一本林先生的规模做去。从前的诸位爱护本栏的作者读者，希望仍能依照旧日的爱护热忱，使本栏得日臻完善，放灿烂的光辉。

晨星两字，在中国的旧词汇里，是寥落的意思，也是稀少的意思。读者作者，若寥落起来，那就是鄙人之罪。可是星洲的此栏，若能日臻完善，日渐近于理想，使此小小的一个园地，得象稀少晨星之可贵而可珍，那就是鄙人之荣幸，也即是爱护本栏诸君的大成功了。

更一推“晨星”之所以会寥落，稀少的原因，是由于光明的白昼的来临。现在的世界，若是将旦的残夜的话，那光明的白昼，不久也就可以到来了。英大诗人奢来亦曾说过，冬天若至，春天自然不远。晨星这一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

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这一角小田园，而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来。

（廿八年一月一日）¹⁵

从上述的两则声明，可以看出达夫南来是受文化界推重的，他自己也满腔热情，抱负很大，希望发掘后起之秀，培植出一批好作家。在“繁星”的声明——《繁星的今后》里，也有类似的心愿，不仅表达得谦虚、诚恳，而且充满呼吁团结的忘我精神：

清早的晨星，与日落的繁星，本是同胞的姊妹，孪生的弟兄。今后的繁星，同早刊的晨星一样，统由鄙人来负责编辑了。前任林先生努力的成绩俱在，此后当然也只是萧规曹随，以期不负读者作者诸君之期望，和林先生的长年奋斗的初衷。

可是个人的识见有限，而大众的嗜好不同。以言文艺，亦有喜欢文调铿锵，音韵谐顺的旧诗旧学的人，同时亦有喜欢思想奇突，文字通俗的人。讲到趣味，每人不同，更如其面；有的爱听京戏粤调，闽剧秦腔，有的爱玩扑克麻将，跳舞银星。一张报纸，要想收大众的爱，博全场的彩，当然是谈非容易。可是新闻记者，尤其是副刊编者的理想，总得在向这一条能满足各人之所好的路走去。所热望者，是诸君的不客气的指教，与不间断的督促，总期这一块繁星的小天地，能使油墨纸张，都不浪费而后已。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的序幕揭开，以后的建国中兴与自强，到处都在要求我们全民族的精诚团结与互助。今后的繁星的读者投稿者，希望也能发挥这一种国民至上的团结的精神！

（廿八年一月一日）¹⁶

从上文，也可以看出达夫的编辑态度，他至深期望读者及作者的合作。《繁星的今后》及《晨星的今后》所署的日期都是“（民国）廿八年一月一日”，但那时他北上槟城，并未正式接编副刊。

“晨星”每日出版四份之三版，采取长短栏排法，星期日则代以“文艺”周刊。“文艺”周刊的内容及版式与“晨星”大致相同。郁达夫从1939年1月15日开始接编“文艺”周刊，当天照例刊出一则《接编文艺》的小启

事：

《星洲日报》星期日的“文艺”一栏，以后是由我来接编了；和“晨星”“繁星”一样，前此担任编辑的郑先生的规模俱在，我也不过是依照了他的方式，继续下去，唯期不失故步，略有进展而已。

“文艺”，旧日的读者、作者，希望仍能一本旧日爱护本园地的热意，照旧日的样子来督促，来投稿。使这一星期一次的小园地，不致荒芜，并且更能发出新的力量来，助我们国家民族的复兴的成功，这想不仅是我这编者的期望，当亦为诸君所乐与合作的一件大事业。

（一月十四日）¹⁷

“文艺”周刊是《星洲日报》继“野葩”副刊之后发刊的一个纯文艺副刊。它比“晨星”还出现得早，创刊于1932年1月3日，起初是一大版，后因广告版位而缩小园地面积。¹⁸除了上述三大副刊，达夫还兼编檳城《星檳日报》的“文艺”双周刊。这副刊是1939年1月随着《星檳日报》创刊而开始出现的，每期半版，稿件由郁达夫在新加坡编好后寄去，主要容纳北马作者的作品，偏重刊登纯文艺创作。¹⁹

除了上述的四种副刊，郁达夫还负责《星洲日报》印行的小型画册《星光画报》的文艺栏的编务。该画报每月出版一次。达夫每期采用一个短篇创作，水准相当高，由徐君濂插图，真可谓图文并茂，颇受读者欢迎。这些短篇创作是由铁抗、上官豸、文之流、王君实等人轮流执笔。²⁰

达夫出任编辑，虽然用心良苦，矢志不凡，但一切与他南来前在国内的情形仿似，终究“事与愿违”。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因素，他的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

原来，进入1937年以后，由于受了西安事件的刺激，加上大批文化人从上海各地南来，加强了本地文艺界的阵容，消沉了一个长时期的马华文艺，于是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到了全面抗战开始后，民气高昂，而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态度不得不由观望转为支持中国抗日，于是新马殖民地政府也宣布准许当地华人捐款助赈。就这样，星马华人社会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活动自然跟着急剧上升，呈现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可是，到了1938年中，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渐趋不

利，殖民政府又开始对本地的救亡运动采取敌视态度，放逐文化界知名人士等。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国人为了稳住其在远东方面的阵脚，便对日本讨好，而新马殖民地政府便变本加厉，颁布战时法令，严厉限制抗日活动。抗战文运，随着形势的转移进入一个迂回发展的阶段。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殖民地政府才又放手当地开展卫马抗日的运动，抗战文艺才又出现另一次高潮，可惜为时甚暂，不久马来亚也就沦陷了。²¹

郁达夫编“晨星”的三年期间，以1939年的成绩最佳。当时抗战文运虽然已经退潮，但仍有一些波浪起伏，“晨星”还保持着相当坚实硬朗的风格。当时“晨星”的作者群包括铁抗（郑卓群）、老蕾、王君实、张曙生、戴准君、李词侬、白蒙（艾蒙）、漂青、白荻（黄科梅）、刘思、清才、李冰人、蓝孔影、文之流（苗秀）、金石声等。

为了充实副刊内容，郁达夫经常去函向中国方面的作家拉稿。当时如艾芜、萧红、适夷、柯灵、陆丹林、姚雪垠、许广平、冯雪峰、姚蓬子、老舍、汪静之、徐悲鸿、茅盾、黄药眠、欧阳山等，都曾经特别为《晨星》撰述了若干稿件。²² 这些稿的题材当然以中国为主，不一定适合新马的实际情况，但郁达夫提倡文艺的苦心还是值得赞许的。而且，以有成就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来鼓舞新马的文艺界，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作为副刊编辑的郁达夫，选稿编排是认真的。在他接编副刊后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编辑者言》，阐明他的主编立场。这篇《编辑者言》，刚好比《几个问题》早两天刊出。²³ 在文中，他似乎预感到自己对南洋的环境还不熟悉，恐怕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因为“一个人有了固定的社会评判，就是有了一个固定的范畴之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就难免要惹许多固定的猜测出来”。他对当时的一般猜测，作了这样的澄清：

……在下这一次渡海南来，新就了《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之职，测字摊儿摆起，已经有七八天了，大家自然也不免又将有一些想当然的猜测，就是说某某此来，星洲的“晨星”、“繁星”、“文艺”，及未来将出版的“文艺半月刊”，或将有一番大大的变革。……可是文艺的滋长，风气的造成，与夫新进作家的发现，决不是同捉鱼买物一样地简单的事情。况且只有一个人来掀起这广大的波浪，力量也有点儿觉

得不够。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全能的百科辞典家。……²⁴

达夫是认识到个人力量的微薄的。他不以为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他接着列出三点编辑方针：

第一，既然做了一方文艺的编辑，则这一方的责任，自然应首先尽到，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这些当然是编辑应尽的职分。

第二，时事有变迁，潮流有起伏，人事亦有代谢；……副刊编辑，……总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开风气，亦顺潮流；去时代不能太远，提问题不能太高，实事求是，以汗水来作天才的养乳，这就是我以后在编辑职内想努力的目标。

第三，时代转变得太快，在这抗战期间，不但政治、经济，以及一切社会设施，赶不上时代，就是应站在时代先头的文艺思潮，哲学原理，恐怕也会有落伍的危险。在这时候，所最易出现的，是躁等、燥进、空喊等小儿病的症状；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多注意一点，跑尽管可以跑，但脚切不可远离了地。……行千里者，三日聚粮，目的既远且大，速度又快而急的时候，食粮与汽油，总得先备足才行，这又是我今后想采取的一个态度。

凡此数点，是我于就职之初，就内定好的 Pose。但能维持得多久，与其后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就只好“看货色”了。²⁵

原来郁达夫在初任编辑时，已定好编辑的“Pose”了。从上举几点，可以看出达夫是采取平正稳健的编辑态度，但这种照顾时局，稳扎稳打，重视新秀的作风，却也不免“吃力不讨好”，几天后，《几个问题》的笔战便告开场了。关于这场笔战的前因后果，留待第八章第一节再作探讨。

在接编副刊一年后，达夫发表《“文艺”及副刊的一年》，扼要地总结他的编辑经验。大致上，他认为马华的投稿者，“稿子写得过长”，而“对于现实的取舍手段不高明”。他自己“连在业余的闲暇，也多费在读稿子上”，可见他的工作热忱一直保持不变。他认为抗战已进入争取最后胜利的阶段，文艺与政治军事已有密切的不分性，“副刊稿件，不论评论、创作都

应该向这一个方向前进”。²⁶

为了繁荣当地的文艺创作，也为了更好地把华侨的生活纪录下来，郁达夫在“晨星”副刊倡议编纂“马来亚的一日”，号召华侨各阶层都写出他们一日的的生活。事前，先展开了讨论，作了思想准备，后来征集的稿子也陆续在副刊上发表。这次集体创作的反应很热烈，其中不乏佳作。可惜不久太平洋战争发生，这个有意义的工作不得不中断，而结果便没法依照原定计划刊行单行本，否则一定是马华文艺创作的一部有价值、有历史意义的作品。²⁷

除开日常的文艺编务，从1940年4月7日开始，达夫还负责《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教育周刊”编务，又参加《星洲十年》的编辑工作。²⁸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夕，还代理过《星洲日报》主编，脚痛了还要赶去看大版。《繁华报》也请他任主编，而英国情报部则请他担任《华侨周报》的编辑。事实上，编周报是名义上的职务，他是干收听日本广播，把广播译成英文的工作。他因此听到不少日本名流学者的宣传广播，如日本学者室伏高信、新居格、长谷川如是闲、山川均以及文学家武者小路笃实、佐藤春夫等人为军阀宣传的广播，听后促使他义不容辞地在报章上写公开信予以驳斥。²⁹至于他参加种种抗日救亡的活动，留待第五节再加叙述。

三 婚变

郁达夫与王映霞既是夫妻，又是同事，本该和睦同舟，不料好景不常，在1940年，宣告离婚，劳燕分飞。这婚变的前因后果，枝节纷繁，不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可是，这婚变是达夫南渡及在新加坡生活的冲击点，所以有必要提述一下。

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朋友的调解与规劝下，双方签了“协议书”，言明“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³⁰同年9月9日王映霞还签具一类似悔过书的文件给郁达夫收存。³¹达夫本身，也“不念旧恶”；夫妻两人，颇有意“破镜重圆”。³²他们抵达新加坡后，当地报人如李西浪、李铁民、胡浪漫等，都为郁氏夫妻的重归于好表示庆贺。郁达夫抵步之初，写了一首旧诗《抵星洲感赋》，虽然仍有隐讽映霞的意思，³³但过往不咎的意愿也流露在字里行间，原诗是这样的：

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
张祿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
宁辜宋里东邻意，忍弃吴王旧苑花。
不欲金盘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³⁴

当时一般旧式文人竞相唱和，其中一泓有“小劫神仙亦可嗟，最难家毁又成家”、“何当一笑忘陈迹，重结鸳盟寄海涯”等句。³⁵李西浪在《赠达夫》诗中用易君左句比喻郁王为“富春江上神仙侣”，李铁民在和诗中还说：“缠绵但看鸳鸯侣，相爱相怜水一涯”，胡浪漫和诗更说：“漫道诗人惯飘泊，红妆相伴到天涯”。³⁶不过事实上，郁、王两人还是心存芥蒂，各有隐衷。达夫在来新途中写的散文《国与家》，流露出对映霞的旧恨，而他抵达新加坡后北上檳城也未带映霞同去。³⁷至于映霞，虽然一同南来，但芳心不属，破碎的感情也永不会归于完整。³⁸

南来的王映霞，已经没有杭州时代的风姿绰约，交际活动也大大减少，只是在家里主持家务兼理财政。请来的佣人只负责洗熨和打扫，她自己上巴刹，自己司厨。郁达夫偶而也客串火头军，上巴刹买菜。他喜欢吃鱼，吃红烧猪蹄和黄芽白炒肉丝等上海菜。他也喜欢吃小吃，常邀三几好友到当时珍珠巴刹的“道记”去吃烧腊，喝啤酒。有时上午去报馆看稿，午餐就在老巴刹解决。他几乎每饭必酒。他的酒量大，甚少烂醉如泥。一杯在手，他就高谈阔论，嘻哈大笑，外表看去好象挺爽朗、挺快乐，其实，他心底里许多抑郁牢骚没有人知道。³⁹

最初，王映霞在家里觉得寂寞无聊——他们的孩子寄宿在学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很想在外面找份工作做做，就商于郁达夫。郁达夫竟对她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有时更当着熟人面前出口中伤，使王映霞极为难堪。王映霞是个个性很强的女性，岂肯示弱？于是口角勃谿不断上演。郁达夫对人说王映霞是十三点，只会要钱。王映霞则说郁达夫是老狐狸，说话不算数。⁴⁰

有一次韩槐準先生⁴¹请南洋学会的一些朋友到他的“愚趣园”吃红毛丹，郁达夫给韩先生题一联一诗。后来喝酒过多，踉跄不能成步，朋友用汽车送他回家，扶他上楼。王映霞看他醉成那个样子，便说：“又喝成这个样子了！你看！真要命！”后来，几个南洋学会的朋友要去印尼廖内旅行，王映

霞要一同去，学会的朋友告诉她最好征得郁达夫的同意，免生猜忌。后来映霞便不去了，因为达夫对她说：“你如果要去，便不要回来！”，于是她斗气不去。可是，当南洋学会的朋友回返新加坡时，她却动身独自去了。⁴²她是到廖内教书，但为期不过数月，又回新加坡。由此可见映霞性格之强，郁王情感之无法调和。⁴³

郁达夫那时被一批旧式文人包围着，经常的去喝酒、打牌、玩乐。他本来就是一个风流才子，逢场作戏的场合他是安之若素的。一如当年在国内，他在正务之余，仍不免拈花惹草、眠花宿柳。他曾与红舞女同坐黄包车招摇过市，⁴⁴与什么姊妹花左一个右一个合拍照片，⁴⁵甚至带着妻儿同上“公馆”（俱乐部），当着他们面前与别人打情骂俏。⁴⁶王映霞私下里曾对友人说，郁达夫在上海时虽然也惯于冶游，但不象在新加坡时这么胡闹。这种种，当然埋下化离的伏线。

据篆刻家张斯仁说，这时期郁王二人貌合神离，冲突时起，他常常以和事佬的身份周旋其间。⁴⁷张斯仁原是从事印章篆刻的人，他从荷印来新，刻印助赈。每刻一印连石，至少须叻币一元，达夫曾跟他磨石，斯仁还在印上添刻“达夫磨石斯仁刻印”的字样作为纪念。达夫曾赠斯仁旧诗。两人过从甚密，时常沽酒纵谈天下事。这样才教斯仁有机会充当和事佬。映霞似乎很感激斯仁，曾赠一对小联：“一刻千金，片言九鼎”。⁴⁸

达夫在南来之初，北上槟城，到极乐寺游玩，曾经不改旧例地求过签诗。不料他问前程，诗意却说向家室。那签诗作：“一山如画对晴江，门里团圆事事变，谁料半途分折去，空帋无语对银缸。”⁴⁹后来事实证明这签诗竟然应验。

导致郁王分手的导火线，是那篇《毁家诗纪》的发表。这十九首诗外加一首词，是郁达夫在南来之前断断续续写成的，从未发表过。⁵⁰1939年，香港《大风》旬刊主编陆丹林函致郁达夫寄稿，郁达夫就把这组诗词加上注语，寄给陆丹林，附信还声明不要稿费，只须杂志出版后寄给他十册，另外以他的名义分寄蒋介石、叶楚傖、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人各一册。《毁家诗纪》终于在那年三月五日《大风》周年纪念特大号（第30期）上刊登出来。诗词与注语把王映霞与许绍棣之间的事全暴露了出来，里面有“映霞……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惬意，伊言对我爱心，实在为了我太

不事生产之故。”“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摺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又有“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先逐寇，再驱雉。”等语。家仇国恨齐织，沉痛之情跃然纸上。”¹

王映霞反应之激烈，是郁达夫始料未及的。她先是写了两封信给陆丹林，接着又寄出一封给郁达夫的公开信“一封长信的开始”，最后再写一篇“请看事实”，都先后在《大风》旬刊发表出来。在这些书信中，她除了为自己辩白外，主要是数落郁达夫的种种不是。关于她与许绍棣的事，她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与某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立誓，亦仅止于友情而已！”最使她“气恨”的是郁达夫说她拿过许绍棣的卅七万元港币，以及说她从浙江赶到福州，表示将痛改前非，要求郁达夫带她南渡等语。对这两件事她都矢口否认。关于前者，她说是郁达夫一箭双雕的毒计，一方面要坐实许绍棣的贪污罪名，一方面要诬蔑她是一个贪钱女子。关于南来星洲的事，她反指是被郁达夫所骗，并非求渡。而郁达夫的诸种“不是”之中，最使她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1931年当她怀着第三个孩子已有九个月身孕的时候，郁达夫“窃取”了她的五百元银行存款，漏夜跑到富春乡下他发妻那里住了十天，等把钱花光后才又跑回上海。她说为了家庭担子，十二年来她一直忍辱负重，可是这一次她已忍无可忍，一定要把郁氏的行状公诸于世。这几封信写得满纸辛酸与怨恨。”²

她给了郁达夫许多恶号，如“阴险刻薄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的走兽”、“自私自大的男人”、“以欲为生命的无聊者”、“压迫女子的魔鬼”、“神经错乱者”、“只求肉欲不解情意的文人”、“走惯江湖的浪子”、“丧失了良心的人”等等。泼辣的词锋，也够郁达夫消受的了。这一来，僵局已成，虽然友好们诸多调停，也终究无效。事情拖了一年，到1940年3月，”在《星洲日报》总编辑关楚璞做证人下，郁达夫与王映霞各自登报宣布协议离婚。”在启事中，说是无条件，事实上王映霞所生三子，阳春、建春、殿春，全归郁达夫教养。”映霞回重庆后，登在《大公报》上的启事说：

敬启者，兹因郁达夫年来思想行为，浪漫腐化，能力薄弱，不堪同居，现已脱离夫妇关系。今因郁不在渝，本人特登报宣布。王映霞谨

郁飞（阳春）当时十二三岁，据说曾写信劝请父母亲息争，信中有“前世何怨？今世何仇？”的话，无限怆然悲痛。王映霞只身北归前一个晚上（5月23日），郁达夫在南天酒楼设宴饯行，即席赋诗以赠：

自剔银灯照酒后，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⁵⁷

王映霞回到中国后，先是在一间小学校教一个时期书，后来在重庆外交部任秘书职。1942年春间，与宁波人钟贤道结婚。钟氏是三北轮船公司的经理。战后，他与丈夫到上海居住。⁵⁸

“毁家”的事件给郁达夫精神上的打击可说是很大很大的。他的情绪消沉不言而喻。有一次，黄昏时候，他和曾梦笔手提一瓶绍兴花雕，胁下夹着一件外套，走到珍珠巴刹去，要了一碟白切鸡，一碟“腹内”，命伙计把酒温了，在灯蛾围绕的电灯下，你一杯我一杯，直饮到明月斜西。他向伙计要了一张用以揩拭碗筷的草纸，欹着头，写了一首诗给梦笔：

不合携家事远征，漫天风雨听鸡鸣。
南行几断杯中酒，此夕何妨尽醉倾。

写毕，曼声长吟了一遍，两眶热泪直到颊下。”不过，达夫的浪漫性格依旧。王映霞走后，他家里又多了一位二十来岁的李筱英小姐。他对人介绍说他的乾女儿。郁达夫当时已经四十五岁。李小姐是暨南大学外语系毕业，说得一口漂亮京白和流利英语，七七事件后只身从上海南来，任职于新加坡政府情报部。王映霞在的时候，达夫和李小姐已有过往。映霞回国，李小姐便在郁达夫家搭住。李筱英与郁达夫两人由同事关系而发生友谊，时常一起出入，名义上是契父契女，实际已赋同居之爱。在新加坡沦陷前，李小姐撤退到爪哇，任联军广播员。郁达夫在逃难后，对她仍念念不忘。⁶⁰在“乱离杂诗”的第六首有“却喜长空播玉音”、“剩把微情付苦吟”等句。⁶¹郁达

夫一生，几乎都“为情”所困。胡愈之先生说：

诗人的气质使他倾向于用情感支配行动，对朋友，对同胞，甚至对敌人，他都是用情感来支配一切的。……

有人说，他离开新加坡出走是为了追寻他的爱人。达夫从不肯承认这件事。但从他的乱离杂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把燃烧着的热情寄托在这位年轻的小姐身上，正如但丁之于比德丽斯一般，达夫是拿她作为形象，以表现他的伟大的理想和爱。⁶²

四、扶掖青年

郁达夫自己虽然心绪不宁、生活浪漫，但并没有忘却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责任。对于下一代，他是坦诚扶掖的。当时，通过“晨星”副刊，他团结了一批当地的文艺青年与知识份子。他不但给他们看稿子、改稿子，甚至还在工作上、生活上支持他们。在他的住家，经常聚集了好些文艺青年；他同他们朗朗而谈，对他们写得较好的稿子赞赏不迭，青年们因而受到极大的鼓舞。⁶³ 林非心先生在《纪念郁达夫先生》一文里说：

……在文化界，尤其新进青年作家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对他发生一种温暖的感觉的，因为达夫先生对人的态度是谦恭有礼，不摆架子，达夫先生的作品里，处处都充满着对人有火一般的热爱，对名利看得很淡漠，不轻易与人计较……⁶⁴

苗秀、王君实（王修慧）、铁抗（金鉴）、倩子、冯蕉衣（拉因）等都是因为写作关系而与郁达夫接触起来，受郁达夫提拔。苗秀在《郁达夫的悲剧》里回忆说：

郁达夫很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咨鲁，笔者不止一次到过他的寓所。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们这些来访的搞文艺的年青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诚恳。对于年青的写作者，他更是奖励不遗余力。那时候，那些和郁氏最接近的马华写作者，包括铁抗、王君实，以及《吼社》那几

个诗歌作者。⁶⁵

在另一篇文章《记郁达夫》里，他回忆说：

……其间铁抗接近达夫比较多，后来铁抗竟然辞去报馆的工作不干，躲在加东一个小楼上，对着大海埋头写他那个长篇小说《无火灾地带》去了；我不敢说这是直接受郁达夫的鼓舞的结果，但我以为多少是有点影响的，可惜的是不久便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后，铁抗在日本法西斯大屠杀牺牲了，他那部长篇就不知下落。⁶⁶

铁抗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1937—1942）的一位重要作者。他比郁达夫早两年南来（1936年杪），不过在国内并不是成熟的作家。他在1942年死于日本检证，死时才二十八岁，依此推算，南来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从1937年初开始，他在《星洲日报》“晨星”发表一系列散文、随笔和报告，如《秣陵残墨》、《明珠堂随笔》、《一九三一年北平》、《灰色的四川》等。在达夫南来前，曾接编《星洲日报》“文艺”周刊，经常在该刊撰写文学短论及短篇小说。自一九三八年八月底起，在“晨星”推出他那篇有名的《试炼时代》。1939年初，因“现实主义与朋友主义”问题，与张天白在“晨星”展开了一场绵延几个月的论争。1939年中至同年年底，接编总汇报的“世纪风”副刊，大力提倡文艺通讯运动。⁶⁷这期间，郁达夫大力予以支持，经常为“世纪风”撰稿。⁶⁸

当时，有一个在“晨星”发表过好些诗作的青年诗人冯蕉衣，生活贫困，郁达夫总是想办法接济他。1940年间，有一次达夫因患脚疾不能上班，便把副刊的编务委托这个不过二十来岁的青年诗人⁶⁹（冯蕉衣生于1914年11月21日）⁷⁰ 1940年10月，蕉衣终因贫病死了。郁达夫为了悼念他，在“晨星”副刊用整版为他出纪念特辑，亲笔题写版头《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除刊出他的照片外，郁达夫还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悼诗人冯蕉衣》。⁷¹ 郁达夫写道：

诗人冯蕉衣，和我本来是不认得的，到了星洲之后，他时常在“晨星”栏投稿，我也觉得他的诗，富于热情，不过修辞似乎太过于堆砌。

所以他投来的稿，我有时候也为他略改，有时候，就一字不易地为他发表。

经过了几月，他就时时来看我，我曾当面向他指出许多他的缺点。他听了之后，似乎也很能接受，近半年来，他的诗和散文，我觉得已经进步得多了。

在去年，他曾告诉我找到了一个教书的位置，说是待遇虽薄，但生活却安定了一点。过了半年，他又来看我，说是失业了。我也曾为他留过意，介绍过一个地方，但终因环境不佳，那个地方也不曾成功。以后他就一直的过着失业的生活，受尽了社会的虐待，这可从他最近的诗和散文中看出来。……⁷²

蕉衣生前，饱尝人间冷暖，屡遭失业的困境，经常要靠稿费还房租，维持生活。加上居住环境恶劣、医药费短缺，终致病亡。⁷³ 对于这惨淡的现实，郁达夫悲愤地发出呼告：

冯君当然是作故了。他的死，是极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地系受了敌人侵略而致有此结果的死。

他还是一个纯真的人，没有染上社会腐化的恶习。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忠实的抒情诗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许他活，恶社会不许他活；致使这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诗人，不得不饮泣吞声，长怀冤恨于地下，我们若想为冯君出气，若想为和冯君一样的诗人们谋出路，则第一当然要从打倒侵略者，与改良社会的两件工作来下手。⁷⁴

第二年（1941），郁达夫还为冯蕉衣的遗著写序。对蕉衣的人格，作了中肯的剖析。他认为冯蕉衣“并不是一位革命诗人”，他进一步指出：

……他对革命没有贡献，热情不够使他唱出能激发革命情绪的诗句，原是事实；不过他既生在这时代，受有一般教育，理性也极发达，意识相当正确，象这样的一个人，而会有反革命的思想，却是我所不信的。他也爱国，他也知道这社会组织的不合理，所以对于改革社会，打破邪恶的雄心，他一定是有的。所缺少的，就是直接推动革命的行动与

歌咏这些行动的热情而已。在这一个动乱的大时代里，若说不直接去参加革命，或鼓吹歌唱革命的人，就不配做诗人的话，那冯蕉衣或者在这独断机械论之下，并不是诗人。可是，社会是复杂，人类也是不一列的。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晓得有一位叫作“赛难古儿”的抒情作家，独居在乡间，写成了一部不朽的杰作《奥倍曼》。冯蕉衣的情形，我觉得同这一位作家，很有点儿相象。”⁷⁵

冯蕉衣的死讯，是另一个青年作家王君实（又署王修慧）向郁达夫转报的。⁷⁶王君实当年与郁达夫似乎过从甚密。他1937年南来，来时不过廿岁出头，先后在柔佛州的拉美士及苏门答腊的占碑地方教书，一方面在《星洲日报》的“晨星”、“文艺”，《南洋商报》的“狮声”、《今日文学》、《南洋周刊》，《新国民日报》的“文艺”、《新国民文学》，《总汇新报》的“世纪风”等刊物撰稿。⁷⁷1939年，在给朋友的信中，王君实说：

郁达夫先生来星洲已好几天了，听说要编“晨星”。前几天我尝同几个人去访问他，没有见到。我觉得他到了也是麻烦的事。如果他仍然是采石矶中之黄仲则，则见到现在这群戴名世，情形是不喻而知的。鲁迅先生又说他欠缺“创造脸”，自然这是可虑的事。最近，敝本家映霞女士出走的时候，他还在大公报登启事：“纷乱之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说起来，还是可爱的。因为这一点，我很想访问他，看看有没有“创造脸”。⁷⁸

过几天，他果然见着了郁达夫。在同年1月9日，他写信给朋友，说：“达夫先生已晤见，大约他也不喜欢现时的救国文学家，将来一定挨骂的。”⁷⁹这话倒说中了，后来即发生“几个问题”的争论笔战，郁达夫是“挨骂”了。最初，王君实对郁达夫的选稿，似有微词。在书简里，他说：

郁氏的编“文艺”，你觉得怎样？以我想，××一定气得要命！而“晨星”，亦似乎编得奇怪，我碰了一次壁，张一倩亦碰了壁！浩祥，子山，啸平的稿，一律未蒙刊出。

.....

“文艺”若是卓群编的，自然送去。但现在郁老择稿眼光甚为奇

怪，明珠暗投，岂不可惜。故大胆交白荻，并代他谢谢。⁸⁰

这种隔膜很快就消除了，不久大家就很了解。郁达夫后来不但重视君实等人的稿件，在君实离新然后返新之后，也曾多方面给予帮助，感情很好。⁸¹ 1941年初，王君实任《星洲日报》外勤记者。日本南进时期，郁达夫号召成立救亡团体，君实也大力支持，在潮侨中进行推动工作。当时郁达夫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文艺组主任，君实任副主任。新加坡沦陷后，君实留下未逃，受到日军搜捕，终于坠楼自杀，壮烈殉难。⁸²

1941年中，有两个曾经在“晨星”发表过散文与诗作的文艺青年吴冰、戴清才准备在吉隆坡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中马文艺》。郁达夫不只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在创刊号上还写了一篇论文式的文章，对马来亚这块文艺的处女地寄托了无限的希望。⁸³

至于苗秀，也是由于投稿而认识郁达夫。他的第一个短篇《红呢外套》发表在郁达夫主编的《星光画报》文艺版，受到达夫赏识，嘱朋友带苗秀去见他。自然，苗秀一面为“晨星”写了《浮渣》、《沦落人》等短篇小说，一面时常到郁达夫的寓所攀谈。⁸⁴ 他回忆说：

对于爱好写作的青年们，郁达夫常常不怕麻烦地个别指导他们该读那些书，创作该从那儿着手。朋友老杜那时也学习写小说；正如一切初学写作的人一样，他也染上了芜杂，琐屑的毛病，郁达夫把莫泊桑介绍给他，叫他学习这位法国短篇小说大师的简炼。老杜接受了他的意见，果然在写作上得益不少，以后逢人便说起这回事。……⁸⁵

为了让当地文艺青年继承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他不时选刊中国文协组织的知名作家的作品。1941年底，当郭沫若50寿辰与创作25周年纪念时，郁达夫想在“晨星”出一个特刊，曾经向苗秀拉稿，但后来苗秀并没有写给他。⁸⁶ 这次征文，凡是稍有可取的都一一发表于“晨星”，也可见郁达夫对年青一辈的呵护！在他这种热情关怀下，好多文艺青年后来都成了文艺界的积极推动者。1956年逝世的高云览就是受过他栽培的一个。⁸⁷

郁达夫扶掖青年，决不计较利害关系；即使素不相识的年青人，只要他力所能及，也一定助以一臂。有一段轶事最足以说明这一点。鲍君是一个刚

从中国南来的青年，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又没有靠山。他去树胶园申请工作被拒，正失业徬徨，几要跳海自杀，忽然灵机一动，跑到报馆编辑室找“文艺”栏的编者郁达夫。原来，树胶园主拒绝请他是因为不知道他的文学根底到那里，所以在拒绝之余，曾说：“……请足下做一篇新文艺形式的文章，投到××报的文艺栏里。我知道这文艺栏的编者是顶顶大名的文学家主持的。如果发表了，我立即用你。”鲍君就凭这点启示找上郁达夫。说明来意后，郁达夫叫鲍君写篇文章交给他。可是鲍君说自己白话文写不好（他的古文基础不错），他脸红红地请郁达夫代笔。郁达夫略为沉吟，说：“好的。只是照你所说，你底古文有基础么？普通的文言书信是可以应付么？如果是，我才能代你的，否则，不是误人太甚么？”几天后，署名“鲍君”的大作果然堂皇地刊了出来。这故事，是罗方先生听林四先生转述的。⁸⁸以郁达夫的一贯做法，热心助人一至于此实在是有可能的！

刘前度先生在《郁达夫在马来亚》一文里概述了郁达夫对青年的器重，他说：

他编的“晨星”，很喜欢提拔后进的写作人，只要内容好，写作技术成熟，都一一被录用。虽说他常常感到篇幅不多，要求投稿者写出的著作，最好不要超过三四千字，但是好的作品，往往超过这种范围，他都没有割爱，而尽量发表的。通常我投去的，多数为近代欧美作家小说的译作，他很快就将它登载出来，这不是说他和我有特别交情，只不过表示他对欧美小说的重视吧了。其实我和他仅不过有一面之交而已，记得他自己在“晨星”上，曾批评过温梓川的那本《南洋恋歌》，并阐述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希望马华写作人不要忽略此点，这实在是一句最切实不过的话。⁸⁹

五、抗日救亡活动

早在南来以前，郁达夫已经公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与侵略，而且积极参加抗日活动。⁹⁰他怀抱着抗战必胜，日军不久必亡的信念，为救亡运动不断尽力。就资料显示，在直接参予新加坡抗战工作之前，他间接地为有

关抗日救亡活动作了一些实际表现，比较突出的有：

一、由中国南来南洋作抗日宣传的武汉合唱团，在吉隆坡演出《原野》，请他去揭幕，他不辞劳苦地从新加坡驰往该地，且为文介绍。⁹¹

二、为昆明文协分会漫画展览团的展出及实验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作郑重的推介，为文艺评介开了先声。⁹²

三、当赵洵（即金山）、王莹率领的“新中国剧团”抵星公演时，他也大力支持，呼吁大家热烈援助，使抗战建国成功。⁹³

四、画家徐悲鸿与刘海粟先后南来为抗战筹赈，郁达夫也多方协助，为文宣传。⁹⁴

五、郁达夫虽在海外，但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这协会，简称“文协”。为了捐助“文协”，郁达夫在“晨星”版上提出问题，征求意见、办法，响应甚烈，但他是脚踏实地地处理，而不肯好高骛远。他甚至连同《星中日报》、《总汇报》各副刊，来一个捐助文协的文稿义卖周（1939年8月7日至12日）。他曾为文协筹得国币四万元，寄交文协，经收入老舍还写了一张收据，刊于1940年2月9日的“晨星”版上。⁹⁵

郁达夫以他个人的影响力，替华侨筹赈会的募款工作作了莫大的贡献。当时，新闻界人士自行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积极筹集捐款，郁达夫即任筹委会的主席。筹款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演剧，将售票所得的款项缴交筹赈会。⁹⁶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机偷袭美国的夏威夷的珍珠港。同一天，日军在马来亚东岸吉兰丹州的哥打峇汝（Kota Bharu）登陆，猛烈轰炸马来亚北部的飞机场，而新加坡也遭到空袭。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新加坡危在旦夕。⁹⁷从这个阶段开始，抗日救亡工作进入紧张阶段。从中国南来的文化界先进如胡愈之、王任叔、刘尊祺、王纪元、沈兹九、郁达夫、杨骚等，曾先后召集当地一部份积极的文化教育工作人士，在《南洋商报》同人俱乐部举行座谈，对时局及如何动员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交换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局势日益严重，而动员民众工作完全还没有展开，文化界必须负起后方精神动员的责任，于是决定在十二月下旬，假直落亚逸

爱同学校，召开全星文化教育界座谈会。当天出席座谈会的人数异常踊跃，包括代表书业界出席的陈岳书、王叔暘、包思井等，代表教育界的彭丙卯、庄奎章、王任叔、汪金丁、陈如旧、朱奇卓等；代表新闻界的胡愈之、郁达夫、王纪元、张楚琨等；代表文化界的杨骚、沈兹九、高岗等；代表美术界的林学大、施香沱；此外有戏剧界及音乐界代表多人。结果即席商定组织“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⁹⁸

议定后，筹委会就召开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成立大会。该团简称“文工团”。大会由郁达夫担任主席，即席推举出胡愈之、庄奎章、王叔暘、张楚琨等为文工团常务委员，为了赶紧展开工作，议决：

(一)限期成立战工人员干部训练班；

(二)组织若干口头，戏剧，歌咏宣传队。

文工团的抗战工作成绩，最优异的要算是文工团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和歌咏宣传工作。⁹⁹

训练班方面，郁达夫担任主任。¹⁰⁰为达成短期的政工人员训练的目的，课程包括：

学科训练：关于抗日的基本政治智识的训练。

术科训练：(甲)军事训练。

(乙)防空，救护……训练。

(丙)宣传技术训练（包括口头，壁报、漫画、歌咏、戏剧……）。

精神训练：利用朝会，晚会作精神训练与生活指导。¹⁰¹

该训练班一共招收了两次学员。正式开课时间是在1942年正月下旬，地点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¹⁰²郁达夫担任讲课，主讲日本问题。¹⁰³到第二期学员招收后不久，战局便日趋严重，战线日渐逼近新加坡，日机的轰炸也日益频繁，影响到日常训练作业。学校当局最后不得不将全体学员百余人分成四个战时工作中队，分驻在后港、梧槽大伯公、爱同学校等地。当时四个中队各有负责人，郁达夫则任大队长，胡愈之也兼任。到1942年2月上旬，日军已经开到柔佛，包围新加坡，训练班一部份学员和指导员，都正式加入民众武装部工作。¹⁰⁴

1942年1月初，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¹⁰⁵的委员会成立，胡愈之任宣传部主任，郁达夫则担任动员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同时担任文艺组主任。此外，他也是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的主席。¹⁰⁶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新加坡就开始准备军事防御工作。可是当时的计策是防止敌人从南方海面进攻，不料日军从北面马来亚大陆攻来，因此前功尽废，防御工作全部失效。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未免急来抱佛脚，虽然允许动员华侨抗日，但不免抱薪救火！英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开战的一星期内就遭复灭。守卫马来亚的英印军队节节败退。到了1942年1月底，日军已经攻抵柔佛的新山桥头，与新加坡只隔一条狭窄的柔佛海峡，开始发动对新加坡的总攻势。新加坡军港和中心区都在日军炮火射程中。日本空军狂炸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和沿岸的码头仓库。新加坡真是岌岌可危了。¹⁰⁷

值此生死关头，陈嘉庚以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身份，向新加坡总督汤姆士提出交涉，要求万一新加坡撤守，应该给予抗委会工作人员安全撤退的便利。可是总督告以不能负责。在燃眉之急的境况下，陈嘉庚决定和抗委会一部份负责人员，冒险撤离新加坡。他离开当天，抗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局势。会议上，大家认为英国既没有死守新加坡的决心，留在围城中，徒然牺牲，毫无意义。于是决定分批由海路撤退。¹⁰⁸

1942年2月4日清晨，郁达夫与胡愈之等文化人，乘着一只破旧的小电船，悄悄突破封锁线，离开新加坡。同船难民共有二十八个男女老少。郁达夫和胡愈之各人只带了两个手提箱。至于达夫的儿子郁飞，早在一星期前托朋友带回中国。¹⁰⁹十二天后，新加坡终于失守。英军投降，新加坡沦为“昭南岛”。

郁达夫逃离新加坡后，流离颠沛，后来在苏门答腊西部的巴爷公务（Pajakoem Boeh）居住，化名赵廉，¹¹⁰开设“赵豫记酒厂”。¹¹¹1943年，他因日语纯熟，被宪兵部迫充通译员。¹¹²同年9月，与当地一娘惹（nyonya）何丽有结婚。¹¹³1945年9月17日，遭日本宪兵枪杀。¹¹⁴

六、在新加坡留下的作品

郁达夫在来新加坡之前，从1935年起，在林语堂主编的杂志《人间世》

上发表了连串的回忆录（个别加上标题的“自传”），仿佛站在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回顾并总结他的过去。¹¹⁵在自传之七《大风圈外》结尾时，他曾说：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提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曹按：指辛亥革命），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¹¹⁶

他自命“热血青年”、“革命志士”，可见他心中充满了献身时代，“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崇高理想。这理想，在他一气走南洋后，¹¹⁷切实地表现在他的文学事业与抗战活动上面。

过去，郁达夫被指为具有“双重性格”的文学家，是颓废派的文人，苏雪林甚至毫不客气地贬他为黄色文艺大师及享乐主义者。¹¹⁸其实，郁达夫是个浪漫作家，他的浪漫性格也使他倾向革命化。当年创造社的一批作家都是由浪漫派转向从事革命文学的。1931年1月，贺玉波在《论郁达夫作风的转变》一文里就说：

作者已经从他那幽暗的斗室里醒来了，不专门描写青年的病态心理和变态性欲了，不专门诉说飘零流浪的痛苦了。他知道注意国内的政治，而对那些军阀，官僚，委员，要人们加以攻击；知道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征服弱小民族，而对那些被压迫征服的人们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象作者现在这样的作风，我们是十二分地敬重而赞美！我们更以满腔的热望和诚意，默视作者此后的作品有如雨后的春笋！并且他的作品应该比现在的有很好很好的作风。他将对这个混乱的时代中的残存着的不良社会加以更精确的分析，并且对下层阶级的民众所受的痛苦有更具体的表现。他这种倾向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虽然他现在的作品免不掉受一部份人的误解和攻击。……¹¹⁹

贺玉波指出的“这种倾向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终于在郁达夫来新加坡后发表的作品里获得证实。李冰人、谢云声合编的《郁达夫纪念集》中，谢

云声作序说达夫留新期间只有两年余，“所发表的文章除温梓川所编选《郁达夫南游记》而外，所遗漏者，亦属无几。”¹²⁰ 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温梓川先生编的《郁达夫南游记》只收文章廿二篇，而且渗杂了一部份郁达夫南来前的作品，如《闽游滴沥》、《瓢儿和尚》、《打听诗人的消息》、《残年急景》等。郁达夫当时在报界负责编务，除编外，写是不可少的“日课”。就现存旧报刊上署名“郁达夫”的作品大约有一百四十篇。这些篇章，分别发表在《星洲日报》、《总汇新报》、《星槟日报》等的副刊上。¹²¹

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即1939年1月1日），就在《星洲日报》上面发表一篇誓言式的精粹论文——《估敌》，¹²² 义正词严地论析日本的侵略行为与抗战的局面。这篇文章，写得笔锋锐利、层层深入，是一篇难得的充满说服力的政论散文。他开头指出：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缢鬼怖人，其数不过七十二变。纵使变尽狰狞丑态，犹不能摇动定者之心。结果，缢鬼只能自食其报，大叫一声，化作几点腥血，入瓮而就毁灭之范。我们抗战一年有半，侵略者无恶不作，无丑不演，现在是快到第七十二变的时候了！我们镇静观变，各线都趋于稳定，一九三九年的卯运新开，这时候正好来细数一数这怪物的种种伎俩。¹²³

郁达夫揭露敌人的“蚕食野心”，企图“灭我种族”，但中华民族绝不低头灭亡，而是奋勇反抗，以致敌人“食刺蝟而中伤，吞胡桃而遇壳，骑虎势成”。他指出敌人欺骗自己国内的驯良老百姓，让百姓们充当炮灰，还说是从“支那大陆里检来的狗骨”。¹²⁴ 临到结论，郁达夫表示敌人所占有的地方，只是线和点，甚至连线也时断时续，连不起来。他认为面的全部，仍然握在中国人手里。他说：

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非但我们自己有此信念，就是第三国的公平观察者，如《泰晤士报》的通讯员，英国放送协会B.B.C.的放送家B. Bartlet的自叙传《Intermission in Europe》的一书里，也在这样的说，其他凡熟悉东方情形，或亲自来中国视察过战地的欧美各国的先进，结论都是一

样。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生年！¹²⁵

这第一炮，确实反映了郁达夫离乡背井，南渡星洲，进行海外宣传的沸腾的
热心。¹²⁶ 这之后，他断断续续地发表了很多与抗战有关的政论散文、文艺评
论。这一类的作品，重要的篇章有《必胜的信念》、¹²⁷《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
与形式等》、《战时的忧郁症》、《略谈抗战八股》、《战后敌我的文艺比
较》、《抗敌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敌军阀的讳言真象》、《因谋保
章作家生活而想起的话》、《敌我之间》、《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等等。

作为一个文化人，郁达夫竭尽他当时呼告的天职。他那一篇篇鞭辟入
里、意气风发的论文，对于鼓起抗战士气，起过很大的作用。他高度关心抗
战，爱憎分明，正义凛然，当得上一个“爱国文学家”。¹²⁸ 正当中国抗战陷
于苦闷的局面，日本侵略者气焰万丈的时候，郁达夫却能够看到敌人的外强
中乾，看到中华民族的潜力深厚以及中国的前途光明，这不能不说是眼
光独到。文章里焕发出战斗的乐观精神。如果把这时期郁达夫的政论散文与
胡愈之所写的（主要是1941年）相比较，当可看出两人的文章风格与立论
特点。至于两人的影响，在南来的中国作家中也是最深巨的。在谈到“影响”
的章节里，我们将具体加以探讨。

郁达夫为人，原是带着一点“病态”，早期作品浓郁地披着晦暗的感伤
色彩，但此刻他反而奉劝读者不可忧郁过度，习染成病而致消极、绝望。他
甚至十分冷静、理智地要求每个人战胜忧郁，努力奋斗。他说：

当然，救国工作，千头万绪，一个人在一个时候，决计干不了，也
干不好；但极普通的一句话，就是确守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他或
她的最善做法，自然是遣散战时忧郁症的对症良药。这极平常的药方虽
系传自古人，药草也系采自平时的，但只教用之得法，则不问战时平
时，我们就可以算是不虚做了一世人了。……¹²⁹

达夫着眼的，显然是“救国工作”。早在《毁家诗纪》里他就明白表示：
“……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¹³⁰ 达夫能够这么直言不讳
地呼吁侨胞遣散战时忧郁症，绝不是偶然的。尽管郁达夫曾经在小说里如何
自我暴露、卿卿我我，尽管他在旧诗词里免不了酬唱感怀、悲歌哀泣，但他

始终没有遗忘时代，也始终想拯救“沉沦”残破的家国。

在《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一文中，他沉痛地报导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如何钳制国内的文化活动，压迫有正义感的文化人，使到日本文艺沦落到重嚼尸骨，搬弄古代文艺，写些虚伪歪曲的战争报导以及色情、怪异作品的地步。与此相反的，中国文艺在两年中，却有了二十年的进步。¹³¹此外，对于文艺的样式与内容，郁达夫都及时地提出他的看法。譬如对《抗战八股》，他并不如一般人一样把它打入冷宫，而是认为这种现象不过暂时存在，基本上是可喜的，因为大家都关心抗战，只要磨练成熟，必能摆脱八股。¹³²较早发表的《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也阐述了抗战文艺的写作问题。郁达夫了解南洋青年没有机会回故国战场经历战事，要写与抗战有关的题材，存在基本的困难。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用第二手材料，但一定要熟悉所写的题材，不能毫无根据，前后不接。¹³³他对作品的形式问题提出很客观的意见：

……战事爆发以后，小说的创作，当然减了色，因为它的宣传力不够，而群众的好奇心变易了的缘故。过去的小说，总是以几个人的生死爱欲，或喜怒哀乐为主体的，现在，则大批的人在那里死，那里逃，也在那里被敌寇们强奸，个人的恋爱，个人的生死，以及个人的感情的起伏，在这一大时代里，当然再也唤不起大众的注意了，况且小说的感情，是静的，纯一的，平面的；比起动的，复杂的，立体的戏剧电影来，当然要差得多。抗战以后，戏剧运动，歌咏运动，特别的会有长足的进步的原因，理由也就在这里。……这三年的进步，比民国以前的五十年，民国以后的二十年还要快，所以我们在今后，无论那一个作家，决不会，也不能再写三五年以前那么的作品了。但是大致的形式，总仍是存续着过去的遗迹的，不过，小说类中，以报告文学，叙述文学为主体。戏剧类里，自然以宣传短剧与歌剧为最盛。诗歌则当然要以能朗诵，能激发情绪的作品为大宗了。¹³⁴

除了上举代表性的政论散文外，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不久发表过一篇引起争论的“几个问题”，¹³⁵一时掀起一场文艺界风波。由于有关文章数量颇多，篇幅也长，此地不拟细说，留待第八章第二节《几场论争》再加以探讨。

郁达夫南来后，并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游记总共也只得三篇，即：《槟城三宿记》、《复车小记》和《马六甲游记》。¹³⁶以文比文，这几篇游记并不比他在国内写的游记来得精彩。在新加坡的郁达夫，旧诗词固然也写得不少，但杰作却难得，那两组名篇《毁家诗纪》和《乱离杂诗》，一是来新前写的，一是离新后避难苏门答腊写的。或许环境真的改变了达夫的心境，或许步入中年后的达夫真的一反青年时代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壮年时代名士型的闲情逸致，变得冷静平实了。他在新加坡的作品，显出功力的，反而是那批星散在报刊上的杂文和政论！除了上面提到的抗战篇章，郁达夫写了好多有关作家或美术家的评介文学，报导各国的文学动态，也发表一些话剧演出的观后感或文学理论，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有四十篇左右，包括《犹太人的德国文学》、《奢斯笃夫的去世》、《奢儿彭论文集》、《原野的演出》、《介绍雕刻家杜迪希 Karl Duldig》、《马华剧运的进展》、《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序李桂著的〈半生杂记〉》等等。从创作的数量，可以看出达夫写作之勤、论述之广。在有关篇章里，达夫又往往提出真知灼见。例如，在《犹太人的德国文学》一文中，他说：

影响全世界文学的旧约圣经，塔儿默特；影响德国狂飙运动，为歌德，雪勒作模范的大诗人兼批评家勒辛的著作，诗人海涅的珠玉似的诗和散文，斯必诺查的哲学，这些，都是犹太人的贡献，尤其是犹太人对德国文学的贡献；现在那一位滑稽小胡子，不晓是否为他家系上的一点与犹太人的纠葛之故，竟在大刀阔斧地毁灭他们自己的文化恩人了。德国文学，到了目下，也可说同日本文学一样，已经被军阀执行了机关枪的扫射。¹³⁷

此外，郁达夫写了一些主题鲜明的杂感文学，这类作品为数也有十余篇，如《日本的赌博》、《对新闻纸的饥渴感》、《废历新年》、《悼胞兄曼陀》、《古登白耳希的发明活字纪念》等。其中，《悼胞兄曼陀》是最值得一读再读的作品。在该文中，达夫剖析了自己的转变，愤慨地诉说自从大哥殉难后，各地杂志报刊都曾邀他写些悲悼或追忆的文章，可是他久久未能下笔，“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第五章

1940年底南来的胡愈之

除了郁达夫，胡愈之是南来新加坡中国作家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这里将辟一个专章，探讨他在新加坡期间的生活与工作。这部份的记录与考察，是前人从未做过的。

他比郁达夫迟两年抵达新加坡。在负起新加坡抗战救亡的工作上，与郁达夫比肩共事，教人钦仰。我们选择胡愈之为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并不以报人或报业史的角度来研究他。否则，大约同一时期，《星洲日报》的主笔俞颂华也是名赫一时的主笔，也是由中国聘来，我们似乎也该将他论列了。

一 主持报馆笔政

胡愈之（1896——）原名胡学愚，愈之是字。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从小住绍兴。他与郁达夫同庚，都是活跃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作家。² 随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他们都各尽其力，勉难从事。

南来前的经历

1910年胡愈之进绍兴中学求学，正值鲁迅在该校任教，所以也算是鲁迅的学生。1918年进杭州外国语专门学校求学。毕业后即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数学物理部的编辑工作。郑振铎当时也在商务任职，所以胡愈之与郑振铎的交谊极深。³ 1924年他往法国，进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研习“国际公法”（International Law），三年后回国。1930年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赴欧洲各国游历，后来经过莫斯科返国。回国后即写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接着担任“哈瓦斯通讯社”编

辑主任。⁴

1931年，他在上海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从事“济难会”工作。又协助编辑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1940年创刊）。1932年“一·二八”沪战发生，商务印书馆全厂遭日机炸毁，《东方杂志》也停刊半年。复刊后的《东方杂志》由胡愈之主编，但后来因为与出版家意见有违，终于辞职。⁵除了《东方杂志》，他也主编过《世界知识》半月刊。⁶

1936年，他与沈钧儒、史良等组织“上海文化救国会”，发表宣言及“抗日救国政治纲领”。⁷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郭沫若、邹韬奋、茅盾、郑振铎等合编该会机关报《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与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等二十人组织“复社”，在人力物力缺乏的情况下，出版了《鲁迅全集》。⁸

抗战开始后的翌年一月，陈诚（浙江青田人）奉命筹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二月一日，该政治部正式成立，陈氏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主管文艺宣传。胡愈之则任第三厅的第五处处长。不过，当时胡愈之还在上海，两个月后他才由上海到武汉出任这个职位。⁹在武汉，与达夫晤面，在一道工作。后来达夫先离开。¹⁰1939年，他与范长江（四川人）组织“国际新闻社”，继而出任“文化供应社”社长。自此，“国际问题专家”之名，不胫而走。¹¹

胡愈之与生活书店（1932年成立于上海）渊源甚深。许多出版工作，都由他决定或经手，如《文学》月刊、《太白》半月刊及《中华公论》月刊等。此外，他曾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也参与《世界文库》（1935年）的出版和发行。总之，生活书店最具生气的一段历史，是少不了胡愈之的努力的。¹²如果再追溯上去，早在二十年代，胡愈之已是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文学周刊》的上海执笔人。¹³他的文学理论与写作方向，与郑振铎、茅盾等是十分接近。在当时的文学界，胡愈之也是文艺批评的一个鼎足人物。他在《东方杂志》上曾发表过著名的文学批评文章：“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及“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¹⁴

1939年，生活书店各分支店遭到“国民政府”封闭。¹⁵该年6月，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次年，南京成立汪精卫政权。1940年，正是国共政权纷争激烈的一年。¹⁶胡愈之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同盟人士，

站的是“无党无派”的立场。他本来活动于上海，后来到武汉，随着战局的演变，也与达夫一样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他的南来，与时局的紧缩显然是不可分割的。

《南洋商报》的总编辑

1940年底，胡愈之抵达新加坡，十二月即走马上任，担任《南洋商报》¹⁷的编辑主任。不过，截至1940年12月31日止，《南洋商报》的头版仍然印明经理兼编辑主任是傅无闷。直到1941年元旦，报纸的头版下端才改印成：“编辑主任：胡愈之。经理兼督印：傅无闷”。可见胡愈之正式接任是1941年1月1日。在1940年12月2日的《南洋商报》，刊出胡愈之与王纪元两人合照的相片，附志新闻介绍如下：

“本报新聘国际问题权威胡愈之先生为编辑主任，聘名记者王纪元先生为编辑，二氏均已开始视事，本报暨《新国民日报》同人昨在大同酒家设宴欢迎。胡氏服务国内出版界新闻界十数年，经验极为丰富，对本报有不少革新计划，本月内将作初步改进，迨明年一月本报将以崭新的姿态与读者见面。”¹⁸

从1941年1月1日起至1942年沦陷前为止，胡愈之一直坚守岗位，在文化工作方面尽了他极大的努力。他启编的第一天，在第一版的“岁首献辞”即发表了他的一篇六千多字的论文《南洋的新时代》。这篇《南洋的新时代》与郁达夫启编时发表的《估敌》可说前后辉映，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站在舆论的领导的地位，他认为南洋面临了战争的威胁，战云已经卷向南洋。后来，胡愈之在一篇题为：《反省与呼吁》的论文里申述他对华侨新闻界的观感与期望。他说：

我来南洋不过数月，作为华侨新闻界的一名马前卒，我却有不少的感想和期望，愿意在神圣的记者节的前夜，向亲爱读者和华侨新闻界同人，竭诚罄吐一下。

华侨新闻记者，这是一种光荣的职业。因为华侨报纸有着光荣的革命传说。我们的前辈，数十年来，曾经为了启发侨胞们的民族革命思

想，为了发扬侨胞们的民主自由精神，为了提高华侨的国际地位，为了教育一般华侨大众，曾经耗尽了脑汁，用尽了心力，甚至为此遭受侮辱放逐、监禁、暗杀，以及精神肉体上的种种牺牲。如果新闻记者的本职，是担任民族革命的战士，一部份先进的华侨记者是当之无愧的。……………¹⁹

胡愈之自比为华侨新闻界的马前卒，足见他充满献身精神。既然从事新闻工作是“一种光荣的职位”，那么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责任是不得不认识清楚的。胡愈之特别提出三个重点给华侨记者们参考。第一，记者以工作换取每日的面包，但记者是属于公众的，是为公众服务的，他必须是“良心第一，面包第二”，这才配称得上“无冕皇帝”。他强调记者应该遵守的起码戒律是不能够为了面包而出卖良心，为了私人利益而歪曲真理。第二，华侨记者应该只有国家民族利益而没有任何私人的、党派的、帮派的利益，绝不可“枪口对内”。第三，华侨社会一般文化水准比较低落，记者们应该负起文化教育责任。为了负起启蒙辅导的工作，记者自身一定要“加紧学习修养，对于祖国与国际形势有正确与充份的认识，对于现代民主科学思想有深刻的素养”。²⁰

胡愈之希望华侨团结，民族团结，他重大局，重实力。他强调摒弃党派而对外抗敌。在他主持下，商报也以宣扬救亡抗战为前提，宣传无党无派的报格。其实，胡愈之的南来主持笔政，最大目的也是“海外宣传”。说来奇怪，与郁达夫一样，胡愈之早对南洋存有印象，憧憬着这热带之地。他来新加坡后，曾经追述：

我对南洋第一次发生了兴味，是要感谢许地山先生的。这是在十六七年以前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正开始激荡。在当时的青年作家群中，许地山先生是以“南洋作家”的动人姿态出现的。不但是“命之鸟”以及署名落华生的小品，使我领略到热带地方的风光，和迷人的南国的浪漫斯，而且在一个暑假中间，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和爱说爱笑的地山在一起。他的天真，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的对人生的热爱，是和生长在古老的国度的一些青年们，显然不同。我回忆着，由于当时和许地山先生的接触，南洋——这一个谜的地方——曾经有一时成为我的

青年时代的憧影之地。

现在我已来到了南洋，来到了现实的南洋。……………²¹

胡愈之实现了他的青年遐想，不但涉足南洋，而且主持一份战前数一数二的华文报的总编辑职务。作为编辑主任，主要的日务之一是撰写“社论”。当年的社论，习惯上是一人执笔的，除非例外情形，一般上都是由胡愈之执笔。²² 星期天没有社论，平常如果发表某位重要学者或专人的“专论”，则社论暂停。商报还出版晚报，晚报则有“时论”，没有社论。胡氏写社论极快。他写社论的习惯是等整份报纸排版完毕，看过全版再写，通常在午夜十二时才执笔，用毛笔一挥即就，随写随发出去排字，一张接一张地付排。²³ 他也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构思草写文章。²⁴ 当时他除了写社论，有时也在报上发表对时局的分析或篇幅较短的散文、杂评，如《在马来亚看到〈巡按〉的演出》、《李洪先生的死》等等。

胡氏南来前，早与郁达夫相识，而且同在武汉军委会工作过。南来后，胡氏与郁达夫当然仍保持情谊，不过，两人分开在不同报馆工作，交往似不密切，而达夫似乎有他自己的活动节目（见郁达夫一节）。在我们所见追忆达夫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到他与胡愈之的关系，委实遗憾！胡愈之自己倒提到这一点，他说：

达夫和我的私人友谊不算坏，但是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两人并无相同之处。在新加坡办报时，我们曾有过论战。后来在流亡中，单为了陈仪的问题，有时我和他几乎吵咀。一般的说，达夫不满意国内政治，但是他所不满意的是人，而我不满意的是独裁贪污制度。达夫对抗战前途有时带悲观的倾向。但是他的悲观不是由于反对抗战，而是由于不满意抗战的领导者。²⁵

1942年2月4日清晨，胡愈之与郁达夫及其他文化工作者悄悄离开新加坡，避开日军侵占的浩劫。

出长《南侨日报》

三年八个月的昭南时代过去后，随着日军投降与和平的到来，胡愈之等

又陆续回返新加坡，而郁达夫早已殉难在印尼了。胡愈之等人，本来就是在陈嘉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当年逃亡，陈嘉庚也先他们一步，匿迹印尼。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初，陈嘉庚即动身回新加坡。6日抵达新加坡。鉴于客观的中国政局，陈嘉庚并没有回国，反而逗留在新加坡，做他认为迫切要做的工作，如：调停新加坡的劳资关系，讨论“复工”问题，调查日本军队占领下的华人损失，关注当地华人的教育问题等等。²⁶ 为了团结华侨，寻求和平建设，促停内战，发扬文化，他在1946年11月21日，创刊了《南侨日报》（Nan Chiau Jit Pao），²⁷ 自任董事主席，而请胡愈之出任社长。报馆设在吉宁街42号至44号，与《南洋商报》的在罗敏申路，相去不远。第二年，《南侨日报》还增刊晚报，称为《南侨晚报》，一直出版到1950年，由于言论过激遭当局封闭，主要人员都被遣离境。²⁸ 胡愈之则在1948年英政府宣布紧急法令前离开新加坡，先到香港，次年一月返中国一直到今天。²⁹

胡愈之一本过去的办报精神，主持《南侨日报》的笔政。他孜孜不息地撰写社论、短评，发表杂文。在《南侨日报》的“创刊词”，他开宗明义地表示《南侨日报》是“为全南洋华侨服务的言论及新闻报道机关”。所谓“南侨”，不只是“南洋华侨”的简称，而是包含了更广的意义，那就是“团结爱国与民主”。³⁰ 他又阐明办报的宗旨：

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南侨是和平先驱，是民主堡垒。

战后世界成为天下一家，和平不可分，民主亦不可分。南侨要争取祖国的民主，也要争取当地的民主，要保卫南洋的和平，更不能不保卫中国的和平。华侨的责任是双重的，目标却是一样的。

因此，正如本报创办人陈嘉庚先生所揭示，本报言论，卑之无甚高论，唯以和平民主为宗旨。对内要和平，对外亦要和平。南洋要实行民主，祖国更不可不实行民主。唯有民主才能团结，亦唯有和平才能从事建设。正如日光空气为个人生存所不可缺少，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亦为民族生存所不可缺少。³¹

至于办《南侨日报》的态度，或者说立场，主要有四点：（一）和平重于斗争；（二）民主重于党派；（三）建设重于批评；（四）团结重于一切。³² 在《南侨日报》创刊

一周年纪念招待会上，胡愈之发表了演词，致谢一切爱护该报的人士，他说：

……在战后，马来亚报业曾经有短时期的繁荣，但从去年本报创办时开始，繁荣已成过去。去年本报创办时，在新加坡一共有六家华文日报，连本报一共七家，但到现在，这六家华文报中，已有四家停刊，从去年到现在，仍在继续出版的，只有两家战前的老报纸。但本报总算支持了一年。不但支持了一年，目前每日出早晚刊三大张，在本坡只有本报一家。本报销数及广告收入，都比年前增加一倍，这都是本报创办时意料所不及的。

各位先生，何以别的四家报馆都停刊了，《南侨报》却能生存发展？这几家停刊的报纸，有的是大资本家独资经营的，有的还有党部特别津贴，他们都是拥护“国民政府”的，但是都不能维持，那么，《南侨报》是靠了什么？《南侨报》并没有比别家更雄厚的资金，《南侨报》的工作同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本领，《南侨报》为什么能够维持而且不断发展，都应当归功于各界侨胞和读者大众。……………”

他笃信“诚信”二字，认为就办报而言，“诚”就是说公道话，说良心话；“信”就是说真话，说实话。不骗人，不说谎话。”譬如中国内战，不能说为“军事演习”，国币价值猛跌，不能说成“一天比一天涨”，总之，办报不能瞎说。”

当年胡愈之办报，确是很有气魄，很有内容，脚踏实地。他那一篇篇精彩的社论，也风靡一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就他崇信民主的立场，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词锋凝炼，并无滥发所谓“过激”的言论。倒是他离开新加坡后，《南侨日报》的版面反而显得平淡，而言论早由别人执笔。胡愈之在回中国后，还曾写一篇《寄给远方的朋友》，以纪念《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在文中，充分流露了他对新加坡的怀念及对和平的展望。”

除了主持笔政，胡愈之也主编杂志等；关于他的其他活动，在下一小节再加研究。

二、其他重要活动

这一节，集中论述胡愈之在主持报馆笔政以外的其他重要活动。至于他

私人的生活，并不象郁达夫一样乐为人道，到现在未见有什么特别追忆他在新加坡期间的轶事的文章。

与沈兹九结婚

胡愈之南来后的第二年（1941年），在新加坡与沈兹九（1904—）结婚。当时胡愈之已经四十四岁，沈兹九则三十七岁。沈氏是在1941年8月从中国转道香港南来新加坡的。³⁷她在1930年在上海加入政党活动，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一向是妇女运动的先锋。³⁸关于她的活动与贡献，将在下一章另节评述。她与胡愈之都曾经在三十年代为生活书店担任编辑工作，异地重逢，而致结为夫妇，传为佳话。杨骚当时在新加坡，曾以一联庆贺他们，语带戏谑：“一对新夫妇，两个老物儿”。³⁹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夫妇两人逃到印尼，继续华侨抗日工作，研究印尼问题，⁴⁰后来还曾流亡到婆罗洲一带。⁴¹

抗日宣传

与郁达夫一样，在新加坡沦陷前，胡愈之直接参予当地的抗战工作。关于这期间有关活动的部署，在“郁达夫”一章里已经有清楚的交代，此地不赘。这里只归结一下胡愈之的职务。胡愈之参予以陈嘉庚为领导的“星洲华侨抗战动员总会”，他是无党无派的身份，不象有明显党派身份的林谋盛（劳工服务团主任，代表国民党），林江石（民众武装部主任，代表共产党）。⁴²当时胡愈之是担任宣传部主任。⁴³在这之前，他也参予“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工作。当时郁达夫任团长，他任副团长。⁴⁴在宣传工作上，胡愈之不遗余力，奋勉从事。他与郁达夫等，都是工作到最后一分钟，在兵临城下的生死关头才越过封锁线而逃亡。

主编《风下周刊》

日本投降后，胡愈之重返新加坡。在《南侨日报》创办之前，他已经主编一份周刊《风下》。这份《风下周刊》于1945年12月3日发行，“开场白”（创刊词）阐述战后华侨的责任，呼吁团结，争取民主和平。这周刊每逢星期一出版，16开本，页数不多，但图文并茂。印刷虽然不算精美，

也没有彩色，但内容相当多样化，是战后一份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

《风下》前后出了132期，⁴⁵最后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48年6月26日。⁴⁶在第127期的《风下周刊》已刊出胡愈之写的“我来了香港”，⁴⁷可见他在这之前早到香港，后期的《风下》相信不是胡氏自己主编的。

胡愈之以“沙平”的笔名在《风下周刊》上发表长篇连载小说《少年航空兵》。⁴⁸胡氏几乎每期都有重要文章发表，大都与时事有关。在《风下》发表文章的作者，主要有巴人、杨骚、沈兹九、金丁、夏衍、陈仲达、杨嘉、宋千金（李润湖）、明伦等。此外，胡愈之时不时刊出著名的中国作家（不曾南渡）的作品，如茅盾的《生活之一页》、《久长的纪念》、郭沫若的《开拓新诗的路》、适夷的《这不是一个梦》、王鲁彦的《新的枝叶》、马凡陀的《张百万》、何其芳的《谈民间文学》等。⁴⁹这些作品的发表，增加本地文艺界借镜的资料，是难得的、可取的。关于这方面的作用，本文第八章第一节再细加探讨。

由于种种因素，今天要找到《风下周刊》的原书已经是十分困难了。由于一些篇章的言论，颇为猛烈，后来终于停止出版。

民盟的代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有消息，传说胡愈之病故。据郑振铎《蛰居散记》“忆愈之”中述：

日本投降的时候，从内地来的消息说愈之已经在南洋病故。我不肯相信这悲惨的恶耗。……但消息渐渐的被证实了。听说“中学生”曾经出版过一个纪念的专号。……关于愈之病故的误传，当时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但此文发表时，已证明是“海外东坡”之谣。⁵⁰

其实，故传亡故的事，在战争逃亡时期是屡见不鲜的。胡愈之如果不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逃离，相信早已被检枪毙。他在战后回新加坡，出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马来亚支部”的主任委员。⁵¹民盟是属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具有调和国共的作用。它的成员大都是无党无派的知识份子，在中国，闻一多、李公朴、张表方等为主要领导人。⁵²当时，新加坡的民盟支部有发行《民主周刊》，后来又在《南侨日报》上刊出。民主周刊社是设在哥烈溪

埠 (Collyer Quay) 16号4楼。

胡愈之曾在1947年，答复人家的提问。他认为1947年是“民主运动胜利年”。他表露了对战后民主政治的信念，他说：

在海外（指马来亚，印尼以及东南亚整个局势），你只要看越南，缅甸，爪哇，苏岛都在动荡中。民族解放运动的怒潮已经在到处掀起。在马来亚，虽然比较安全，但人民对民主自治的要求，却是坚强而普遍。要求马来亚有一个真正民主自治的宪法，现在已成为各阶级各民族的共同呼吁。连一向不谈政治，怕谈政治的许多华侨领袖，现在对马来亚政制问题也已纷纷提出意见了。”

他坚持“民盟不直接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但对于当地民主运动，决不能漠不相关。”他认为“在必要时民盟以第三者的客卿地位，对马来亚宪法问题提供一些意见和资料，以供当地侨胞的参考，这也是民盟的份内事”。他以为“民盟在国外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宣传教育”，即宣扬民主思想。他认为“民主是无分中外的”，“民主的潮流虽有主流支流之别，但不是局限于一个地域，一个国家，而是汇全世界为一流的”。⁵⁴ 1946年6月8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曾刊出一则新闻，标题是：

“民盟星洲办事处

电国府及中共反对内战

要求美国勿对内战任何一方作军事援助”

可见民盟的立场始终是制止内战。

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演变，1948年胡愈之离开新加坡，先到香港，终于回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他担任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⁵⁵ 离开新加坡后的胡愈之，仍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化界。

报导郁达夫死讯

胡愈之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前逃亡苏门答腊，与郁达夫一同过流亡生活，几乎有两年时间时常在一起（后来他们分开，而达夫在印尼再度结婚）。胡

氏对郁达夫的流亡生活与失踪前后经过确是知道得最亲切。⁷⁶他在日本投降后回新加坡。1945年10月5日星洲文化界筹委会举行座谈会，地点在大门楼张氏公会，报学两界出席者有四十多人，庄奎章被推任主席，胡愈之也受邀到会。庄氏报告座谈会的目标在联络文化界，认定今后进行的路线，并提出华侨学校注册及领受当地政府教育津贴的问题，请到会者发表意见。之后，请胡愈之演讲国际情势。胡氏在座中拍掌声中起立，他说：

本人久处乡村，最近三四年来之国际情势，不甚明瞭，无已拟将星洲文化界流亡在外之情形作一简略报告。当北马战争紧急时期，星洲报学界同人纷纷向苏岛及附近小岛逃避者，连同眷属计达百余人，先聚后散，行踪无定，，不幸而遭病故者，计有爱同学校校长黄光建君，南洋女中教务主任刘道南君，尚有吉隆坡民众义务学校校长郭后觉君，在北干峇汝被敌宪兵所捕，备受惨刑，死于狱。本人最近曾在石叻班让开一小小追悼会，追悼三君。尚有一事不得不报告者，厥为郁达夫失踪情形。

郁君三年前逃至苏门答腊西部，改名曹来，在巴爷公汝小市镇设一小酒厂，于一年后，因日语纯熟，被敌宪兵部迫充通译员，郁君在奉职期间，苏岛西海岸华侨赖其片言营救至众，故与同侨感情融洽。前年七八月间被一由星洲前往之某汉奸认出郁君真面目，向敌宪兵部告发，甚至连逃亡苏岛之文化人姓氏，亦和盘托出，幸敌宪兵部不欲追究，诸人乃获无事。郁君虽在宪兵部任职，然目睹敌兵之残酷手段，每与余言而痛之。迨本年八月廿九日，和平消息已传遍苏岛各地，是晚郁君正在寓所与友叙谈，突来一怪客，不辨其国籍，迫郁君至屋外，郁君穿短衣，拖木屐，随之外出，即一去不归。翌晨，据邻近小屋中一土人谈，是晚见有一小型汽车，停小径中，见有二人登车后即驶去，车中人似操日语，该地敌宪兵虽在表面上帮同搜寻，但杳无踪影。据各方推则，当系日敌惧郁君日后证明其暴行向联军总部控告，故将其架去，亦未可知，郁君夫人即于其夫失踪之后一日诞生一女，母女三人现尚寄居该地，关于抚恤遗属等事，文化界及与郁君交好者责无旁贷云。⁷⁷

胡氏报告了郁达夫的死难消息之后，还顺带谈到文化问题，他提出三点宝贵的意见：

(一)海外华侨地位要提高，首应注重自治，教育慈善事业，均应由华侨自办，不必依赖他人。

(二)文化地位要提高，今后应组织起来，勿自暴自弃。

(三)文化工作者之责任。”⁵⁸

他“力促华侨不分帮派，团结一致，更应注意侨生教育”。⁵⁹胡愈之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政论家与社会运动家。

纪念鲁迅

早在胡愈之南来前，他已经协助许广平等编印《鲁迅全集》。他也写过一篇纪念文字“鲁迅——民族革命伟大斗士”，收在《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内。1947年10月19日，新加坡各界代表在小坡余街的海员联合会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出席者有几百人，大会主席是汪金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除了胡愈之，还有文化工作者张昆与吴昆华、职工总会代表谢仪、妇女联合会代表伍亚雪及戏剧界人士杨嘉、教育界人士薛永黍等。胡愈之的讲话强调：“鲁迅不仅是中国翻身的导师，而在整个亚洲亦然，他永远代表被压迫人民说话，对民族问题（的主张）是一切平等，教人不要做奴隶。”⁶⁰

当年文艺界的重大活动，胡愈之总是在邀之列，而他的讲话，往往也受到重视。

三、在新加坡留下的作品

胡愈之在1940年12月到新加坡，1948年3月离开新加坡，除去三年八个月的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流亡岁月（在印尼），前后客居新加坡大约有两年八个月，不及三年。在这不及三年的时间里，他留下数量可观的作品，可惜至今没有一个人把他这时期的作品蒐集出版，因此，这些作品始终散落在报章杂志之上。在这一方面，比起郁达夫，较少受人注意。至少，郁达夫的诗词、游记与一些散文，很早就有人把它们汇编成集子。

以下，分战前及战后两个时期窥探一下胡愈之所写的作品：

战前（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

所谓战前，并不是指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而是指新加坡卷入战争（即沦陷）之前的一段时期。

胡愈之出任《南洋商报》的主笔，以他丰富的国际问题知识及对中国战局的切身体验，为本地舆论界作了先锋。他的社论，集中对中国战局的分析、预测日本挥军南进，分析欧洲大陆的战云变化，呼吁南洋华侨不分党派地团结抗敌，……总之，强调华侨合作，共同负起救亡的工作。他所写的政论散文，比郁达夫所作更为具体、深入。胡氏的政论，文字浅白，字字有力。他喜欢用重复交错的表达句式，层层深入，也喜欢逐点说明，分出（一）、（二）、（三）、（四）……一点比一点点中要害。他甚至对同一问题一论再论，仿佛论证不休，充分表现他惊人的剖析能力与说服能力；如对“保卫南洋”这一问题，就连四天连论四次：

1 “论保卫南洋——战争是不是还能够避免？”（1941·2·14）

2 “再论保卫南洋——怎样避免战争的来临？”（1941·2·15）

3 “三论保卫南洋——保卫南洋与保卫中国”（1941·2·17）

4 “四论保卫南洋——英美合作问题”（1941·2·18）

又如申论《南洋商报》的立场与态度，也是连珠炮式地立论，共用同样的大题（副题则不同）六次。⁶¹当时的社论，每篇大约一千五百字左右，有时例外，甚至会用半版的篇幅刊出，但这种情形极少。在社论中，往往也提及“中央”、“蒋委员长”、“祖国”，这是对海外华侨立论的习惯，当时的观念还是以中国为祖国，以南洋为第二故乡。当然，就地论事，除了分析总的世界局势，归根到底还要谈到保卫星马的问题。凡是世界战局有新的变动，他一定就最新资料作为立论的根据。时移势易，随着时间性的过去，这些政论都变成历史材料了，虽是明日黄花，但它们的意义还是不可抹煞。

研究胡愈之的政论是可以成为一个专题研究的，这不是本文所能胜任。就真正署名“胡愈之”而发表的文章而言，主要的有下列一些，有些篇幅极长，几占整版的篇幅：

1 “南洋的新时代”（《南洋商报》新年特刊“岁首献辞”，1941

·1·1）

- 2 “在马来亚看到《巡按》的演出”（《南洋商报》“狮声”，1941·1·16）
- 3 “论南洋华侨两大——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浪潮”（《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3版，1941·4·6）
- 4 “追悼许地山先生”（《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0版，1941·8·10）
- 5 “李洪先生之死”（《南洋商报》第11版，1941·8·31）
- 6 “反省与呼吁”（《南洋商报》星期刊“新南洋”第22期记者节特刊，1941·8·31）
- 7 “国际新形势与中国——一个提纲”（《南洋商报》星期刊“新南洋”第24期，1941·9·14）

“南洋的新时代”是胡愈之正式接任主编时发表的一篇长文，刊在报纸的第一版，洋洋大观。文章主要是分析战争中的世界、战争中的祖国（即中国）、战争中的南洋、保卫中国保卫南洋及“怎样迎接新时代”。这篇长文，显示了胡愈之的功力，既有文采，又有由表入里的“剥茧抽丝”的分析力，真是一篇代表作。他说：

一九四一年到来，南洋的新时代到来了。

战争是新时代的号角。

战争是残酷的，痛苦的，但是战争却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前进。战争划分历史的时代。一切陈旧腐败的在战争中没落，一切光明进步的在炮火中孕育成长发展。

第二次的欧洲列强大战爆发已经有十六个月。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已经有三年半。这两大战争，将要带来了人类的新时代，远东的新时代，中国的新时代。

南洋，现在是这两个大战争的交叉点。

列强大战使南洋遇到了又一次的战时繁荣，提高了南洋的军事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但是列强大战也给南洋带来了侵略者的威胁，带来了苦痛，磨难，沉重的担负和战时统制。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唤醒了热带人们的渴睡，激发了占

南洋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侨民的爱国心，提出了东方人民民主自由斗争的模范。自然，这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掀起了南太平洋的狂风巨浪，使在南洋的人们增添责任，增添忧虑。

总之，南洋已不是旧时代的南洋了。南洋到了一个新时代。

怎样认识这南洋的新时代？怎样适应这南洋的新时代？

首先，我们应该张眼看看世界，因为南洋是世界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啊。

我们应该回头望望祖国，因为南洋到底是中华民国出嫁了的女儿啊。

..... 62

胡愈之在南来前，已经切身体验中国的战局。以他来谈处于战势后方的南洋该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接着以细腻然而单刀直入的笔调谈论世界大局。他认为“列强大战是一个长期战争”。他感到“战局愈扩大，战争愈深化，全世界人民的苦难也愈益增加，旧世界的崩溃也愈益迅速，起而代之的将是真正民主的势力，人民大众的势力。”⁶³接着，他提出中国必须“在抗战中完成建国”，争取“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他主张在经济方面，“加强生产建设”；在外交方面，更进一步与友邦合作；在政治方面，“严格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制止“分裂投降危机”。⁶⁴从大到小，由一般到特殊，他笔锋一转，转向论题的中心——“战争中的南洋”。他指出南洋实际上已经变成战场。既然战争逼近南洋，南洋的地位就日见重要。他分析道：

在军事方面，新嘉坡将成为世界大战的主要的决战场之一，这是许多军事学家所久经预言的。从海军的战略观点说，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只有苏彝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才能与之相比。尤其自从新加坡海军根据地的伟大工程完毕以后，成为东方最大的军港，要称霸南太平洋，就必须控制新加坡。不要说这是英帝国在远东的第一道国防线，为了保卫荷印，保卫澳洲，保卫菲律宾，甚至于保卫新大陆，都必须首先注意于新加坡。新加坡的防务成为英美澳太平洋联防问题的中心，不是无故的。在以前，南洋的各港口，只是为了西方商船转运停泊的便利而建筑的，但在今天，新加坡成为第二直布罗陀，而南中国海却成为第二地中海。

海了。

南洋的军事地位提高了，经济地位提高了，政治地位提高了，这表示南洋的新时代的到来，但这也表示南洋的更严重的危机的到来。……正象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的，日寇的侵略，已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事实。……………⁶⁵

胡愈之的剖析，逻辑性极强，但后来事实证明日军用“陆攻”，侵略不是来自“海上”。当时报界称日本军队为“日寇”，以后在报上仍一直采用。胡愈之认为“要保卫南洋，首先必须保卫中国”，这理论以后在他写的社论里反复发挥、补充。他的结论是：“这将是南洋各民族团结合作的时代”。⁶⁶

胡愈之与郁达夫一样，用了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写法，使人们坚定抗战的信心，使人们瞻望胜利的前景。这种写法，正如亨德说的，是“兴奋的文学”。⁶⁷后来 he 发表的另一篇长文“论南洋华侨两大会议：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浪潮”，更阐述了他对南洋华侨的深切寄望。他始终强调“团结”、“民主”与“无党派”。这些论见，与民族抗战的统一方针是相配合的。就当时的舆论界，胡氏的文章无疑起过很大的带头作用，这些有关的细节，留待“影响”一章再加研究。这里不妨探讨一下两篇文艺性比较强而篇幅也比较短的散文，一是“在马来亚看到‘巡按’的演出”，一是“追念许地山先生”。前一篇写于南来后不久（发表于1941年1月16日），后一篇则写于较后的时间。在前一篇，他隐隐约约透露了南来的感想，他说：

许多人问我来了马来亚有什么感想，我的回答是：马来亚是出于我的意想以外的。因为有很多的事使我意想以外的满意，但也有很多的事使我意想以外的失望。

星期一晚在维多利亚剧院看了“巡按”的演出，这至少是使我感觉到意外满意的一件事。因为在马来亚看到了这一世界名剧的演出，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演出，这在我实在是喜出望外的。⁶⁸

所谓的“意想以外的满意”，相信是指南洋华侨热心于救亡工作的表现，所谓的“意想以外的失望”，恐怕是指一些阻挠抗战救国的措施以及一般民众

的文化水平等等。这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与其他文章可以获得旁证。胡愈之对《巡按》有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该演出是“中国化”的演出，与他前两次（一次巴黎，一次上海）所看的演出不同。他用弦外之音写出他的观后感：

如果说这次的演出，还不够现实主义的话，那只是因为中国的官场要比帝俄的官场还要愚蠢可笑得多，所以甚至象果戈里那样的喜剧大师，都嫌描写得不够深刻了。无论如何，这次“巡按”的演出，是有深刻的现实性的。我想，每一个观众，看了回去以后，对于故乡与祖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改善中国政治、肃清贪官污吏的要求，会有更现实的理解。

至于我呢！我从维多利亚剧院出来的时候，觉得我不在巴黎、不在上海，也不在马来亚，我在中国，而这是出于我的意想之外的。⁶⁹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在香港病逝。噩耗传来，第二天，胡愈之就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很感慨地指出许多人背叛了“五四”的精神，而许地山是极少数不背叛五四的可敬的英雄。他惋惜道：

……他到底还带着“南洋伯”的脾气与热情，他没有一天背叛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他是研究宗教学与印度哲学的，但他是用病理学家研究血毒的方法去研究的。他读了很多的线装书，却教青年不要学他。他是远东最最古色古香的古老大学的汉文学教授，但是他却主张废弃汉文，而且自己用全力提倡新文学运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许地山先生对中国的文字改革，都尽了极大的努力。

.....

许地山先生逝世了，让憧憬的南洋永远逝去罢，现实的南洋向着民主科学的大道迈进！许地山先生也一定是这样相信着的。⁷⁰

胡愈之下笔为文，总是从现实出发，即使追念许地山，也想到许地山曾经来过的南洋的当前处境。至于“李洪先生的死”一文，胡愈之用无限悲愤的心情，抒写他对为正义而罹难的新闻工作者的至高崇敬。他“欲哭无泪”，内心无比沉痛，他“没有悲哀，只有愤怒”。⁷¹

战后（1945年终至1948年中）

新加坡沦陷期间，胡愈之伏居印尼，和平后，重返新加坡，并未回中国。他大力协助陈嘉庚，着重南洋华侨的团结问题，强调战后华侨的责任，当然，对于当地政制，也不时发表意见。在出长《南侨日报》⁷²之前，他主编了一本综合性杂志《风下》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期数很密。在“风下周刊一年以来”（《风下》第52期，1946年11月30日出版）⁷³一文里他说：

《风下周刊》诞生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到本期为止出了五十二期。算来整整是一年了。在一年中，《风下周刊》所处的环境，也多少有些变化。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明白。当《风下》初出世的时候，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出版界，还是空前的热闹。走进书店里，便可看见几十种新刊物，综合、文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令人有美不胜收之感。《风下》的出版，不过是凑一凑热闹而已。但到后来，有些刊物是因为不景气影响，有些是因为政治环境的改变，有些是因为人事变化，陆续宣布了停刊，到了现在，全马来亚的刊物，出版历史较久的，除了《现代周刊》这位老大哥之外，就只有《风下周刊》而已。想不到仅仅一年工夫，《风下》就成为马来亚的老牌刊物。除了对一年来停刊的无数兄弟刊物表示惋惜外，我们对于马来亚出版界，更不胜今昔之感。……

做到老，学到老，这是对青年人的最有益的箴言。在过去一年中，《风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帮助青年学习。即使世局如何变化，《风下》决不变更它的任务。这就是说，本刊要继续帮助青年学习，而且同时也向青年学习。本刊愿与读者共相策励的，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不过要记住，学习是为生活，为工作，学习不可脱离生活与工作。（1946年11月30日）⁷⁴

如果说战前胡愈之对本地文艺比较不密切，则战后的胡愈之对本地文艺尽了一些开垦的工作，尤其为寥落的出版界，尽了他一分力量。和郁达夫一样，他是爱青年与扶掖青年的。《风下》办得颇有朝气，成为一时的代表刊物。

胡愈之当时时常以“沙平”为笔名，著名的幻想小说《少年航空兵》，即从《风下周刊》创刊号连载至第39期，1949年在香港出版单行本。”胡氏发表在《风下周刊》上的文章，题材广泛，大都与政治现实有关，往往刊于每期之前，可见份量之重。这批文章，为数有110篇，包括“关于华侨地位的新认识”、“论华侨的双重任务”、“南侨回忆录”（书评）、“华侨新爱国运动”、“不要忘记失败”、“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马来亚还是年轻”、“华侨的祖国”、“马来谣”等等。

当时胡愈之的文章曾引起新马文艺的反响，后期还曾引起一些论争。上列发表于第105期的“从牛角尖看世界”即是一例。一个署名“小李”的作者在1948年1月12日的《南侨日报》第5版“出版周刊”上曾写了一篇“‘风下’劝人勿钻牛角尖”，略有记述，可窥一斑。他说：

记得胡愈之先生在《风下》两周年纪念号上写过一篇“从牛角尖看世界”，他是把新加坡譬喻作世界的一个牛角尖的。现在，马来亚竟真的有人钻进牛角尖里去了。最近《战友报》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马来亚华侨与政制斗争”，一篇是“谈马华文艺”），发出马来亚中国人和中国完全脱离关系的论调，这在理论上显然是钻进牛角尖里去了。因此沙平先生在最近一期的《风下》上写了一篇“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对那两篇文章提出善意的批评。沙平先生这篇文章是写得很透澈的，我以为凡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读。……………⁷⁶

至于《南侨日报》的社论，胡愈之则写得更为“切中时弊”，笔锋比战前更为锐利。例如“内战与民变”（1946年12月2日）、“当地政制与华侨”（1946年12月3日）、“工潮与当局的责任”（1947年2月1日）等等，都是就事论事，言之有物。有时，胡氏也在《南侨日报》副刊“南风”版上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发表时列在一个花边内，总括为“两斋废话”，但写得并不多。如：

1 “愚民的智慧” （1946·12·2）

2 “农民剧” （1946·12·3）

3 “亚洲的民主” （1946·12·4）

4 “我的老师” (1946·12·6) (以后陆续写了好几篇“我的老师”)

5 “汤寿潜” (1946·12·19)

就风格而言，这些篇幅短小的文字，与滔滔长篇的政论文字似有不同，主要是写得更精炼、亦谐亦讽，耐人寻味。兹录“我的老师”一文于下——

当我在中学读完了二年的时候，家里负担不起学费。我的父亲就说：“现在的学校功课没有用，你还是拜一位老师，把国文的根底打好，做一件事吧！”

于是我拜了一位老师。他就是我们邻县绍兴的名宿薛朗野。

这位薛老师是在浙东以精通经学和舆地学闻名的。年纪五十多岁。因为大半生埋头在故纸堆里，背部向前弯曲成六十角度。目近视到看书的时候，鼻尖会碰上纸面。

这老师有十六个字的座右铭：

守旧守弊 维新维利
中立而倚 奄奄无气

从这四句话可以看出薛老师之为人。他自己承认是保皇党，可是他只是个穷秀才，没有做过官，所以不能算是遗老。他主张致知格物，就是崇拜科学，但不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他不主张守旧，又不主张维新，这本来已经很难做人了，还要中立而不倚，换句话说，是第三方面而决不落水。这不用说，现在的名流学者大都不能做到，就是三十年前的读书人中间也是很少有的。

正因如此，所以我的老师虽然算是一位名学者，但是十分穷，穷到只有一件蓝皮大褂。人们不能理解他，都称他作怪老师，甚至称作疯老师。”

当然，还有一篇叙述精详、文字饱带感情的长篇散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本是写给全国文艺界协会的一个报告书，1946年8月24日写毕，后来交到香港印成单行本，于同年出版。这是一篇研究郁达夫晚年生活与遭遇的一篇核心著作。单行本附录了郁达夫在苏岛写的“乱离杂诗”十一

首，又有胡愈之自己的按语，是珍贵的史料。由于郁达夫死后，新加坡一些文化界人士，曾对他有所误解，揶揄他生活浪漫、甘心事敌。为了说明郁达夫的清白，胡愈之就事实的经过，愤悲地一点一滴叙述出来，以正视听。⁷⁸他在结论中写道：

达夫无疑的是时代的悲剧的主角。他热爱他的从前的妻，而他的妻背叛他。他爱朋友而朋友出卖他，诬蔑他。他爱同胞，而许多人不理解他，他象耶稣一样地爱敌人，原谅敌人，他终于遭了敌人的毒手！

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对于象达夫这样一个复杂的不平常的人物及其思想作品，要作一个正确的评价，应当是未来中国文学史作者的事，而我不配。一年以来，为了无数文化界难友的殉难，我的泪也哭乾了。我再没有泪哭亡友达夫。我对达夫的死，就祇不过有这一点点迷惘的感想而已。⁷⁹

第六章

1937年中国抗战后至1941年 南来的其他中国作家

属于第二个时期南渡（1937年中国抗战后至1941年）的中国作家为数最多。前面两章专论过了郁达夫与胡愈之，这一章，将逐一讨论其他在这期间南渡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

在这些中国作家中，高云览及汪金丁最早南来（1937年底），在中学里教书。之后是冯伊湄、王莹和金山（1939年）。1940年底王纪元跟胡愈之同时到新加坡上任为《南洋商报》编辑。第二年（1941）上半年杨骚南渡，7月王任叔抵达新加坡，8月沈兹九也来。至于陈残云，大约也在这一年稍后时间南渡，只是确实月份待考。

为了论述上的方便，重要的作家各辟一节，资料少而比较次要的作家合在一节。

一、高云览

高云览
1937年底南来，中学教书。1930年出版中篇小说“前夜”上海左翼作家联盟。1938-39年写了一系列以抗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1949年被逐出境。

高云览（1910——1956），又名高咏览。福建厦门人。父亲是荷属安汶的老华侨，回厦门后，从六十三岁到七十二岁一直在商店当小书记，工资微薄，家中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¹云览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即告失学。1926年得到陈三民的帮助免费到上海泉漳中学念书。不久，参加青年团，开始阅读“普罗文学”，钻研社会科学，也写些文艺短评投给《申报》，领些稿费接济家庭。²他的中学生涯只持续了一年，便因为父亲逝世而辍学。后来做过记者、国文教员等工作。1930年，以健尼为笔名出版中篇小说《前夜》（上海湖风书店出版），从此选择文学创作为终身事业，后来还由杨骚介绍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³那时张楚琨也在上海，由于同乡关系而与云览认识。不久张楚琨南渡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的编辑。⁴

1937年底，高云览离开上海到马来亚来。他先到麻坡中华中学任教务主任，由于张楚琨在《南洋商报》任编辑，于是经常写稿投寄《南洋商报》发表。后来云览南下新加坡，在南洋女子中学执教。⁹ 1940年3月6日，由新加坡搭丰庆轮，到缅甸仰光转中国重庆，慰劳代表有三十余人，高云览也参加在内。¹⁰ 1940年12月，陈嘉庚率团回抵新加坡，领导南侨总会，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并组织闽侨总会，展开反陈仪的运动。¹¹《南洋商报》在胡愈之主持下，全力支持各有关活动，高云览则在《南洋商报》上发表许多报导抗战的游记和杂文。¹²

“一年来目击敌军的衰退”可说是回国慰问后的一篇报告文学。他追述自己从中国大西南到大西北，跑了六个战区。他亲眼看到中国在炮火里成长壮大。他说：

整整一年，我跑过南北各战场，亲眼看见敌人在湖北的长沙崩溃，在桂南的昆仑关崩溃，在晋南的中条山崩溃，在绥西的五原崩溃，在豫东的郑州崩溃。我亲眼看见敌人在炮火中崩溃，正如我看见残烛在风中消溶着一样。我相信这无法挽救自己消溶的命运的残烛，总有一天要化泪成灰的。……¹³

他的文笔，说得上“清新俊逸，别具一格”。¹⁴ 他在该文详细地叙述日军的败退。他理直气壮地罗列了敌军的十个弱点，从前线到后方，从实力到心理，指出敌兵“厌战怀乡”，“恐华”不振，徒然以“烧杀奸淫”对待沦陷区，自取灭亡。临到文章的结束，他坚信时间必然使日本败北、中国局势好转。¹⁵

云览对抗战的前途十分乐观，但敌人也实在并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战局后来也仍是转得恶劣，而第二年（1942年）二月，新加坡就告沦陷，日军毕竟支撑到1945年才投降。在发表上述“一年来目击敌军的衰退”一文的同时，他还发表了另一篇短文：“希望是人人实践的一年”，呼吁人们“以血和汗去渲染伟大历史的一年”。后来，《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发起“反侵略文学”的讨论，高云览也写了“为你的父·子·孙”¹⁶支持。文章虽短（不过四百字左右），却高度抒情，以小见大。他用粗犷的感情，满膺的悲愤，大笔调地抒发他反对不义战争的热望。其实，早在1938年、

1939年，他就写了一系列以抗战救亡及反侵略为主题的散文，包括“致日本高桥夫人的信”、“人理昭昭”、“翻脸”、“汉奸往见上帝记”等等。”在“致日本高桥夫人的信”中，他具体地指出日本军阀不只在中国造成战争的惨祸，而且造成日本人民更多的失业、饥饿与死亡。最后，他有力地说：“我希望夫人回答我的，不只是话，而是行动。”显然，这封公开的长信不是仅仅写给那位可怜的日本少妇看的，它的读者对象是所有善良的日本女性，以至广大的被欺蒙的日本人民。对于马华大众，这也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¹⁴这与后来郁达夫写的“致新居格氏”（“敌我之间”，1940·6·3—4《星洲日报》“晨星”），可说前后辉映，意义都非常深刻。

此外，云览也写过剧本《夕影》（1939），¹⁵又写了不少文艺评论的文章，包括“生命里程碑”、“通俗与媚俗的另一个解释”、“做为桥梁的‘日出’底演出”、“救亡戏剧的‘演’‘观’谈”、“救亡戏剧以胡弦譬喻说——复高扬先生”等。他的评论文学往往巧取譬喻，单刀直入，立论精辟，发聋振聩。譬如1938年底业余话剧社演出曹禺的《日出》，当时有些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演出的意义不很了解，而致发生一场关于“社会剧”与“救亡剧”的争论。云览对这问题，即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他并不削足就履地强调《日出》为救亡剧，但觉得大家不能否认《日出》的演出意义，这一方面也纠正了耶鲁等过于强调《日出》演出的“救亡意义的偏差”。¹⁶云览说：

在我看来，强调“日出”的社会意义以为现阶段的救亡意义，即使是必要，也仅是徒劳。——这不是故意杀风景，也不是有意执偏；而是正视着事实，说老实话。

我们应得承认，艺术这武器，在抗战的现阶段，是有着它更积极的任务的。……………

在民族急激的变化中，它能针对着事实的正题，但不是副题，发挥其效能。

这样，我们又应得承认，“日出”这剧，拿到抗战的现阶段来评价，其可能达到的效能，只限于副题而不属于正题，更明白的说，只是消极而不是积极的，尽管“日出”的故事如何错综、如何迷人，无奈中国抗战这伟大的舞台上的“史传”，比任何紧张故事，更能够激起人的感奋呵！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责难剧作者（自然，为了环境的适应，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责难业余剧人）。因为曹禺先生写这剧本时，还是在芦沟桥事变未发生前的一九三六年。不过有一点我们对曹禺先生未能沉默者，就是“日出”里面那一些可怜的东西，剧作者并没有暗示出那迫害中国大众的魔掌——日本帝国主义。我先得插一个声明，我不是拿什么江湖十八诀的指导大纲去干涉一个剧作者的世界；不过，不管剧作者的世界如何，在“七七”以前，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没有一个逃得开魔掌直接或间接的迫害。自然，“日出”里面那可怜的一群也不能例外。

..... 17

他坦诚地指出“日出”演出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认为业余话剧社演出该剧，“直接给于马华剧运以新的刺激，间接给于救亡戏剧以重新整饬的机会”，因此，这是一道“桥梁”。他对《日出》的评价是：“要优越地给它以名誉座的位置”，他举出各种理由：

因为它是结束前期戏剧低落及开发后期戏剧繁荣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是加强马来亚观众对舞台剧拥护的一针强心剂；因为它是争取救亡剧演出的一座桥梁（引叶尼语）；因为它能够提高舞台剧在马来亚的艺术水准；因为它能够替今后的救亡剧号召更多的观众；最后，因为它不单在理论的实践中教育了观众，并且也教育了自己；就是说，他们卖干。..... 18

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高云览和他新婚的妻子白碧云，偕同胡愈之、郁达夫、张楚琨等坐了小电船逃离新加坡，流亡印尼。¹⁹在印尼、云览与杨骚等在一起，靠做肥皂和酒过生活。直到日本投降，才又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办《南侨日报》，胡愈之出任社长，李铁民任督印人，张楚琨任总经理；高云览则是大股东，他以钜元公司的总经理身份活动于商界。²⁰在逃亡期间，他曾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春秋劫》，这时就在檳城的《现代周刊》上面连载。²¹

1949年，英国当局根据紧急法令，把高云览逮捕，驱逐出境。回国后，

他迁居天津，致力文学创作，在完成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后，因患肠癌而与世长辞，死时46岁。²²

1939年为筹赈南来领导“新中国剧团”巡回义演，筹得十万。
即型舞各关心本地剧运

二、金山

金山是个出色的戏剧工作者，对救亡戏剧至为热心。他与赵丹等主持业余剧人协会（1935年成立），后来分出，与王莹、欧阳山等成立四十年代剧社。²³ 他的南来，既非逃难，也非过访，而是为了筹赈宣传。²⁴ 他受完大学教育后，抛弃一切优厚的待遇，侧身电影戏剧界苦干，导演过《最后一滴血》抗战电影，又创办过“东方剧院”，培育青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几天后，与洪琛一同率领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辗转南北战场20个月，历遍苏皖豫鄂湘粤桂七省，在前线、后方，从事救亡戏剧的宣传，演出七百四十余次。1939年出国宣传，来新加坡前，已在香港、越南举行多次大规模义演。²⁵

1939年9月底，金山南下新加坡，最初被拒绝入境，后来化名赵洵，才得入境。²⁶ 其他团员的抵星，也是费尽周章；有些躲在轮船的煤舱底，有些装成小店员，才陆续到达。²⁷ 可是，到新加坡后一筹莫展，因为剧团的成立与公演一直不获英政府通过。他们在窒闷中苦待了八个月，在各方侨领的奔走努力下，决定先“援英”，后“筹赈”；也只有这样，“新中国剧团”才得以组织起来，并开始义演的工作。援英义演是应马来亚援英会星华组的邀请，于1940年5月十七及十八两晚，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阳翰笙四幕名剧《塞上风光》。²⁸

1940年6月6日，“新中国剧团”正式在新加坡诞生，并且获得英政府批准两个多幕剧及七个独幕剧在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作巡回义演。²⁹ 总计在新加坡有四大次的义演。第一次是由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主办，在大世界太平洋戏院演出三天，筹得叻币二千余元。演出剧目如下：

6月15日：《贼》、《鬼夜哭》、《放下你的鞭子》。

6月16日：《人约黄昏》、《婴儿劫》、《大义灭亲》。

6月17日：《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

第二次是由新加坡闽侨各会馆联合演剧筹款购药委员会主办，在皇宫大戏院演出两晚，剧目是《塞上风光》，得叻币四万三千余元。第三次及第四次仍由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主办。³⁰第三次是别出心裁的“七七献金”筹赈，连入门票得叻币四万余元，这是七月七日至九日在快乐世界体育馆演出三幕剧《永定河畔》。³¹第四次是7月19至21日在新世界日光戏院重演第一次演过的六个独幕剧（《婴儿劫》除外），筹得叻币二千余元。估计四次义演得款叻币十万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币七十万。³²本来他们还打算演出金山的新作五幕剧《民族魂》，结果因为行期有限，取消了演出。³³

金山在“‘塞上风光’导演琐语”一文里，述说了一些演出的困难与希望。他说：

我们从祖国的战地来此，本可供献一些充满火药气味的戏剧给诸君欣赏并指教，可是事实不能如愿，因此我们临时排演了以塞外事物为背景的“塞上风光”和诸位见面。这剧中虽没黄色的军装，雪亮的大刀钢盔，以及沉重的机关枪大炮；但却有着英武不屈的力量，勇猛强悍的干劲，阴险刻毒的魔影。同时也述明了真理与邪恶的斗争，以及此斗争之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形势。它的结论是说：恶魔对于真理的摧残与破坏，无时无地均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应提高警觉性，以团结牺牲的精神，抵御此恶势力，来争取光明的实现！——这就是我们今天献演本剧的中心意义。³⁴

至于《永定河畔》，他在“‘永定河畔’导演感言”一文谈到他处理该剧的一些过程：

由于处理此剧手法之决定，我曾大胆而又谨慎地将原作加以删改和增添；但我敢发誓说，我曾尽全力保持了原作的精神和价值。在一个环形的四面都是观众的剧场中（全场可容乙万一千人），在某一端建立一座相当伟大的桥头（桥长六十尺，宽廿四尺，高十六尺，石级乙十四层——但祇是全桥的二十分之一），演员们就在桥上桥块表演。我将第一二两幕合并，删去剧中罗曼斯的成分（后二幕也是这样），加强群众兴奋和坚决的情绪。剧中新闻记者的出场，我标明了一位是国内名记者范

长江先生（请恕我未曾先得范先生同意），其他二位则是马来亚四大报纸的华侨记者，一位说福建话，一位说广东话，原因是想强调海外华侨关心祖国抗战的殷切……………。”³⁵

金山对改编《永定河畔》一剧是煞费心机的，结果演出得到预期的效果，他大胆设计，把舞台伸向观众中去，打破了演员与观众间的藩篱。这次演出，曾经使各界对于戏剧的观感焕然一新，同时也对当地的戏剧艺术，起了启发性的作用，从而提高当地戏剧水平。³⁶

1940年7月结束在新加坡的义演后，8月10日转道全马作巡回演出，全部行程由南侨总会编配，足迹踏遍马六甲、槟榔屿、森美兰、雪兰莪、彭亨、柔佛等各州。³⁷巡回演出后，又返新加坡，于1941年2月陆续离开新加坡，分批回国。计协助筹赈工作半年有余。³⁸

在新加坡期间，除了实际的戏剧工作，金山偶而也写戏剧评论，如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公演果戈里名剧《巡按》，他即写了“从‘巡按’说起”，阐述他对演出的看法。他佩服导演李佑辰先生的魄力，但又寄语李导演两件事，他说：

……第一，“巡按”是一个喜剧，希望李先生多多控制演员的活动，不使他们丝毫越规而将喜剧演成了闹剧。第二，希望这次演后，还能继续再演，一方面固可锻炼演员的技术；另一方面可在多次演出中获得更多人的帮助——尤其是经济的帮助——使这个演剧的集团能在多助条件之下茁长起来。因为李先生和参演诸君这次的演出，并非为“巡按”，而是为剧运而演剧的。³⁹

可见金山非常关心本地剧运。在新中国剧团组成而演出时，郁达夫也表示欣赏，他写了“看王女士等的演剧”（《星洲日报》“文艺”版，1940年3月10日）、“‘塞上风光’之演出”（《星洲日报》1940年5月18日）、“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40年6月14日）等评介文字。在新中国剧团临走时，王纪元也写了欢送的感言。⁴⁰总之，金山与其他南来的作家步伐是一致的，他们都为救亡尽了应尽的一份力量。

三、王纪元

王纪元是与胡愈之一起应《南洋商报》之聘，于1940年年底到新加坡的。当时《南洋商报》在新闻报导时称王纪元为“名记者”，说明新聘他为“编辑”。⁴¹王氏接编《南洋商报》的副刊“狮声”，为马华文艺的发展尽了历史性的任务，所以即使他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记者”身分，我们仍把他列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中国作家。

“狮声”是《南洋商报》副刊的正支，创刊于1933年，是出刊最久的文艺副刊之一，先后更换编辑多人，包括李铁民、李紫凤（李树梧）、李天游、戴英浪（田坚）、刘道南（流浪）、张楚琨、马康人等。王纪元接编“狮声”之前，“狮声”正处于低潮状态，是等待中兴的一个过渡时期。⁴²1940年12月5日，王纪元发表了“今后的‘狮声’”的主编的话，阐明了编辑该版的困难与方针。他认为接编“狮声”的一大困难是稿荒。他是一个初到南洋的“新客”，本地的朋友不多，对社会的情形更不熟悉，还没有建立读者、作者、编者之间的相互密切的关系，所以一时不容易解决缺稿的问题。他想写信到国内向文艺界的朋友讨救兵，但远水救不得近火，终究不是办法。他认为“一个文艺性的副刊，是应该与当地的文化界朋友打成一片的。”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当地读者的心理，适合当地的需要”，而且，“更能够反映现实，读起来倍觉亲切有味”。他诚恳地向当地文艺界朋友讨救兵，深信“全南洋的作者诸君”一定会给予不断的援助。他发现过去的“狮声”编得太严肃些，内容也太单调些，而且不够广泛，不够轻松，不够活泼；因此，他准备改革一下“狮声”的版面，使它“象一杯咖啡一般，喝了使人有点感到兴奋”。他的主张是：

这里不需要抗战八股的空论，亦不需要洋洋大文，我们所需要的是轻松、活泼，对于身心都有益处的文字。

今后的“狮声”是综合的，短小精悍的，每篇文字希望不要超过千字。三十六行，希望行行皆有，五花八门，希望门门皆备。是战斗的，亦趣味的，诙谐的，我想这并不算是冲突。

今后“狮声”的刊载日期，打算把它固定每星期三天。星期日我想辟一个“学生园地”，专门登载学生诸君的作品，如报导一些关于学校

和学生生活的珍闻。

亲爱的作家们、读者们，希望给予我们经常的指导和援助！⁴³

王纪元接编后的“狮声”，果然侧重刊登文艺小品，版面清朗，悦目，题材多变化，避免落入旧框框。当时篇幅恢复到四分之三版，至1941年下半年缩为半版。所发表的稿件，包括短篇、杂感、诗歌、批评、特写、报告、独幕剧、短篇小说、漫画、木刻，甚至包括长篇连载的“章回小说”，如陈如旧（即陈南）写的“民国志演义”。由于作者自称打算向国内作者拉稿（见上引“今后的狮声”），结果时不时也刊载国内作者的作品，如茅盾的“今后文艺界的两件事”（1941年1月31日“狮声”）、穆欣的“戏剧运动在西北—文艺通讯”（1941年3月22日“狮声”）、茅盾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41年2月14日“狮声”）、胡风的“新文艺传统的发展”（1941年8月1日“狮声”）、胡风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创作活动”（1941年8月22日“狮声”）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报导中国国内文艺的发展动向，对本地文运多少起了借镜与刺激的作用。就本地作者而言，写得较多的是：陈如旧（即陈南、子遗，又署东方丙丁）、黄觉、王蛮、抗生、修灿、漂青、上官豸、白萍、文之流、丁之屏、金丁、仲达、刘思、大白（一署袁之园）、野火、萧魂、芜青、艾蒙（另以林晨笔名发表漫画及木刻）、杨嘉、林秋（一署墨黑）、辜石如、普洛、董珂德、陈白浪、白荻、流电、王丹影、白鲁、静海、秦笛、王君实等。此外，从中国南来的胡愈之、杨骚、王任叔（巴人）等也有作品在“狮声”上发表。

除了发表一般的作品外，“狮声”先后辟了七八个专栏，包括“自由谈”、“章回小说”、“书报评述”、“思想漫步”、“创作观摩”、“生活讲话”等等，这使得该刊眉目清醒，而读者印象了然。“自由谈”是一个杂文园地，每天容纳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其余各栏每周一次或两次，轮流刊出，并特约瞿平、子遗、王任叔等分别撰写。此外，“狮声”又经常出版专号，如“自由谈检讨专号”、“诗歌专页”、“反侵略专号”、“五四纪念专号”、“青年文艺专号”等等，用以沟通读者、作者与编者的思想感情。在1941年3月1日出版的“诗歌专页”，王纪元写了“刊首的话”，语重心长，文笔雄健：

有些人说，马来亚的诗人最多。这句话里，也许含了刺？其实，却正说明了文学发展的道路。在祖国，初期的现象，何尝不是如此？

又有人说，马来亚的诗坛仍是荒芜。说这话的意思，是指马来亚的作品的品质还差。这自然也是实话。可是“天才并没有种子”，试想想罢，历史的客观条件是□□贫弱的，普希金和玛耶珂夫斯基，怎么能突的从土中□出来？要说马来亚的文化运动，还要坚实地踏上“启蒙运动”的道路，总不算怎么“妄自菲薄”的吧？

然而马来亚的诗坛，是有着它的辉煌的前途的，正因为整个的马来亚文化运动，是在逐渐地随着时代的步伐向前走的。同时，马来亚的诗坛，决不会因循着□□（五四前后）祖国诗坛的那种现象。这就是说，它没有旧诗词的影响的色彩。它一直是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姿态出现。这是因为马来亚的青年诗人，没曾感染过旧诗词的薰陶，受制□于旧诗词的束缚。打一个比方，他们象是一群“天足”的姑娘，用不着费尽许多“放足”的苦痛，他们可以跟着祖国今日的诗歌主流，迎头赶上前去！……………⁴⁴

王氏认为马华诗歌不必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束缚，可以发展得很好。他也认为马来亚的文化运动，还要坚实地踏上“启蒙运动”的道路。在该期的“诗歌专页”上，发表了九位新作者的作品，包括奇峰的“题未定草”、新灿的“梦底毁灭”、野火的“桥下的一群”、陈辅仁的“潮州大众歌”等。

1941年9月5日，“狮声”出版了“反侵略文学运动专号”，阐明“反侵略文学”口号的内容。讨论有关“反侵略文学”建设诸问题，之后一直到九月下旬，陆续发表有关反侵略的文章，参加执笔的作者有巴人、杨骚、景明、进之、老肃、东方丙、古屋、羊鸣等。作者们纷纷解释反侵略文学与抗战文学的不同性质，建议多多介绍英美苏及其他反侵略国家的文学作品，主张成立文艺工作者俱乐部以便更有效地展开反侵略的文学工作。⁴⁵

除了出版各种专号，“狮声”也连载了中国作家黄药眠的小说“光明与黑暗”，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刊载中国文艺通讯社座谈会的记录（如1941年9月30日登出的加因、文艺记“我写文章的经验”，有杨刚女士、茅盾、宋之的等的谈话）。偶而也登翻译作品，如“伊里基论文化”（M·兹

浮利夫作，1941年9月16日“狮声”）。有时在版头下，刊出法捷耶夫、巴尔扎克等的名言，显示“狮声”重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至于“文化报导”小栏，虽然是报导世界文化动态，重点却也放在报导中国的文化近况。

王纪元在编副刊之余，也发表了好多分析时局，研究战争动向的文章，写得精密深入，见解独到。这些政论性的单篇长文，包括：

- 1 “一年来的抗战形势及其展望”（1941年1月1日《南洋商报》新年特刊第27版“检讨及展望”）
- 2 “南太平洋战争与菲律宾”（1941年4月20日《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0版）
- 3 “南太平洋战争与澳洲”（1941年6月1日《南洋商报》星期刊）
- 4 “日荷经济谈判的现阶段”（1941年6月15日《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0版）
- 5 “近卫重组新阁与日寇政局动向”（1941年7月20日《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0版）
- 6 “‘九一八’十周年”（1941年9月18日《南洋商报》第12版）

这些文章大都侧重策略的检讨与战势的预测。比起胡愈之的政论，王氏的文章显得更为细入。当然，这是因为王氏主要抓住一点而详细发挥他的论见，比较注重事实数据。譬如，在“一年来的抗战形势及其展望”一文里，他郑重地分析战局的逆流，他感慨地说：

一九四〇年是过去了。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们展望时局，真不胜栗栗危惧。因为今日中国的抗战，不是军事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停滞”“麻痹”的政治问题。我们唯一可以自信的，只有坚强无比的民众力量，今天应该是我们“阿斗”起来督促的时候了。⁴⁶

与胡愈之一样，王纪元指出战争的危机，指出抗战的途径。

1941年2月，金山领导的新中国剧团行将归国，“狮声”特地出版“欢送新中国剧团归国专刊”。王纪元写了“把开天辟地的侨胞精神带给祖

“国——欢送新中国剧团诸君”，热情地赞扬金山等的工作成绩，表达了对抗战的信心与寄望。他写道：

别矣诸君！椰风蕉雨，不值得你们的留恋，我相信，你们是无意留恋这些的，你们所留恋的，一定是千千万万，艰苦备尝，具有开天辟地精神的亲爱的侨胞们吧。但，侨胞们所望于你们的，是要把侨胞们的坦白热诚，带给祖国，尤其是前线浴血奋斗的卫国壮士。同时，更希望你们本着一贯的精神，发扬光大。我相信，艰苦的环境，是会增加你们奋斗的勇气的。

别矣诸君！在灿烂的祖国的原野里再见！⁴⁷

对于抗战救国，王纪元不遗余力。从上引的欢送辞，可以看出他关心中国的前线将士，希望剧团把南洋侨胞的热诚传达到战地。他以诗一般的语言，说出了南洋侨胞的心声。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新加坡势如伏巢之卵，岌岌可危。从此，抗日救亡工作进入白热化阶段。王纪元也积极投入工作，代表新闻界出席有关会议。他虽然不象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担任重要职位，却也竭尽人事。到了新加坡宣告守不住，他才同郁达夫等一批人逃离新加坡，蛰居印尼。⁴⁸

四、杨骚

杨骚（1901——1956），原名杨维铨，福建龙溪人。他是女作家白薇的丈夫。早在1932年9月，他与穆木天、蒲风、任钧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出版刊物《新诗歌》。⁴⁹他们努力提倡“国防诗歌”和诗朗诵运动，成了新诗歌的前锋。⁵⁰他原籍福建，中日战争期间，移居重庆。当时他在《抗战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新诗。1939年，他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属下的“作家战地服务团”，到前线访问中国战士。⁵¹郁达夫在“诗人杨骚的南来”一文中就曾这么说：

诗人是曾经到过各战区去慰劳将士，视察过抗战的实况的，我们希

望他能于征尘暂洗后，将他的所见所闻，都写出来报告给我们。（1941年5月20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被收入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页95）。

1941年，他离开重庆，经香港而抵达新加坡。⁵²来新加坡后，与施香沱先生同住大坡翠南亭的龙溪会馆，甚少写诗，但从事编务及理论批评工作。⁵³当时陈嘉庚发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号召东南亚侨民响应中国的抗战，筹款救国。⁵⁴杨骚即为陈嘉庚主编《闽潮半月刊》。⁵⁵就当时文化界而言，《南洋商报》以主编胡愈之为中心的一批文化人，与《星洲日报》的国民党文化人是互相对垒的。杨骚并不曾在这两间大报馆担任编辑，但他与南来的文化人颇有来往。1940至1941年间，他经常投稿给《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与“狮声”相对的，正是《星洲日报》的“晨星”，当时已由郁达夫主编。郁氏在两大文化壁垒对阵下，有点孤寂，甚至受到所谓进步文化人的攻击，为的是国难当头，他却还有“闲情”去游山玩水，写些什么游记文章。杨骚对这类攻击不以为然，他仍与达夫维持高度的友情，而且鼓舞了达夫，使后来达夫在各方面都表现得积极起来。⁵⁶

杨骚在新加坡期间，一本过去关心抗战的精神，对抗战运动落力支持，因此在所发表的文章中往往提出与抗战有关的具体看法。象“天才没有种子”（1941·2·27“狮声”）、“加紧团结，反对分裂——为纪念七七四周年而作”（1941·7·6《南洋商报星期刊》）都是内容坚实的出色文章。他是“狮声”“反侵略文学运动专号”的执笔人之一，撰写“以纸弹配合子弹——对反侵略文学口号提出一点意见”，严正地阐明“反侵略文学”口号的内容，呼吁当地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用他们的纸弹，无情地毁灭敌人。他写道：

为防止人类陷入法西斯侵略的大集中营中，为防止世界变成戈壁大沙漠，世界爱好和平和爱好比和平更重要的民主和自由的绝大多数人类，已经拿起枪杆，结成一条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在前方用子弹射击敌人。在这个情形之下，文化人之一的文艺工作者，要配合目前的需要，拿起他们的笔杆，用他们的纸弹，在后方打击法西斯侵略的第五纵

队：一切敌人的间谍、走狗，及汪精卫汉奸，准汉奸的造谣和歪曲理论，也是当然的。……………⁵⁷

杨骚平日边幅不修，书看后往往乱丢。⁵⁸ 他为人幽默，出语不凡。在那个战机四伏的日子里，随时有轰轰的机声。当日机从柔佛新山飞过，新加坡警报响起，所有英国的水牛式飞机全都飞起；那并非抵抗，而是回避敌机。杨骚在躲进大水沟而向上望时，尖锐地讽吟：“卧看水牛满天飞！”⁵⁹ 寥寥数语，讽尽了英军的不敢抗敌与无能。

杨骚为人认真勤力，日文甚好，在新加坡期间，时常阅读日本出版的新杂志，了解局势的新发展。⁶⁰ 他在工作时，从不显露自己的锋芒，但对于应做的事，总是默默地不多说什么，而尽自己的力量做去，可见他是一个踏实笃行的人。⁶¹ 那时，他的经济并不宽裕，《闽潮》的编辑待遇只是一个月六七十元，但他每月必须寄五十元给一个曾经同他共同生活过的女友。⁶² 终于，迫于形势，凡是直接参与抗日活动的文化人都纷纷逃离新加坡。杨骚自不例外。1942年2月12日，即新加坡沦陷前三天，他与其他一批文化人逃抵印尼的苏门答腊。⁶³ 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重回新加坡。1949年又转返印尼，在耶加达居住。⁶⁴ 1946、47年间，杨骚曾经为《风下周刊》及《音乐戏剧诗歌》月刊（杨嘉主编）写过稿，发表在前者如“杨德乐的农妇”、“漫谈的漫谈”，发表在后者的如“狗又在吠”。

1941年未发表前已见报声的时约撰稿人：杨骚、胡师

五、王任叔（巴人）

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发表著名的《阿Q正传》，但真正经常以“巴人”为笔名而发表作品的是王任叔（1897——）。除了巴人，赵冷、屈轶、毁堂等也是他的笔名。⁶⁵ 他是浙江奉化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故乡当小学教员，并从事文学活动，与唐性天、谢传茂、冯三昧等组织过“雪花社”。⁶⁶ 五四运动初期，他已开始写作小说和新诗，最初发表作品的园地是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⁶⁷ 比起茅盾、郑振铎等，王任叔当时还是未为人晓的一个作家，适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展开革命文学论战，旗鼓相当，他由于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自然参加文学研

究会一边助阵。他写了很多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章，从此在文坛上渐露头角。后来他把发表过的有关论文辑成单行本，名为《革命文学论文集》。⁶⁸

除了参与文学论战，王任叔陆续投稿给《晨报》副刊（孙伏园主编），又先后主编若干刊物，包括《山雨》半月刊、《生路》、《大陆》、《译报》副刊及《申报》“自由谈”等，其中以《译报》的“大家谈”比较突出，专登杂文，在那个动荡的三十年代后期，很得读者传诵。⁶⁹当时王任叔留居上海，以屈轶为笔名在文汇报的文艺副刊“世纪风”（柯灵主编）上发表不少杂文。⁷⁰他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个成员。⁷¹《鲁迅全集》编辑出版时，他也费过很多精力。1939年，与郑振铎、孔另境主编了一辑“大时代文艺丛书”（世界书局发行），出版过十多部著作。⁷²

王任叔擅写小说、杂文，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⁷³上海局势转紧后，他被迫离开中国，先到香港，逗留一个短时期，于1941年7月抵达新加坡。⁷⁴在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华侨师范学校（简称“南侨师范”）。⁷⁵王任叔本就毕业于师范学校，任教师范，在他是驾轻就熟。任教之余，他仍勤于写作，大都投稿予《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间也为杨骚编的《闽潮》杂志写稿。他比郁达夫、胡愈之、王纪元、杨骚等都迟来新加坡。在他未来新加坡之前，他已经应《南洋商报》“狮声”编者（王纪元）的特约，撰写若干稿件。1941年5月中，“狮声”特辟一个“文艺讲话”专栏，刊载王任叔的“给文学青年”，断断续续地发表一封又一封的讨论文学问题的“信”，深入浅出，十分难得。在“给文学青年第一封信”的正文之前，王纪元特地为文介绍：

王任叔先生是国内有数的前进文艺批评家之一。他的作品包含方面很广，近年尤致力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的分析研究。抗战中，始终埋头在上海领导抗日的青年文化界，主持各种刊物的编辑及撰稿，对于最近思想倒退，政治逆流，作无情的暴露与攻击。虽然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没有一天停止执笔。现经本报与王先生特约，请为“狮声”撰写关于指导文学青年的文字，用书信体逐日连载。我们相信，这对于海外文艺界的帮助，一定不小吧。⁷⁶

上述的“介绍”里说“用书信体逐日连载”，其实登了第一封后，迟至5月

24日才登出第二封，以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封也相隔甚久。此后，直到任教南侨师范之前，他以“巴人”为笔名，在《南洋商报》上面发表文章，包括：

- 1 “侨居杂记”（“狮声”，1941·6·9及1941·6·10）
- 2 “关于高尔基一事”（“狮声”，1941·7·2）
- 3 “还需沉着——纪念七七四周年”（《南洋商报星期刊》，1941·7·6）
- 4 “四年来上海文艺”（“狮声”，1941·7·10及1941·7·11）

在“还需沉着——纪念七七四周年”一文里，对“皖南事件”给予中国抗战的影响作了一些分析，对抗战的艰苦长远的征途作了中肯的提示。他认为“战争是淘汰，抗战必然带来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样的判断是不错的，问题是怎么个淘汰法？他说：

……淘汰的作用在杂质较少的东西里发挥更快也更好，而对杂质较多的东西里，有时还起反作用。举例说吧，在十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民大众对于民族团结观念的削弱减低了；至少可以说，如大公报所说的，国家“中心”的观念是被削弱减低了。但抗战的烽火，却把它提高，这对于旧的情形来说，是一种好的淘汰，可是相反的，由于侵略者的凶暴，民族仇恨的增高，而忽略了国内压迫阶级（借用香港《国民日报》的话，就是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吧）的对自身的压迫，顽固派就利用它，把国家民族抽象为空洞形式，或者说是“法律秩序”的形式，喊出“至上”“至上”，转而为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了。这就是在淘汰过程中的反作用，所谓“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中国”，那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杂质的多。……………⁷⁷

巴人的说理是明白晓畅的。在这篇三千多字的论文里，巴人引了很多实例，还引了鲁迅的诗句“城头变幻大王旗”、“怒向刀丛觅小诗”，有鞭挞，有讽刺，也有海示，语调沉痛，寓意深刻。临到结束，他语气坚决地劝诫大家“还需沉着”。⁷⁸巴人任教南洋师范后，在教师节曾经写了“教师节感言”。⁷⁹这篇两千三百字左右的杂文，抒写了他对教师的待遇及面对的难题

的感触，既忧愤，又感慨。文章里流露出了现实的满目疮痍，控诉了教育界的腐败与黑暗，虽然大部份举中国国内的事例，却也反映了整个抗战局势下教育的悲哀。巴人在概论了教师的悲哀与遭遇后，颇为南洋的教师鸣不平。他分析华侨教育界，相信华侨教育界“还保持它相当的纯洁”。因为华侨社会对教师的待遇虽然不很高，但只要教师们加紧团结和努力，一定会取得社会人士的信仰，而尽培养优良人才之责。他特别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一般说来，华侨社会的帮派隔膜是存在的。但文化人和教师，正如文化一样，本质上是没有限制的，也没有宗法社会帮派的限制，文化力量（自然也包括教育）的伟大，也就在此。以提高国民文化为职责的教师，首先需要本身团结起来，然后能增强华侨社会的团结。

第二，学校是自由学习和研究的场所。它是教人追求真理，发挥正义为惟一职责的。无自由即无自发的力量。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不但是培养学生智力的惟一原则，而且也是增加教师对于教育事业的兴趣，发挥其创造性的。任何事业，富于创造性即有兴趣，有兴趣即能持久。陶行知和张宗麟，以生活教育和小先生制是很富创造性的，所以他们都愿以教育献其身。而这些教育主张，也不超越于民主主义的原则。

第三，谁都说党化教育□□化教育，是今天国内教育界最大的祸害（见大公报社论），但我们认为要澈底肃清或拒绝这种办法的实施是在于我们教师对于三民主义的研究的加强。这教育的原则也就是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我们确认了民权主义的重要，使我们的学生也理解民权主义的真理，那么，法西斯化的□□教育，也就不能以党化名义来出现了。⁸⁰

巴人再三强调“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也强调“三民主义”，在这一方面，与胡愈之的强调民主、团结是一气的。

1941年9月，《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发起“反侵略文学专号”。王任叔撰写了“关于反侵略文学”的短文响应，言简意赅，发人猛省：

什么是反侵略文学？

反侵略文学在“新世界”里就有。

在练习打枪的小屋子里，挂着画有希特拉像的纸片，有人对他瞄准发射。子弹到时，希特拉震了一震，纸片留下个窟窿。——这该是我们习见的生活样式。如其文学是生活样式的反映，那么，就里就有我们反侵略文学的样本了。

对法西斯的仇恨，已经弥漫到我们生活的娱乐部份，虽然不免漫画化了，但足资我们深思。

要紧的是，我们怎样扩大我们的仇恨，给法西斯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我们将不以射击纸画为满足！⁸¹

过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洋洋大观的长文：“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刊于1941年9月21日《南洋商报星期刊》第九版“新南洋”第25期），进一步具体阐述反侵略文学的概念。在文中，他引了胡愈之在“国际新形势与中国——一个提纲”（1941年9月14日《南洋商报星期刊》第九版“新南洋”第24期）里所说的话：“构成现世界的本质的各种对立体，依然存在着，并没有起根本的变化。就是：一方面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一方面存在着主张保持现状的富有的民主国，另一方面存在着要推翻现状的法西斯独裁国家；一方面存在着以征服奴役为目的的侵略国家，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征服奴役或受严重威胁的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可见他们这批南渡的中国作家，在思想上步伐颇为一致。王任权的结论是：“反法西斯运动也是中国文学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

与郁达夫一样，王任权对抗战文艺的发展格外关注。郁达夫写过“略谈抗战八股”，申述他对抗战文艺公式化的问题。⁸²王任权也写“略论抗战八股”，⁸³详细论述他对“抗战八股”的意见。针对疾呼抗战八股的舆论，王任权就事实驳斥该种疾呼，其实是历史逆流。他比较前两三年的“抗战八股”（郁达夫谈论的阶段），指出两者提倡的不同性质。他希望人们不要忘却活的现实，不要单讲教条。他慎重指出1938年底到1939年抗战八股的存在意义。那时郁达夫也赞成有抗战八股。因为当时刚好有另一种和平八股，是投降屈辱的主张，抗战八股形式上虽然不好，但目标还是正确的。至于1941年，已是继续抗战的时代，文学言论八股化根本就是退化，而不是进步。他

强调人们必须透澈地认识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必须了解“多样发展的统一”。⁸⁴

除了写作以抗战及反侵略为主题的议论散文，王任叔也写过一篇追念故友的抒情散文——“悼木斋”。⁸⁵木斋即周木斋，是著名的杂文家。王任叔南下，周木斋则留在上海，终于在1941年7月23日病逝。王任叔以沉痛的笔调，哀悼故友。他感到木斋的死，“写出了这沦陷的上海，那我曾经同过甘苦的战友们的悲凉的命运”。

日军逼近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不得不动员起来。王任叔与胡愈之、王纪元、郁达夫、沈兹九、杨骚等合集了有关人士，纷纷商议工作策划。当时成立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郁达夫任团长，王任叔任宣传部长。⁸⁶新加坡沦陷前，1942年2月4日，与郁达夫等一起离开新加坡，潜逃印尼。在印尼，仍暗中从事抗日活动。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王任叔留着一脸胡子返回新加坡，但只逗留了一个月左右，便又返回印尼苏门答腊。⁸⁷在印尼，他为《民主日报》社所主办的印尼文报撰写社论，并暗中指导该地区的政治组织与活动。1948年8月，他为荷军逮捕，一度入狱，后以“自由出境”名义被遣回香港。第二年回中国。回国后写了中篇小说《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记述他的逃难生活。⁸⁸战后王任叔大部份时间虽然在印尼，但所写文章仍有发表在胡愈之编的《风下周刊》。1946年初他写过一篇“无言抄”，很有代表性。文章大意是说英国人并不是马来亚的主人，日本人来，他们逃，日本投降后，他们反而回来，又再成为“主人”。巴人自己也可是同样的不是主人，不象那些抗战在前方的人，然而竟也做了马来亚的主人。至于真正抗战流血的人却没有做成功主人。对于这种情形，作者还有什么话说？因此，他“无言”。⁸⁹在《风下周刊》上的文章，据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所录，篇目有17篇，包括“略论华侨团结问题”、“邻人们”、“水客和工头”等。除了《风下》，巴人也偶而在《南侨日报》上发表文章（如“略论华侨民主运动”，发表于1948年1月12日），内容大致与华侨责任与团结问题有关。中共政权成立后，巴人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任中共驻印尼的第一任大使。⁹⁰五十年代末期，他以提倡人性论而遭整肃。⁹¹

六、沈兹九

沈兹九（1904——）是胡愈之的妻子，但他们是南渡后，1941年才在新加坡结为夫妇的。沈兹九比胡愈之稍迟来新加坡，大约在1941年8月间。她是在中国妇女界活动最力、个性最强的女作家，是名导演沈西苓的姊姊。⁹²在她抵新的当儿，报上曾有新闻报导：

国内妇女界先进沈兹九日前抵星，据称：“中国国内妇女在抗战中极有进步，敌后妇女参加游击保卫乡邦，感人尤深，惟因政治未臻民主化，妇运进展，殊欠顺利，深望占有入口半数以上之女界同胞，共同努力，肩起抗建艰巨”云，查沈氏早年留学东瀛，返国以后，历任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辑及《妇女周刊》主编，复创办《妇女生活半月刊》，蜚声出版界，抗战爆发，氏追随蒋夫人宋美龄，从事妇女运动，不遗余力，曾参加庐山全国妇女代表会议，担任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文化事业组主任，去年夏开始辞去该职，赴战地视察，嗣因身体不佳，承医生劝告，乃由港来星休养，并顺便访亲云。⁹³

原来，沈兹九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专门学校。⁹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任事时，便与徐庆誉结婚。⁹⁵徐庆誉是前南昌行营侍从室主任。曾被派到江浙等省视察新生活运动，威声运播。沈兹九似乎可以过神气的官太太生活。但徐庆誉与她结婚后，便在南京造洋房，预备把她藏起来。这一来，沈女士恼怒非常，认为这埋没了她的前途，死也不愿意。当时徐庆誉就提出两条路子请她走：第一条当然是要她安份守己地过家庭主妇生活；第二条则各走各路，解除婚约。沈兹九详细考虑后，决定选择第二条路走。临走时，她还对他说：“你且看看我的本领吧！”⁹⁶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走得对的。她原籍浙江杭州，在留学时期便开始文艺戏剧创作，寄回上海出版界的杂志发表。⁹⁷1933年，得李公朴夫人介绍，给《申报》的附刊编“妇女园地”。1935年，受聘于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主编《妇女生活》杂志，销数六千多份。自此以后，沈兹九在文坛崭露头角。她曾翻译日本方畑寒春著的《战争论》，由《申报》出版。⁹⁸这位妇女运动的积极活动家，来新加坡的原因竟是“养病”及“访亲”。

新加坡沦陷前夕，她与胡愈之等一起逃亡。战后同胡愈之返回新加坡，主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妇运工作。胡愈之办《风下》周刊及《南侨日报》，沈兹九也在上面发表文章。1946年3月8日，沈兹九创办另一份综合性刊物：《新妇女》。这是一份月刊，每月8日出版。出了28期。”后来，《风下》与《新妇女》合刊出版《联合刊》。沈兹九发表在《风下》及《新妇女》两份杂志上的文章，十有八九是有关妇女问题，如“马来亚妇运前瞻”（《风下》，第5期，1945·12·31）、“米南加保的母权社会”（《风下》第14期，1946·3·9）、“同姓结婚问题”（《风下》第98期，1947·10·25）、“妇女之路”（《新妇女》第1期至第7期，1946）、“三八节与南洋华侨妇女”（《新妇女》第25期，1948·3·8）等。她在《风下》连载的回忆文字“流亡在赤道线上”（第40期至第62期，1946·9·7至1947·2·15），是回忆逃难苏门答腊的生活，文笔清丽，描述细腻动人，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献。除了专题论文，沈兹九还在《风下》周刊上撰写“这一周”，在《新妇女》月刊上撰写“一月时事”，可见她对分析时局，评论时事也是很到家的。在《新妇女》第一期的“创刊的话”，她把办刊的宗旨和希望说得很豁朗：

一九四六年的马来亚，显出了不少英勇的聪明能干的年青新妇女，这小小的刊物将是这些新妇女的园地，因此也将它取名为“新妇女”。

马华妇女界，不少多才多艺的人才，可是缺少刊物，将他们的作品多多发表出来。《新妇女》既然是新妇女们的园地，它将来是一个提拔女性写作的场所。希望将来在《新妇女》的周围，大家自由组织写作研究会，有的写作投到《新妇女》来。

马来亚的妇女运动，是统一战线的。《新妇女》配合这要求，它不但要和前进姐妹们携手同行，同时也要走进还没有走上妇运的姐妹圈子里。因此它的出场姿态是相当多样的。当然它还是初出茅庐，心有余而力不足，还要爱护它的朋友多多帮忙。

《新妇女》限于人力物力，还只是一个月和姐妹见面一次，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每月和姐妹至少有两次见面。这是编者的希望，也是爱护它的姐妹的希望吧！我们大家来努力吧！

最后祝福它和马来亚的新妇女同样活泼，健康善斗，长命百岁。¹⁰⁰

发表在《新妇女》第25期的“三八节与南洋华侨妇女”一文，在1948年3月8日的《南侨日报》“专论”栏上（与《新妇女》第25期出版日期同）刊出，标题少了“南洋”二字。在这篇大约一千三百字的文章里，沈兹九先指出“三八节”是全世界妇女们纪念妇女运动及检讨妇女运动工作的日子。她觉得在南洋纪念这个日子，惭愧和忧愁多于欢愉，因为南洋姊妹们的处境还很不乐观。这主要是因为“重男轻女、多妻制度，三从四德，和殖民地政策，结成了束缚妇女同胞的一条长锁链”。针对改善妇女自身的命运，她提出五个治标的途径：

✓（一）希望当地政府和华侨社会，积极提倡妇女职业教育，各机关社团商店，尽量吸收妇女，一切职业应对妇女们开放。

✓（二）在大都市里，赶快建立较大规模的劳动妇女托儿所，以减轻劳动妇女的家庭重负，同时使许多有才能的妇女，不致因儿女的牵累，失去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三）当地政府应以法律禁止多妻制度，华侨领袖以身作则，废弃纳妾制，实行一夫一妻制。

✓（四）同工同酬，妇女工作的机会，应该和男子平等。

✓（五）发展妇女平民教育，以提高妇女文化水准。

许多国家的妇女，已经过着光明自由的生活，祖国姊妹，在天亮前也开始翻身了。在海外的姊妹们，不能再抱消极冷淡态度。大家从厨房里，从闺房里，走到大社会中来，为未来的新社会的建设，尽应尽的责任，这是今年三八节的一点希望了。¹⁰¹

沈兹九的文章与胡愈之的文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下笔滔滔，立论精辟；虽然没有胡氏的波澜壮阔，却也锋芒四射，搔着痒处，不愧是女中俊秀。

七、陈残云及其他

陈残云（1914——），生于广州近郊的农村。¹⁰² 大约在1941年下半

年南来新加坡，曾在报章副刊上发表若干诗歌，可惜因为1941年9月30日以后到新加坡沦陷为止的四个多月的旧报荡然无存，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及南洋大学图书馆所度藏的旧报刊，都没法找到有关的资料！¹⁰³他似乎也曾北上马来亚，在吉隆坡工作。¹⁰⁴陈残云的诗歌，在当时发表的数量恐怕不多，但质量还不错。¹⁰⁵

新马沦陷前，陈残云已经离开。战后他在香港，与司马文森合编《文艺生活》杂志。¹⁰⁶他转而从事小说创作及电影剧本的撰写。¹⁰⁷1945年底胡愈之在新加坡办《风下周刊》，陈残云也曾写作品到该刊发表。在《风下周刊》第4期（1945年12月24日出版）有一篇“怀念新加坡”，相信对新加坡的生活有所追忆，可惜该期风下遍寻不获，未能窥见其中内容！¹⁰⁸直到1948年5月22日，《风下周刊》登出他的另一篇文章“我们需要鼓舞和帮助”。在该文里面，陈残云指出战后“惨胜”，“文化斗士”受迫害出走。他说那一年半以来，从广州、昆明、汉口、上海及各个国民党统制区逃到香港的，源源不绝。他特别指出虽然有着“逃难”的意味，但仍需要鼓舞和帮助云云。¹⁰⁹陈残云也在香港出版一本中篇小说《南洋伯还乡》，可惜该书今已难于找到。¹¹⁰1949年，陈残云返广州，致力于小说影剧的工作。¹¹¹

除了陈残云，这里顺带提一下汪金丁。

汪金丁是河北人，1937年杪由上海南来。¹¹²当他还在北大读书时，和师陀办过一份文艺杂志《尖锐》，也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小说。他是三十年代“北平作家协会”的会员。¹¹³南来新加坡后，大部份时间在南洋女中执教，一方面也写小说及评论，对抗战文学也极力鼓吹。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的“狮声”、“南洋文艺”、“南洋周刊”，《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等。对发展南洋文化，金丁曾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目前南洋华侨文化运动的目标，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唤起侨胞坚决支持中国抗战，而南洋华侨文化运动的具体任务，也仍然不外文化的大众化，文化人之应当密切团结。”¹¹⁴他归纳出推动文化运动的具体办法：

（一）开展批评运动，揭发一切有碍民族利益的理论。

（二）开展自我批评，打破对自己朋友的言论的无条件的默认真确或保护现象。

（三）组织识字班、民众学校、演讲会、座谈会、家庭访问等等，施行经常教育。

（四）扩大话剧歌咏运动。¹¹⁵

他也发表长篇大论：“抗战文艺讲座”，刊于《南洋商报》的“狮声”。¹¹⁶他强调抗战文艺并不未为某一阶层，而是推广到一切阶层的拥护抗战的大众。在抗战文艺运动中，无论作者读者，务必加强“集体研究”与“自我教育”。1941年9月，王纪元在“狮声”发起反侵略文学专号，金丁也为文支持。他写的是“在反侵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¹¹⁷此外，他也写小说，如“旁观者”，写童话，如“谁说我们年纪小”，写文学理论与批评，如“文学的功用”、“论上官豸的非英雄史略和乳婴的弗琅工”等。新加坡告急时，金丁也曾代表教育界出席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筹备工作。¹¹⁸

1942年2月新加坡失守，金丁与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王纪元、高云览等一起撤退，避难苏门答腊。¹¹⁹和平后，他回来新加坡。紧急法令后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大陆。¹²⁰

金丁之外，值得一提的有两个女作家，一个是冯伊湄——《我的丈夫司徒乔》（回忆录）的作者，一个是金山的妻子王莹。冯伊湄（1908——1975）是广东惠州人，早年上海求学，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到法国留学，结识司徒乔。三十年代常在上海文艺杂志发表散文与新诗。¹²¹1938年，她随丈夫司徒乔（画家）逃难南洋。曾在槟城一家报馆编副刊，颇有成绩。1939年终，流浪到新加坡。¹²²在新加坡，似乎没有什么突出的文艺活动，至新加坡沦亡前夕，逃回中国重庆。¹²³

王莹（1910——），安徽人，在上海中国公学及暨南大学念书时，就从事戏剧电影工作，文艺修养很好，曾到日本留学。¹²⁴在南下新加坡与金山一起工作时，还兼任桂林《救亡日报》及《香港星岛日报》的特约撰稿。¹²⁵郁达夫早在国内结识王莹，所以王莹来新加坡，郁达夫特别为文介绍。¹²⁶王莹比金山早到新加坡，时间是1939年10月。¹²⁷

第七章

1945年至1948年南来的中国作家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自1942年至1945年新加坡光复的四年间，中国作家根本没有南渡。在第二章，我们已经分析中国作家南渡的特殊背景，发现他们大都是政治流亡性质。战后初期，由于中国内战再燃，中国作家处境动荡不安，于是再有南渡新马的现象。

这时期南渡的写作人数量可观，但属于本文研究对象的中国作家则为数有限。从印尼返回新加坡的有胡愈之、汪金丁，和平初期回来新加坡然后又回印尼的有巴人、杨骚。真正从北方南渡的是杜运燮、夏衍、岳野，他们都在1947年过来。至于马宁，1946年第二度南来。此外，有米军等地方性作家在新加坡逗留短时期。

以下，分述杜运燮、夏衍及岳野等在新加坡的生活与工作。

一、杜运燮 诗人 散文家 被送入教科书的作家

杜运燮（1920——），福建古田人。¹ 个子修长，南来前求学时喜欢穿旧的黑长衫。他本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² 大约1945年，英军在印度及缅甸作战，中国派远征军去，彼此同一战线，由于作战关系，必须有通译；杜运燮即是当时调去充任翻译的一个。就因此，杜运燮离开了中国。日本投降后，他从印缅南下新加坡。1947年在南洋女中教书，1948年在《星中日报》任翻译，1949年到华侨中学任教，直到1950年聘约解除，回返中国大陆。³

杜氏南来时十分年轻，著名的诗作《诗四十首》是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里的一种，初版于1946年10月。在四十年代是知名的诗人，近年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文艺史》也谈到他的作品。⁴ 南来新加坡后，执

教之余，也不断从事文艺创作，主要是散文，后来汇成一本集子，题为《热带风光》，笔名“吴进”。’这部散文集，题材偏重于马来民族与马来华侨的生活习俗，描绘马来亚的植物与民族艺术，更突出华侨开荒垦拓的劳苦功绩。他“好象一个画家用复杂的色彩来画一幅山光水色的风景画那样，用笔虽多而不凌乱，景物繁杂而觉得调和，使到读者爱不释手，一口气读下去”⁶。教人感到书中地方色彩浓烈，充满热带的风味。其中“热带三友”一篇，尤其脍炙人口，笔者中学时即在课文里读到，印象深刻，现在该文仍编入中学课本，传诵不绝。⁷据说“热带三友”是杜运燮在华侨中学宿舍“虎豹楼”里面写的，⁸文中景色，恐怕就是华侨中学的校园风光。杜氏观察入微，旁征博引，下笔如有神，流畅生动。一开头，他写道：

窗外有两片绿。左边，十几棵椰树，右边，三丛芭蕉。它们仿佛是我家墙上的一幅画。早上，是水彩；中午，是摄影；黄昏，是油画；月夜，是粉画。中午及有好月亮的夜里，椰影的整齐细线条，印在柏油马路上，有如图案画，蕉影饱满纵欲的笔致，则令人想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的特有作风。

油画，就使我联想起国画最普通的题材之一：“岁寒三友”。一方面想着岁寒三友的构图，一方面看着窗外强烈日光中的两堆浓绿，忽然竟把所想与所看的联结起来了。在许多方面，椰与松，蕉与竹不是很相似吗？我的脑中立刻浮起“热带三友”这四个字。但是热带的“梅”又在那里呢？⁹

作者的文字平易近人，但笔调凝练，刻划具体。他比喻窗外景色为“水彩”、“摄影”、“油画”、“粉画”，真是恰到好处，妙不可言！为了凑足“三友”，他于是注意自然界的變化，终于让他找到了：

不久，地上的影子忽都消失了，天暗下来，所有的椰树都开始摇动其满头散发，展露出一颗又圆又丰满的或绿或黄的椰实，所有的芭蕉也开始挥舞其破裂的绿旗，发出劈拍劈拍的响声。有力的凉风吹着我只穿有背心的上身，觉得好象刚冲完凉似的凉爽。天空深灰色，云层重沉沉的，而就在这样的背景前面，蓦然我发现了腊梅似的孤枝，大胆地从远

方椰林后面直插入天空。枝条是笔直的，上面只有寥寥几片小叶，没有花，但似有几颗黑色的果实。那是一株马来亚各地常见的木棉树，本地人称为“加布加布”(Kabu Kabu)。

我感到所谓“灵感”忽然来临时的快乐。问题解决了！我的“热带三友”来齐了！……¹⁰

“热带三友”的对象都在了，杜运燮就以诗一般的语言，个别地赞美椰、蕉、木棉这三种植物。他首先以椰比松，说出椰树作为热带的松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椰的外表与松一样，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高洁俊拔，潇洒不群。”他写道：

……它是高的，有时候且似乎高得失称，虽然满身疮疤，却总是不断地向上升，向上升，升到那样高，甚至令人为它耽心会很容易被大风连根拔起。但它不，不但在森林中升得那样高，连在多风的海滨，也是一样，给人一种高山仰止，不可企及的感觉。而且它又是瘦削的，不如其他热带植物，给人“浓得化不开”，脑满肠肥的印象。然而，它虽然瘦，虽然不断地在向上，它却非无用的空想家：它结有装满美汁的肥大果实。它的服饰简单而朴素，但却有极高洁的风度，脱尽俗尘，没带有丝毫火气和市侩气，这在赤道附近尤为难得。

松耐寒，无论霜雪朔风如何冷冽，它永远长青；椰则耐热，无论直晒的阳光如何残酷，它永远是那么悠闲，精神饱满，绿油油的，而且也长寿，能活到百年左右。……椰已成为热带的象征旗帜，坚苦卓绝而热情健美。风起处，松涛澎湃，山壑间奏起雄浑动人的交响乐曲，启示了人性最崇高的一方面；椰树遇着了大风的引发，不但也有“椰涛”，掀起一片绿色的海洋，而且它还有柔美的长发，并能载歌载舞，给人以大歌剧宏伟场面的崇高感觉。……¹¹

杜运燮以最好的语言写椰树的崇高品质。在高的形象、坚贞的性格这些方面，椰与松，真是各有千秋！杜运燮还引了古书上的记载（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说明椰树有着美丽的神话。接着，他写热带的第二友——蕉：

蕉与竹的在我心中会连在一起，主要的是其声音。“雨打芭蕉”固

已成为中国诗人向往的一种音乐，风吹“幽篁”时的音乐，我也是永远忘不掉的，而且中国人讲到音乐，离不开“丝竹”，久而久之，“竹”便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了。¹²

蕉与竹，在与音乐的关系上是这么令人神往，三友相换，毫不足奇。其实，芭蕉还有更多的特色。它象其他马来亚植物一样，叶面上“敷有厚厚的一重油，晚上月光一照，就发生一种眩目的闪光”，杜运燮认为这是“在别处从没有见过”的“强烈可爱的金光”。¹³他又把蕉叶比作一面面的“绿旗”，迎风招展，飘扬得骄傲有力。接着，他笔触一转，描述木棉的特色：

和椰、蕉比起来，木棉是比较少人注意的一种热带植物。……热带植物几全都有肥绿的叶子，看过去总是有“浓得化不开”的感觉，看久了常感到腻，仿佛是吃了太多的大肉大鱼。木棉的枝与干常成直角，这在植物中也是罕有的现象。叶本来就稀少，待实熟时，更是脱落殆尽，越显得只有几笔道劲有力的直线，在一大片浓绿的背景前面，常显得奇实而有些滑稽。……¹⁴

杜运燮在这里又一次用“浓得化不开”来形容热带植物的叶子，这之前，在写椰树时已经提到椰树不如其他热带植物的“浓得化不开”。这“浓得化不开”的形容是出自徐志摩的散文“浓得化不开”。¹⁵志摩用这话表达他对热带的印象。他的文章写于1928年1月，杜运燮一定是读过的。杜氏认为木棉的线条“简单而耿介”，在强烈的日光下，木棉“穿得那么少”、“有如中印苦力，又如印度的苦行僧，无视阳光的淫威”。

“热带三友”可说是杜运燮在这里写的散文的一篇代表作，很得读者喜爱。在《热带冷风》一书中，还有另外两篇作品“人种博览会”及“现代化马来亚的建造者”；一篇是谈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一篇是谈国家博物院前的华人铜像，表彰胼手胝足、拓荒垦地的华侨。他们都被改写选入华文课本，笔者从前也是读过的，对其中所述，还深烙脑海。此外，象“热带果园的皇族”，写的是榴梿，“纱笼·木屐”、“凉爽的亚答厝”、“‘醍醐灌顶’般的‘冲凉’”写的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及日常起居，“浪吟舞”、“马来人的诗歌”、“阿魔克”、“峇峇”、“娘惹”等都是写马来亚的民间艺

术及民生状况。至于“旧载籍中的中马关系”，则是考据味道甚浓但也有故事趣味的一篇文章。

杜运燮是写诗出身的。他个性略带羞涩，钻研过中国古典、西洋古典，所写的诗并不属于热烈狂放的风格，而是适合静读，越读越令人感到“深”（Deep）。¹⁶在抗战期间，他曾经写过史诗式的诗歌“滇缅公路”，虽然结构不甚严密，但充沛着爱国心，发抒了整个民族的期待，带着希望的牵引、爱的催促。¹⁷南来后的杜运燮，在热带生活的哺育下，以诗写文，仍保持了细腻舒缓的独特风格，尤其可贵的是加入了椰风蕉雨的热带气息。

二、夏衍及其他

夏衍（1900——），原名沈端先，著名的“国防戏剧”作家。杭州人。1947年初由香港来新加坡，为时甚暂，最多半年时间，即回香港。¹⁸直到1949年5月才回归中国大陆。¹⁹抗战初期，他在桂林主持《救亡日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²⁰1941年，为避风险，潜逃到香港。在香港，与戴望舒、叶浅予、张光宇等主编一份月刊《耕耘》。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占香港，夏衍即于1942年逃回桂林，然后到重庆，一直留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返抵上海，办《建国日报》，仅出十二期即被令停刊。1946年9月夏衍前往香港，并主持《华商报》。²¹

夏衍到新加坡，正值光复初期，百废待举，争取民主的浪潮也正在波动。在新加坡期间，曾协助胡愈之主持《南侨日报》的编务，也在胡愈之编的《风下周刊》上发表若干篇幅不长的杂论，如“立场与看法”（《风下》第68期）、“作剧的技术问题”（《风下》第69期）、“香港的民主事业”（《风下》第78期）等。回香港后曾把在新加坡写的少数文章及在香港写的一些文章合集为《劫余随笔》，可惜原书现在无法找到。

夏衍在新加坡期间，对于本地的文化艺术界并没有什么广泛性的接触，他似乎也不打算在新加坡作出什么事业。所发表的文章，与本地文艺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申述他对民主的看法，间接地谈战后民主政治的发展动向。倒是他回去后，1948年4月13日及14日连续两天《南侨日报》刊出他的一篇长文“‘马华文艺’试论”，比较受人注意。原来，1947年底发

生一场有关“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的大论争。胡愈之、汪金丁等都曾为文论驳，论争越闹越热。²² 香港《文艺生活》编者司马文森曾囑郭沫若及夏衍为文申述有关“马华化”的意见。1948年2月《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刊出郭沫若的“当前的文艺诸问题”，²³ 1948年3月16日《南侨日报》又刊出郭沫若的“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²⁴ 夏衍则在郭沫若文章发表后才写了这篇“马华文艺试论”。

夏衍在写该文时，曾经先看过有关论争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几篇重要文章。²⁵ 他所以迟迟没有动笔论述，主要认为“这问题最好是由当地的文艺工作者来研探解决”，而不必由他们“局外人”来做文章。²⁶ 夏衍觉得谈问题应该避开繁枝密叶而直入中心，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马来亚华人“对祖国的关系”与“对当地的关系”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上面。他说：

……我看了论及“马华文艺”的许多论文之后，觉得参加这一讨论的朋友们似乎都把这中心问题看得太机械，太偏于一面了。……马来亚今天还没有挣脱英国殖民地的地位，而在这块土地上的中马印三大民族，又各有其血族相关，心向往之的正在为着该民族的自由解放而苦斗中的“宗邦”……单就在马来亚的两百多万的中国人的立场和任务来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和愿不愿意“终老斯邦”，在今天的情形之下，单单为了他们自身在民族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利益，在他们肩上，都说负担起对中国以及马来亚的双重任务，而事实上也决不可能依据自发的或外在的主观要求，而完全摆脱一重任务于不顾的。……²⁷

夏衍是针对当时新马华人的处境而认为他们肩负“双重任务”。1947年《南侨日报》民意测验，发现华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当时华人仍是“侨”的身分。夏衍的看法是：

……说我只是一个暂时侨居的华侨而不管马来亚的事情，这是一个偏向，说我已经是在马来亚主人的一份子而不管中国的事情，也同样的是一种偏向。事实上，你主观的想要自己不管，或者要人家不管，也都是走不通，做不到的。²⁸

他把问题这么澄清，是要大家对问题有个“共同的认识”，讨论时才“比较容易得到结论”。接着他对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作了一番分析，他说：

……它的独特性是什么？据我们的理解，这应该就是指前面说到过的马来亚人民解放斗争这个错综复杂到史无前例的典型特征。……为了独特性，我们要从此时此地的马来亚人民生活特别是马来亚华人社会中去发现典型的生活特征，典型的人物性格……²⁹

在总结时，夏衍自谦“对于马来亚实际情形知道得不多”，但他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关切马华文艺壮健发展的朋友，提出有关意见的态度是“虔诚而带着热望的”。

夏衍之外，岳野的南来也是值得一提的。

岳野，来新加坡时大约三十多岁。³⁰他是1947年9月底随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南来新加坡。³¹他能演、能导、能写，与战前南来的金山似乎前后辉映，虽然成就不比金山，却也是为戏剧文学竭尽棉力的一个可敬的作家。他来新加坡后不久，为了演出的需要，动手写本地题材的风雨三部曲，可惜只完成两部，第三部并未写出。³²所写的两部剧作，一为《风雨牛车水》，一为《风雨三条石》。岳野似乎还计划写一部《椰林胶园是我家》，但不见面世。³³

《风雨牛车水》写新加坡牛车水居民的故事，《风雨三条石》写吉隆坡的半山芭，题材都很现实，都是反映贫民密的生活。由于为演出整天忙，没有太多时间接触侨胞，而且方言限制，接触面不广，岳野只好通过报纸，通过访问，通过调查、研究，一步步完成他的作品。他创作虽然匆忙，但态度却是认真的。³⁴在剧本里，岳野大胆地采用广东方言。事实上，岳野回中国后，也是活跃在广东一带的地方性作家。³⁵在《风雨牛车水》剧本的跋里，岳野流露出他对牛车水的思想感情，他说：“星加坡牛车水是粤籍侨胞的集居处，那里虽然贫苦、肮脏、拥挤，然而它是那么令人爱怜……”³⁶在《风雨三条石》的前言（他故称“遁词”）里，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需要”，论学问、技术都万分不足。他指出中国歌舞剧艺社是最典型的“自耕自食”的职业团体，解决剧本荒是最实际的问题。³⁷在当时，岳野实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由于透支精力，终于在演出时晕倒台上，第二次为不使观众失

望，他仍上台，结果又晕倒。³⁸ 他们的演出，场场满座。在快乐世界体育馆演出四场戏（10月9日至12日），观众就有三万人。可见反应的热烈！³⁹ 他们带来了崭新的话剧，对战后和平初期的马华文艺界，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当时中艺在新加坡演出后，就北上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其间曾遭一些谣言中伤，但他们表明“自由思想是我们的特点”，“中艺出国时，民盟正是国共谈判的中间人……”⁴⁰ 换言之，他们并不受政治力量的左右。

岳野与胡愈之在新加坡期间似乎是接近的，所以《南侨日报》替中艺宣传，胡愈之、高云览等为中艺特刊写文章。⁴¹ 此外，“音乐戏剧诗歌”月刊社又曾邀约文化界朋友，召开一次中艺演出的座谈会，出席者有林学大、王秋田、金丁、马宁等。⁴²

马宁战前一度南来，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已经谈到了。他是一个有多方面才华的作家，战后二度南来，时间大约是1946年。⁴³ 来后，在华侨中学任教。他时常参加文艺座谈会，又勤于写作。单篇的散文有“进化新论”（《新流》半月刊第2期，1946年9月）、“怎样写呢？”（《风下周刊》第60期，1947·2·1）、“从那里写起”（《读书生活》创刊号，1947年9月）、“我爱过宋千金”（1947·12·7）、“由辱骂和恐吓到黄泉”（《南侨日报》“文艺”副刊，1947·10·22）等。他又把创作的小说交香港出版，计有：《椰风蕉雨》（中篇小说1946）、《将军向后转》（长篇小说，1946）、《香岛烟云》（长篇小说）、《顽固份子》（长篇小说，1946）。⁴⁴ 这些小说，都出版于1946年，恐怕是他南来前的作品。马宁大约在1947年离开新加坡。⁴⁵

金丁在日本攻陷新加坡前与郁达夫等逃难印尼。战后回新加坡，到华侨中学教书，曾与马宁同事，比马宁迟回中国，大约是1949年头离开华侨中学，转去育英中学，然后离开新加坡。⁴⁶ 他常在胡愈之编的《风下周刊》发表文章，如“北望家乡”（《风下》第62期，1947·2·15）就是一篇难得的优美散文，充满感情。至于1946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三星旗下》，目前已不得见，相信也有独特的风格。⁴⁷ 他回中国后，专搞教育，并不以作家身份活跃于中国文坛。

战后南来的中国作家中，属于地方性作家而又比较著名的有米军。他原名林紫，原籍潮州。⁴⁸ 来后不止住在新加坡，而是到各地任教职。⁴⁹ 他积极

从事文艺创作，擅长写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发表于各报副刊。1947年11月，与丁家瑞、漠青等集体创作朗诵长诗“怒吼吧，新加坡！”，⁵⁰轰动一时。散文有“记芙蓉”（1947·2）⁵¹等。他在1949年离开新加坡。离开后，一本他的诗选《热带诗抄》才出版。⁵²选集内有“夜车”、“不叫‘多隆’”、“跳‘玲珑’”等富有地方色彩的诗作。米军回去中国后，似乎在潮剧发展方面颇有建树。



Brought along the literary thought and creative trends of literature of the 30s to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Malaya.
To establish a lit. centre in M & S.

第八章

中国作家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growth of Malaya.

经过前面七章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事实：中国作家在新加坡的生活是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也因此，他们对当地的文学艺术、社会思想各方面都产生广泛而有深度的影响。

这一章与最后一章，集中讨论中国作家留居新加坡所引发的影响，也是本论文的结论。本章就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分三节探讨，然后作一小结。

一、沟通中、新文艺鼓舞马华文坛

郁达夫、胡愈之等都是身体力行，重视文化事业的知识份子。他们认为华侨社会的知识水平及文学发展还不高，他们抱有启迪后学的精神任务。郁达夫南来之初，曾打算出版一份《文艺半月刊》，内容形式大抵希望模仿《创造周刊》，每期容纳两万字以上。‘不过后来似乎未见印行。郁达夫当时写信向在中国的柯灵索稿，请他从中国方面寄些稿件来南洋，大家携手合作。他说：

这半月刊的目的，完全如我在致戴平万君那一张短信上之所谈，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残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犯大厉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²

原来，郁达夫胸怀大志，准备在南洋“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他很明白地指出文化人的当前急务，他感到“在海外，在孤岛，以及在敌人的炮火所不及的地方逗留着的文化人，就应该趁环境的便利，来加强补足他们所想做而

未曾实现的种种工作”。他又发现“在海外的写作者，数目不多，而所写的内容，多少也有些差不多的倾向”。³为了“掉换读者的见闻和趣味”，他不得不向国内的朋友讨教兵。他写了很多信向国内各地征求稿件，包括过去政治部的同事、成仿吾、丁玲、茅盾、戴望舒、适夷、戴平万、柯灵等。⁴郁达夫进一步表示自己乐意交换中国与新马的文艺稿件，他告诉柯灵：

……我们以后，当紧紧地携起手来，来从事于海内外的文化沟通这一工作，以后我自己的稿子，当然不必说，若有可以推荐的南洋方面的稿子，自当按期地寄上。在上海方面，你信上所说的诸位先生外，也请你见到的时候，为我代达这一个意思。⁵

郁达夫就是这么热情洋溢，孜孜不息地推广文艺。他爱新马的青年，也因此，他毫不客气地谈他看稿的结果，他总结出南洋写作者的稿子“太呆板了一点”。他接编《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和《星槎日报》的“文艺周刊”，在两个月内看了大约一千篇长短大小的稿，发现最明显的倾向，就是篇篇“差不多”。⁶他有点失望。他认为同一题材应该从侧面反面去写，使它多样化。他觉得“这一种试验”，在国内虽然也不十分多，却“没有南洋那么的单调”，这当然由于“祖国的人才多，方面广，题材富”。⁷他鼓励南洋的青年从根本下手，下死功夫，全心全力地磨练、改进。

至于胡愈之，也曾谈到“华侨社会一般文化水准比较低落”。⁸他很希望南来的文化人负起启蒙辅导的责任。他也采取郁达夫的办法，向国内名作家索稿刊登，充实报纸内容。与胡愈之同时南来的王纪元，也很爱护南洋的文艺青年，也是时常在“狮声”副刊刊载中国名家的杰作。这些做法，所起的沟通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杨骚、王任叔、高云览、沈兹九等都是主张普罗文学的作家，他们带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艺”⁹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路向，刺激了新马的文坛。配合了抗战的形势，他们的文学观得以滋根发展。一直到战后，那种提倡新兴意识的积极精神还是继承下来。就有关的文学现象观察，当时中国作家们实在有意把新加坡辟为海外的一个文艺中心。这当然是指中文写作界，对于其他写作界，那又是另一种情况。

既然要把新马地区的文艺刺激发展起来，中国作家便象搭桥铺路的工程

师；他们的劳绩，是不可抹煞的！苗秀回忆说：

撇开作品不说，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跟“星期文艺”也曾相当鼓舞过那个时代的马华文艺青年的写作兴趣，对于马华文艺运动，不能说是毫无建树的。当时不少青年文艺工作者在“晨星”写稿，他们好些通过这种关系和郁达夫本人接触的，这里头有铁抗，王君实，倩子等人。其间铁抗接近达夫比较多……………¹⁰

其实，苗秀也是受郁达夫鼓励及提拔的。温梓川也指出“郁达夫对于马华文坛，起过相当大的鼓舞作用，较之以前南来主持吉隆坡《益群报》笔政的中国作家许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¹¹

Evidence 郁达夫死后，追忆他、纪念他的文章纷至沓来，一直到今天，仍不时有写作者研究他的晚年，悼念他对新马文学的贡献，方修先生等悉心编汇他在新马留下的作品，把他写入马华新文学史，能象他这样的中国作家，屈指也难数了。如果郁达夫对新马文学艺术不曾作出贡献，人们又怎么会去蒐集他的资料，加以研究？郁达夫这一批中国作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他们如飞鸿踏雪泥，在泥上留下斑斑的爪迹。他们也许生当乱世，但正因乱世，才使他们的影响不同凡响，而余波荡漾！这也就是邵约瑟 J. T. Shaw 所说：

一个国家的文学要兴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传统要激烈改变方向时，文学影响是最常发生，而且往往最有效果。此外，文学影响经常和社会或政治运动，尤其是与大动乱一起产生，或紧跟在它的后面。因此，象所有的文学现象，影响与某种社会情况，特别是极端的政治条件有关系；当然文学本身的因素也同样重要……………¹²

二、几场论争

中国作家在来新加坡之前，已经有他们独特的生活观念、思想理论与文字风格。来新加坡后，他们不可避免地也由作品体现他们的生活观念、思想理论与文字风格。他们是作家，写作是本行，他们于是继续写作，刊行作品。

在作品的流布过程中，出现论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作家被“接受”的程度问题。比较文学家邵约瑟 J. T. Shaw 在《文学影响与比较文学研究》一文里说：

文学与文学间直接的相互关系在这情形下产生：一个国家的作家在另一个国家被接受，而且很流行。外国作家在某个国家和某段时间内被接受，会直接影响文风，因此为本国作家培养了读者，也抚育了本国作家艺术和批评的意识感。……………¹³

中国作家，对新加坡而言，可称为“外国作家”。以“外来”的情形而言，他们在这里的期间，究竟被“接受”的程度怎样？“流行”的程度怎样？为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有关的几场论争：

1 · 郁达夫“几个问题”的论争 *The basic issues of the growth &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

郁达夫是风靡一时的名作家，海外读者对他心向往之的。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声望，不亚于茅盾、郑振铎。¹⁴ 尽管如此，他到新加坡不及一个月，在1939年1月21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发表一篇文艺论文“几个问题”后，马上遭到反击，惹来一场笔墨之战。

所谓“几个问题”，其实是郁达夫在檳城时温梓川向他提出的。¹⁵ 这几个问题包括：

- (1) 南洋的文艺界，当提出问题时，大抵都是把国内的问题全盘搬过来，这现象不知如何？
- (2) 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
- (3) 在南洋做启蒙运动的问题。
- (4) 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

上述几个问题，不外是发展文艺、讨论文艺的基本问题。郁达夫认为这些问题都很有“地方性”。对于第一个问题，他的答复是中国与南洋的文艺界都以中国文字为媒介，只要论战的题目值得讨论，而且讨论的态度真率，则“把国内的问题”搬过来讨论未尝不可，但情形如果相反，则没有益处。他特别

举出当时上海提出鲁迅风的杂文体的问题，他觉得很没有意思，因为那是“舍己耘人”的态度。对于第二个问题，郁达夫坦然表示是一个很重要而亦极普通的问题。他主张文艺作品“应该有极强烈的地方色彩，有很明显的社会投影”。他认为问题在于“这色彩的浓厚不浓厚，与配合点染得适当不适当”。关于第三个问题，他不但赞成，而且也认为是必要的，因为那是“无时代不新，无时代不可以有的问题”。他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启那几种蒙，启到怎样的程度”和“实际的做法”。郁达夫就文艺问题提出一些办法，如开一个书目给青年，办小型图书馆、创设函授学校、发行讲义录等。至于第四个问题，他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原则。他强调：“讨论的时代之后，现在似乎已进入了实际创作的阶段。我想在南洋，不久之后，也一定会和我国的洪流接上，使文艺不至于象过去一样，仅仅是几个人或少数阶级的娱乐品、装饰品”。

郁达夫论里夹议，略为评及一些“植党营私”、“破坏统一”的态度，结果导致一部份敏感的写作者的不满，认为有关问题是有意针对他们而提的。1月24日，《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刊出黄耶鲁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读了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对郁达夫四个问题的论点，逐一指摘，措辞尖厉。耶鲁所论，否定郁达夫的意见。在耶鲁长文发表的同时，“狮声”编者张楚琨还写了“‘读了郁达夫的几个问题’附言”，支持耶鲁，进一步驳斥郁达夫的脱离抗战形势，无视青年的希望，振振有词。为了纠正视听，郁达夫第二天就在《星洲日报》“晨星”发表简短的答辩（千字左右）：“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在文中，郁达夫就耶鲁文章的口气，反问耶鲁等是不是不准文化工作者南来，又提及他与鲁迅相交二十年，绝无轻视鲁迅的人格与精神（因为耶鲁文章曾提出鲁迅）。郁达夫追述从前与鲁迅一道在上海时，曾对史特莱女士说过“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这“是作家，非斗士”的立场，清楚地说明郁达夫了解自己的态度持平，绝不摇旗呐喊，自命激进。不料这一答辩，反而扩大问题的论战性。隔天（26日），《南洋商报》“狮声”刊出“我们的通讯”，由齐兰、李苹联名写给“狮声”编者张楚琨，标题“关于郁达夫先生”，对达夫揶揄一番。张楚琨的“编者答书”同时发表，表面上是答复齐兰、李苹的信，骨子里是批评郁达夫。郁达夫不甘示弱，第二天（27日）

又在“晨星”发表“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

这场论战一发不能收拾，双方观点越辩越远，形成“狮声”与“晨星”两个副刊的笔战。发表于“狮声”的其他文章，包括张楚琨的“传声筒——答郁达夫先生”（1939·1·28）及“传声筒”（1939·2·8）另外发表于“晨星”的外稿，有：

辜采繁的“也算是‘狮声’的一个读者”（1939·2·7）

复戈的“批评与漫骂”（同上）

乖崖的“家庭对话”（同上）

云鹏的“捣旦”（同上）

李词侗的“闭门读书”（同上）

圆的“偶然随笔”（同上）

“南洋周刊”及《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文学”副刊中，也有三两篇文章大力支持“狮声”，其中以高扬的“我们对你却仍觉失望”，较受瞩目。高扬在文章中说：

……以一位中国的名作家（文艺作家）来编文艺副刊，在南洋不但
是创举，而且我们深信他一定能够给“南洋青年”以多多的指导，对“南
洋文艺”前途有莫大的指示。……我们对于郁达夫先生是爱护的、敬重
的，对于郁达夫先生的南来，我们也是十二分欢迎的。南洋航路并不是
拒绝祖国文化人上岸，过去就曾来过不少名流学者……因为我们对郁达
夫先生还怀着莫大的期望，所以才不避“破坏统一”的大罪名，提出来
就教于郁达夫先生。¹⁶

高扬的意见，大体上代表当地青年一代写作者的心声，论说也比较客观。不过，整个论争并不就此销弥。一直到1939年2月28日“晨星”版上发表另一个中国作家楼适夷（1900——1966）寄自香港的一篇“遥寄星洲”，亟力呼吁双方息争，这才勉强结束论争。总讨论争前后一共持续了一个多月。适夷在文章内平心静气地分析郁达夫与南洋文化工作者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大家不应该对一位初来者提出过苛的要求或特意攻击责难。他认为达夫与鲁迅、茅盾是不同型类的；达夫的纯真性格与强烈正义感都是可敬的优点。¹⁷

达夫一片提倡文艺的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如果没有深入研究，人们必然会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郁达夫不过是消极反抗的知识份子，跟不上那个抗战的时代的步伐。事实上，郁达夫在接手副刊的编务时，已经明确表示他以国家大业为大前提，他全心全意培植写作人才，他认为“冬天若至，春天自然不远。‘晨星’这一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¹⁸他也了解自己因为有了“固定的社会评判”（大约是指被认为是大作家），所以一举手，一投足，都引人“猜测”。¹⁹但这场论争，并不降低他在文艺界的地位，他仍是可敬的前辈作家，到日军南进时，他便跃居文化界救亡工作的领导地位了。

2·关于“新剧”的论争

1931年，马宁（以静倩为笔名）等人以檳城的《光华日报》“戏剧”副刊为堡垒，发动“南洋新兴戏剧运动”。²⁰那时新兴文学运动在马华文学界已经开始消沉，较理想的剧本创作十分需要。²¹马宁于是在该年七八月间于《光华日报》“戏剧”版接连刊出三个独幕剧——“夫归”、“凄凄惨惨”及“女招待的悲哀”，轰动一时。²²

这三个名篇，其实篇幅甚短，题材都是反映不景气中的马来亚人民生活。

剧本发表后，并没有机会上演。直到1933年1月初旬，新加坡青年励志社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本地创作，这三个独幕剧才易名上场——“夫归”易名“芳娘”，“凄凄惨惨”易名“绿林中”，“女招待的悲哀”易名“一侍女”（又名“咖啡女之死”）。当时除了演出这三个独幕剧外，还加演另一部创作“兄妹之爱”。²³

这次演出，不但受到新加坡观众的欢迎，连北马各地的文艺界也都表示高度关注。²⁴演出后，引起一场剧烈的论争。论争是由当时一位略有名气的马华作者郑文通²⁵的批评文章引起的。郑文通的批评文章是“评青年励志社公演的‘芳娘’‘绿林中’‘一侍女’”，发表于1933年1月29日《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郑氏批评的语气并不诚恳，对新兴戏剧的提倡者颇有微词，他认为三个剧本剧情矛盾横生，笑话百出，演技不佳，对编剧者更

挖苦讽刺。由于郑氏漠视文坛的不景气，批评有欠客观，结果招致青年励志社戏剧编导人王信（其实即马宁）²⁶的反批评。马宁于1933年2月5日在《星洲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答郑文通评青年励志社公演的‘芳娘’‘绿林中’‘一侍女’”。马宁指出郑文通对戏剧认识太过浅薄，所引理论也嫌陈旧了些。他又不厌其烦地分析三个独幕剧的写作技巧。不过，郑文通并不罢休，一周后又在“文艺周刊”发表“态度总检讨及其他”。该文长篇大论，但主观强烈，并不接受马宁的意见。马宁为了澄清问题，一周后也发表另一篇论战文章：“答郑文通的‘态度总检讨及其他’”。另一位励志社成员石流，也在《民国日报》的副刊写了“关于评青年励志社公演的芳娘、绿林中、一侍女的商榷”，对郑文通侧击。此外，以第三者立场参与笔战的有雪兰莪的孙流冰和檳城《光华日报》“奥托”副刊的作者方英等。前者写了“第三者的话”（刊于《星洲日报》“文艺周刊”，1933·3·19），后者写了“谈最近星洲的戏剧论战”（1933·2·20）。²⁷大体上，郑文通的思想是被批评为落后的，尽管“新剧”有技术上的缺点，但在文艺低潮的当儿，仍是值得提倡与演出的。

这场戏剧论争，影响广泛。在当时，对戏剧艺术的推动，起了刺激作用。这是发生在文艺低潮的时期，意义特别重大。马宁所主张的“新兴戏剧”在论争过后，被马华戏剧工作者进一步推动、发展。

3·有关“南洋地方性剧本”的论争

吴天（叶尼）创作的独幕救亡剧“伤兵医院”，1937年12月由业余话剧社演出，当时是参加筹赈活动而推出的。同时义演的有爱同校友会戏剧组集体创作的“怒涛”等。演出后，引出一场有关“南洋地方性剧本”的论争。²⁸

1937年12月11日《星洲日报》“晨星”版刊出文翔的戏剧评论：“从‘怒涛’的演出谈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作者大力颂赞“怒涛”的成功，然后提出“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问题，于是指出有许多人喜欢描写上海抗战及伤兵等等剧本，但由于作者对题材理解不够，缺乏生活经验，弄得描写对象往往不能真实，一方面又因为导演及演员缺乏有关的生活经验，演出效果便成问题。他举出“伤兵医院”为例，语带嘲讽。²⁹本来，

文翔不是特别批评“伤兵医院”，只是用批评“伤兵医院”来强调“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重要。但结果，业余话剧社方面不甘示弱，导演黄觉以“田”为笔名写了：“为建立救亡戏剧运动商榷于文翔先生”（《星洲日报》“晨星”，1937·12·12）。

田的文章认为文翔尽可批评“伤兵医院”，但不该否定那题材。他也承认剧本存在很多缺点，但他从救亡观点出发，觉得“南洋话剧正在抬头的時候”，文翔认为上海抗战及伤兵等等剧本不必要的问题是有欠客观的。³⁰双方坚持不下，也有别的作者加入，前后发表了五篇文章。³¹

综合文翔的论点，差不多是1927年以后出现的所谓“南洋色彩文艺”论的翻版。其实就题材而言，“伤兵医院”也不见得没有地方色彩，它反映的正是华侨捐款救亡的热潮，根本是切合时宜的。这次论争的收获，是使剧作者在创作剧本时更考虑本地的现实需要。这场论争，刺激了一般剧作者多写一些反映当地救亡动态的剧本。吴天本身在“伤兵医院”之后创作的一系列剧本，就着重当地的救亡题材，这可说是论争带来的好效果。

4·关于“侨民文艺”的论争

就马华文艺发展的过程考察，在战前的阶段，它是作为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而受中国文艺的直接影响；没有中国文艺的哺育与栽培，则马华文艺不能生长壮大。战后，随着客观形势的急转，华人有必要在当地争取合法权利与扎根生活，于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问题应运而生。换言之，当地作者希望对与马华文艺有本质不同的“侨民文艺”加以新的评估，同时使马华文艺更健全地成长。³²就这样，一场论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卷入论争的中国作家有胡愈之（沙平）、金丁等。论争本非针对个人，而是泛谈，但由于出发点歧异，导致论争激烈化。论争的起端在“马华文艺独特性”这一创作口号的提出。³³最初（1947年）由于一些非公开的文化团体及写作人座谈会曾提及“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个别文章如秋枫的“艺术创造的社会基础”、漂青的“关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凌佑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就在报章上发表。³⁴这些讨论，逐渐引起反响。1947年11月下旬，星华文艺协会举行第一次“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出席者有秋枫、杨嘉、马宁、杜边、左丁（凌佑）、刘思等，由普洛纪录，

秋枫整理；事后发表在星华文艺协会会刊“文艺”（附《南侨日报》）第四十七及四十八期上。”这次座谈会，肯定马华文艺有独特性，但未深一层讨论具体内涵。1948年，吉隆坡《战友报》新年刊发表周容的“谈马华文艺”与马华的“马来亚华侨与政制斗争”。文章中对“手执报纸而眼望天外”的侨民作家严加责难，甚至指出“身处马来亚而等待中国人民大翻身，那就连侨民作家都够不上，只好做‘逃难作家’了。”³⁶不久，周容又发表第二篇文章：“也论侨民文学”，号召大家清算侨民作家。”由于词锋所向，颇有非难侨居的中国作家的意味，于是论战发生了。

胡愈之在自己的刊物《风下周刊》第108期（1948·1·10）上刊出一篇“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³⁸特别分析历史的相关性，他着眼于华侨在马来亚的现实处境，认为孤立地谈文艺的独特性是超现实的。他指出马华文艺独特性一词，就字面上讲，只能是马来亚其他民族的文艺如马来文艺之类的对称，不能针对中国文艺或侨民文艺而提出。因为，当地华人的文艺，祇有和中国国内的作品相同，才能显出它在马来亚的独特。举例说，马来亚的华人，用筷子吃饭才算独特，用手吃饭反而不见得独特。后来，胡愈之又进一步把抽象的思维画成图解，写了“牛角尖图解”，发表在《风下周刊》第112期（1948·2·7）上。”大致上，胡愈之颇不满马华派的过份强调“独特性”，以独特性来打击所谓的侨民作家或逃难作家。基本上，他认为华侨参加当地争取独立民主的运动与关心祖国，反映祖国问题并不冲突，而且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总之，他根本没有感觉出马华文艺有可能与中国文艺截然分开。当时为胡愈之助战的作者颇多，包括李玄、洪丝丝、汪金丁、杨嘉、丁家瑞、邵宗汉等。⁴⁰

在胡愈之发表“牛角尖图解”之前，郭沫若在香港写了一篇“当前的文艺诸问题”，第一节即述及“马华化”的问题，刊于司马文森与陈残云编的文艺生活第37期（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出版）上。郭沫若的文章并未针对任何人而发，但他指出司马文森告诉他“马华化”是马来亚的华侨文艺问题。郭沫若赞成马华化，赞成马来亚华侨青年创造“土生文艺”。他说：“马华化是绝对正确的路线，这样倒并不是和中国文艺绝缘，而是使中国文艺更加丰富了。”⁴¹事实上，文艺马华化的问题早在战前已经断断续续有人提出讨论，铁亢（郑卓群）即是这方面的卓著作者。⁴²这次争论马华文

艺的独特性，条件当然比铁亢当年成熟，要寻求一个合理的结论也比较容易。不过，由于从中国南来的作家情况相当复杂，有些固然是过境或避难性质，不想长期落籍，有些却是有心在新马地区作较长久居留打算的（至于以后因为某些原因而又回归中国则是另一回事）。⁴³ 在中间当然有矛盾存在，胡愈之所持的理论，固然有历史与现实的根据，但周容等的立场，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相反的，那是针对实际情况而发，所以支持者不乏其人。支持周容并发挥马华独特性理论的，有吉隆坡《民声报》的作者，新加坡《星洲日报》的作者等。作者包括西樵（即赵戎）、闻人俊（即苗秀）等。⁴⁴ 至于铁戈写的“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发表于《民声报》“新风”，1948·2·18），⁴⁵ 立论比较客观、中肯、对双方提出息争的希望，认为不该跑向枝节，而应该接近真理才对。论争临近尾声，星华文艺协会召开另一次座谈会，由秋枫报告及整理，作出结论，刊于《南侨日报》。⁴⁶ 报告澄清了独特性、侨民文艺等概念，主张站稳马华大众利益的立场，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

1948年3月25日出版的《文艺生活》海外版第2期，一起刊出郭沫若的“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及夏衍的“‘马华文艺’试论”。这两篇总结性的文章，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问题作了相当透澈的分析。郭沫若在文章中特别修正他前一篇文章“当前的文艺诸问题”中对马华化问题的看法。因为夏衍转告他一个事实：“去夏《南侨日报》民意测验，华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愿放弃中国国籍”，这使他对文艺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不过，他本人还是赞成马华化的，因为马华文艺绝不能脱离“此时此地的现实”。至于夏衍的文章，分析较详，很能针对笔战的焦点。他认为“为马来亚”与“为中国”这双重任务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有轻重之分，但不能根据主观的愿望而有所偏废，他也指出独特性的问题并不能单从形式或作家的身份去衡量。郭沫若与夏衍的文章，后来先后在《南侨日报》转载。⁴⁷

一场纠缠三个月左右的笔战，至此告一段落。从这场笔战，反映出战后胡愈之的立场并不完全被当地一部份作者接受，在写作界也遭了波折。不过，他有倾向性的文艺见解，还是影响了当时及往后的一批写作者。随着胡愈之等一批中国作家的离开，侨民文艺的写作告一段落；渐渐地，马华文艺确立它的独特性，发展成脱胎于中国文艺而又有自己生命的一种文学模式。

综合以上几场主要的文学论争，我们发现中国作家在新加坡，曾面对一些文学思想的冲突问题。象郁达夫，被认为不够“斗士”（fighter）；象胡愈之，被认为是“逃难作家”；象吴天，被认为虚构题材，不够地方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不为当地读者“接受”呢？其实不然。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文学先进观点，还是流行一时的。报章副刊及社论的受欢迎，就是明显的事实。发生论争是由于一些误解所导致，或者，由于文学思想出发点的偏差所导致。譬如，胡愈之当年在新加坡，绝不会想到永居于此，何况他知道不久中国就会改变局面，他会重回祖国的怀抱，自然不可能在新马地区落地生根，不料这却是他被指为“侨民作家”的根由。相反的，一批由中国南来，或本地土生的写作人，立意争取“公民”地位，自然以排除“侨民”思想为依归。事实上，1927——1948年是个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尤其和平初期，客观形势出现急速转变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中国作家们在新加坡，是不是有尽到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站在怎样的利益前提下写作与生活？

如果中国作家象其他流亡的逃难民众一样，只是偏安一角，噤若寒蝉，则他们的存在新加坡，是没有什么历史意义可言的。若无历史意义，则文学影响全然谈不上。就我们考察，他们决不如此。他们自成一群，不仅关怀中国的抗战与内战，也关怀当地的民生。他们的作品，内容正是围绕着这样的主题。单看太平洋战争后新加坡沦陷前的短短两个月，他们落力工作，不辞劳苦，这点精神，岂不证明他们不忘自己的历史任务？也因此，他们的文学活动，文学思想，也“流行”了起来，发生催化作用。

三、偏重社会性的文学观

战前十几年间，整个马华文运，完全由一般副刊在推动；少数的杂志与戏剧团体，仅仅尽一点辅助的作用而已。⁴⁸副刊对文学的影响实在不言而喻。郁达夫、胡愈之与王纪元等分别在《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担任编辑，对于抗战文学，不遗余力地在副刊及其他版位加以刊登，普遍宣扬。除了这几位主编，其他中国作家如巴人、杨骚、金丁、高云览等更勤力执笔，实际地以作品呼告读者，号召行动。抗战文学，是一种结合时代，强调社会

性的文学。他们力倡抗战文学的结果，播下了写实的、感时忧国的文学种子。

在当时，抗战是唯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有效途径。抗战文学是为抗战而服务的。在消极方面，抗战文学可以暴露敌人侵略的残暴，揭发敌人侵略的野心；在积极方面，抗战文学是以巩固国人与侨胞的信念，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坚决奋斗。因此，抗战文学是重要的，是振奋人心的利器。随着局势的紧缩与战火的蔓延，抗战文学的主题也时有更变，以配合需要。在新加坡流亡的中国作家，看准南洋侨胞援助中国抗战、冀求抗战胜利、重新建国这一心理状态，下笔为文，总是晓以大义，申述唇亡齿寒的道理，务使侨胞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准备为抗战而牺牲一切。当然，这些抗战的言论，都是为反击那些主张投降妥协的附逆论调而发的。

郁达夫已经如鲁迅说的“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⁴⁹他身受目睹战祸，领悟抗战的真理。从他在新加坡留下的一批珍贵的政论，看出他对时局认识的全面与立论的坚实。他发表在报上的一篇篇的抗战论文，都是掷地有声、言之有物、一语道破、针针见血的。在当时的舆论界，郁达夫可说是先声夺人了！他十分注意敌军的动向，提醒侨胞侵略者的野心勃勃。在“九一记者节”一文里，郁达夫说：

当中国抗战正转入第三年的这紧急关头，我们为中国的新闻记者的，自然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先要谋解放我们的民族，抢救我们的祖国。内则鼓励民众，尽出力出钱之责，巩固团结，肃清败类，决意抗战到底，自不必说；外则对善邻修好，尊重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国民，努力于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与国际文化的促进，也是目下急切的任务。

东亚既已战云笼罩了大地，西欧又似乎在山雨欲来的前夕，在此危机一发的瞬间，我们所须要的定心丸，还是以最沉静的理智，来死守住我们的岗位。⁵⁰

此外，在“估敌”、“纪念九一八”、“敌人的文化侵略”、“勿骄勿馁的精神”、“敌军阀的诤言真象”、“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意大利参战与敌国”、“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等文章里，郁达夫都不放松对敌人残暴的黠武行为加以揭露与谴责。⁵¹另一方面，郁达夫热情地颂赞抵抗侵略的

英勇行为，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当然，郁达夫对胜利的预测也未免太乐观了些，他常说胜利就在该年，事实证明抗战并不是三两下子说结束就结束，而是一年拖一年，形成持久拉锯的血战、苦战。

胡愈之比郁达夫迟来新加坡，但来后在舆论界的地位比郁达夫更高。郁达夫所写文章，仍多文艺气息，胡愈之则政论意味更为浓烈。胡氏所写政论散文，每篇都印满时代的烙印，今天读来，依旧铿然有声！第一篇长文“南洋的新时代”固然别出心裁，其他如“马来亚怎样帮助日本作战”（1941·2·6）、“中马关系的新纪元”（1941·5·16）、“论海外宣传”（1941·5·22）、“我们应当做什么？”（1941·6·13）、“保卫民主反对侵略”（1941·9·2）等都是波澜壮阔、正义滔滔的抗战论文。他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下笔为文，无不理直气壮、咄咄逼人；象“战争与妇女”一文得出结论：

妇女界要求自身解放，必先求民族解放，所以目前当然是“抗战第一”。但是在抗战中妇女界也应当注意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使妇女成一个自由民族中的自由成员。过去的事实教训我们，侵略战争是从侵害国内人民自由权利开始的，而妇女权利与独裁制度决不能相容。……只有三万万女同胞得到平等自由的时候，我中华民族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由。”²²

巴人的抗战文学也是引人注目的。他在报上发表的“还需沉着——纪念七七四周年”（1941·7·6）、“略论‘抗战八股’”（1941·8·16）、“关于反侵略文学”（1941·9·5）、“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1941·9·21）等，都是动人心魄的大块文章，论述精细绵密，逻辑性极强。至于高云览、杨骚、汪金丁等，也都以激越的语调，积极提倡反侵略文学。1941年9月，王纪元在《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发动的“反侵略文学专号”，更是抗战文学的一个高潮。”²³

凡在1937年中国抗战发生后到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南渡的中国作家，无不是抗战文学的主倡者。他们在海外负起艰巨的宣传抗战的任务，颇有“书生报国”的豪情壮志。他们并不因为逃难而恋栈个人利益，更没有因为暂离烽烟的故土而诚惶诚恐，消极颓丧。相反的，他们是更清醒、更理智、

更果敢地直面现实，更发挥“感时忧国”的优秀传统。由于对政治现状的高度失望与烦闷，促使他们走向愤激之路，这是必然的共同趋向。”他们力倡抗战文学，使抗战的信念既深且广地传入人心。这是这批中国作家南来后，在文学方面所起的显著影响！他们的许多论述，以文学水平与内容深度而言，都不是本地作者所能写出的。以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理论，他们的预见，也都不是本地年青作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在论说的方式上，他们也有独特的一套。因此，在直接表示对抗战拥护与支援这一焦点上，中国作家是起了带头作用。在这段期间，他们自己很少机会从事纯文艺的创作（郁达夫在新加坡时就不曾写过什么小说），但他们却把文学与时代、社会结合起来，大量地写充满反战意义、追求和平、民主的作品。

抗战文学，是抗战思想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或战或降是民族存亡的最根本矛盾。中国作家选择的是前者；他们虽然蛰处南洋，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所望的，是“中国不会亡”，所期待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新生，摆脱外侮与凌乱，他们是有共同目标的文化群体。这个文化群体，可说是当时海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集团。”他们并不象其他华人集团，着眼于目前，或者比较关心社区、家庭与个人；相反的，他们着眼于大局、放眼于将来。他们在理论上认识至深，在实际行动上也以身作则、树立榜范。抗战文学的力倡，把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顶峰。这一来，一种偏重社会性的文学观一直成为新马华文文学创作的“传统”；战后的反黄运动等等，基本上还是三十年代初期到新马沦陷前的主要创作倾向的延续。

四、结论

我上面虽然用文学史上几件事情来说明中国作家在新加坡的影响，其实他们的影响是长久的，绝不限于他们在新马时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看见或感到其影响。以下几点，是最有文学意义的：

- 1 沟通中、新文学，使它们发生交流作用，让前者刺激、影响及帮助培养新加坡华文文学。
- 2 中国作家以其社会地位及文坛影响力，协助建立了马华文学应具有其独特性的创作观念。胡愈之、汪金丁虽然被目为“逃难”的“侨民作

家”，但夏衍、郭沫若等的真知灼见，却奠定了马华文学独特性的文学观念。

- 3 南来的中国作家把五四文学的传统精神植根于马华文学之中，尤其普罗写实文学。一直到今日，新马华文文学才开始逐渐摆脱这种全面性的影响。这主要由于社会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传播结果。
- 4 由文学家先来，导致艺术家如画家、戏剧表演者都前来南洋。当年徐悲鸿、刘海粟等大画家南来，武汉合唱团及昆明文协分会漫画展览团南来，郁达夫都大力支持，广为宣传。戏剧方面，金山、王莹的新中国剧团与岳野的中国歌舞剧艺社都是因为中国作家的调度与宣传，才得以在新马巡回演出。这些艺术活动的推广，深巨地影响了新马地区的艺术价值观。

第九章

中国作家对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

除了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中国作家也对社会思想及文化方面产生影响。正如邵约瑟 J. T. Shaw 说的：

某些作家或甚至文学运动会对整个或大部份社会产生一种文学以外的影响。譬如伏尔泰，拜伦，或托尔斯泰式的思想，行动，或甚至穿著，都会对他们或后来的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有广大的影响。这种社会行动会帮忙塑造一个作家的社会意识，而他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不管他的作品和外国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关系，这种现象经常产生。¹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也曾产生这方面的“文学以外”的影响。这方面的影响，比起文学方面的影响，恐怕更广更深。虽然不至于象伏尔泰式、拜伦式、托尔斯泰式思想一样产生典型的郁达夫式思想、胡愈之式思想，但有关的影响还是令人关注的。

一、筹赈救亡，一呼百应

中国作家南来后，对于新加坡社会及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是鼓起筹赈救亡的热潮。倘若把这批中国作家抽取出去，那时的文化界显然缺少一股强有力的中坚力量，许多救亡的工作，势必遭受顿挫而无法顺利进行。

在当时，象郁达夫、胡愈之，都是名望大，在文化界占要席的顶尖人物。他们有一种无形的凝聚知识份子与团结文教界的力量。他们思想先进，文章质量高，所以最能动员民众。筹赈救亡工作是庞大的组织工作，没有各

✓ 阶层的通力合作，万难成功。在新加坡沦陷前，郁达夫与胡愈之等负起的任务，就是以舆论带动筹赈与救亡，实际地确保筹赈活动收效。他们本身，决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但他们都有极强烈的爱国心，极真诚的救国愿望。他们并不曾直接参予当地的左翼政治势力，他们更没有主宰当地政治发展的野心，他们甚至与当地左翼政治势力（如1930年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有政见上的距离，但他们仍不失为促使筹赈工作成功的策动者。因为他们是知识份子，又在海外，为了申述“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抗战救亡之道，他们必须摆脱国共的党见，换为在侨言侨，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尤其1940年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以蒋介石委员长为最高的国家号召，这之后，《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言论，更时时出现“蒋委员长”的字眼。即连王任叔（巴人），在当时也在文章里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

✓ 在那种强寇压境，国脉飘飘的境况下，敌忾之心，人皆有之。中国战事的发展，总被新马报章排在头条新闻，一种揣测日本侵略者南进的心理在华侨之间普遍滋蔓。王任叔认为“抗战烽火把民族团结，国家中心观念提高”；² 胡愈之把华侨比喻为“海外的中国长城”，³ 他认为只有中国抗战到底，且节节胜利，才能阻止日本南进，否则，幻想日本因为在中国打仗而不敢挥军南下是不实际的。⁴ 郁达夫也反复说明洗雪国耻的重要，认为出钱出力必须做到“饱点”，精诚团结，绝不动摇抗战到底的信念。⁵ 总的一句话，是要具体表现拥护抗战，切实地慷慨输将，尽大后方支援前线的重任。不论精神或物质，都需要总动员。

自七七事变以还，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努力下，南洋各地已经联合组成“南侨总会”，在报上不断发表有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的宣言、办法及筹赈成绩，声势澎湃。⁶ 《南洋商报》本是陈嘉庚创办的，这时虽然不是由他主持，却也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协助南侨总会展开筹赈救亡工作。胡愈之的宣传手法与写作能力颇为陈嘉庚赞赏，曾担任“星华筹赈会”及“南侨筹赈总会”的宣传工作。⁷ 若无胡愈之，许多呼吁筹赈文章将大为减色。1941年6月16日，《南洋商报》开始展开“马来亚侨胞七七签名运动”，胡愈之即连续写了好几篇呼吁行动的政论，如“为七七签名运动敬告马来亚侨胞”（1941·6·16）、“为七七签名运动再告侨胞”（1941·6·24），这可说是一次重大的精神动员！在签名运动的第二周的第一天，签名人数已

经达到二万八千零六十五人，此外由各地侨团及商店工厂代收而送到报馆的还不在此数。⁹这次签名运动，是为了纪念抗战四周年，同时也为了激发侨胞的爱国情绪，扩大筹赈献金。⁹

南洋华侨对中国的支援，有不平凡的历史传统。1911年辛亥革命，各地华侨汇助军饷竟达数百万元。¹⁰在七七抗战开始的最初三年中，海外华侨捐献给祖国的抗战经费，占全部实际抗战经费的四分之一，即全年抗战经费支出国币八十万万元中，华侨的捐输金达国币二十万万元。¹¹中国战时财政的支出，依赖于华侨的，实在非常浩大。筹赈工作既然这么重要，中国作家的倚马千言，就更不可或缺了！

当然，宣传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相反的，宣传工作时有波折，时有舆论的反击。胡愈之在社论里，就曾具体指出：

……从前，华侨只知道为国家为民族，而绝无党派之争，现在却有一些集团，不从事抗日工作，却专事摩擦与扩大国共之争，这又如何才能使敌奸不乘机以破坏我内部团结？有些人口口声声要拥护政府，要加强统一，而对公忠体国的华侨领袖，不恤加以诬蔑中伤，对于南侨的统一筹赈机关，又不恤加以暗中破坏，这又怎能怪一般侨众对筹赈工作冷淡；而至赌风盛行？……………¹²

抗日团体之间，自相摩擦，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常现象。当时除南侨总会外，“民族先锋队”（张楚琨等一系）及“抗敌后援会”（马共系）也是两大抗日组织，从事抵制日货及锄奸工作。锄奸手段最厉害的是割耳朵。由于强调派别的分歧，使得同一目标的抗日团体，自相反目，甚至向对方工作人员施予与对付汉奸同样的割耳朵手段。¹³从中国南来的剧作者杜边据说也曾遭此厄运。¹⁴可见抗日工作的艰难重重。

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新马告急，日军登陆吉兰丹的哥踏峇汝，新加坡文化界一致认为时局已经紧缩，刻不容缓，务必动员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召开多次会议后，宣布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由郁达夫任正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王任权任宣传部长，王纪元、汪金丁、杨骚、沈兹九等也参予工作。¹⁵1942年一月上旬，文工团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在南侨师范学校上课，不料战局迅转，趋于严重，学校当局便

把学员百余人分作四个战时工作中队，分驻在后港、梧槽大伯公及爱同学校几个地方，郁达夫与胡愈之都兼任大队长。¹⁶ 中国作家这时已经实际行动起来，而且崛起于抗战工作领导的地位。可惜英军失策，不久日军大举南进，由陆路下侵，防不胜防，弹丸小岛的加冷坡无险可守，沦陷在即。中国作家无计可施，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惟有潜逃离境，避居荒僻的印尼群岛。

他们为筹赈救亡创下的劳绩，前无古人。当然，他们的工作范围是文化圈，但他们在言论上的宣传，实际深入各阶层。他们宣传的主题，集中在救国与反侵略，这是符合一般民众的愿望的。也因此，他们的宣传，一呼百应，势如山倒。这种影响，绝非偶然，而是耐人寻味的。

二、传扬新思想、铜丸走板

提格亨在《比较文学论》里说：“有许多作家用了他们所放送的思想对于一些外国作家们发生影响。这一类的影响是和其他的影响十分殊异而且十分重要的。”¹⁷ 他又说：“有一些大作家，虽则在外国并不起一种断然的影响，却由于他们的思想或他们的艺术，侵入了某一些国家的思想或艺术底某一些范围，而在那里起一种绝对的，但却有限制的作用”。¹⁸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也放送他们的思想，对当地产生思想上的影响。

早期南来的若干作家如老舍、洪灵菲、艾芜等，本身有他们的新思想，但由于他们逗留时间的短暂，结果并未在思想上给本地什么影响。较后南来的作家如吴天、高云览，就都有新思想带来新加坡。至于太平洋战争前南来的中国作家如郁达夫、胡愈之、王纪元、金山、杨骚、王任叔、沈兹九等，根本就是新思想的积极放送者。此外如马宁及战后的夏衍、杜运燮等，也在思想的传播上，尽了一些责任。

战前，华侨社会还是落后的。鲁迅在书简里就曾微微提到三十年代星洲言论亦然，慨然于不见得怎么好……¹⁹ 鲁迅不曾南渡，就当时情势而言，他也不可能南渡。那些能够南渡的作家，在思想背景上似乎不及鲁迅澈底，象胡愈之、王任叔、郁达夫南来时思想的层次都与鲁迅有些距离。当时殖民地统治者对“文化人”是敏感的，王任叔甚至必须费了一番周章才得以南渡。²⁰

尽管他们在思想上比较中和，站在比较属于国共势力范围外的知识份子的立场，但并不表示他们漠视抗战，忽略海外宣传的重要性。相反的，他们所耿耿于怀的，正是“海外宣传”与“抗战救国”。他们所扮演的，几乎是“海外传教士”的角色！

他们在传扬抗战理论与救国纲领时，颇有“统战”的意味。²¹ 他们强调华侨团结，把华侨比作“抗日长城”。²² 他们以无党派的中立立场，在新闻界发挥“为民喉舌”的影响。王任叔把中国社会比喻为青果，他认为青果所以两头小中间大（意指顽固的不多，进步的也不多，而中间层却很多），作祟的是核心，核心除掉，青果就会变样。这核心就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性。²³ 他相信“战争是一种淘汰”，²⁴ 他呼吁各党各派合作，以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²⁵ 胡愈之认为“我们不再缺少军火，我们只缺少爱国心。我们不再缺少友邦的援助，我们只缺少我们自己的爱国行动。”²⁶ 他大谈华侨团结问题，呼吁群起保卫民主、反对侵略。他说：

……侨胞同属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现在正是同生共死的时候。尽管我们中间，有党派之分，有思想之别，有地位之殊，有帮派之见，但在外人看来，千万余华侨，只是一个人，这一个人是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假如想到诬蔑毁谤别人，等于诬蔑毁灭自己，假如想到敌人来时，不论什么党，什么派，什么帮，大家同归于尽，这样，华侨团结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²⁷

这些乐观而积极的思想，在唤醒侨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可说说中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也说中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性。只要有爱国观念的，总会明白什么是应该遵循的正道。就这样，他们所传扬的思想，如骏马之下坡，如铜丸之走板，扩散得极快。

战后，新马光复，人民重见天日，群情振奋，旧报刊纷纷复刊，新的报章也风起云涌地相继问世。一时之间，新闻事业蓬勃异常，但素质也良莠不齐，有专为国民党宣传的，也有灰色、黄色小报。²⁸ 由于战争的刺激作用，战后初期，反对殖民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一时高涨。²⁹ 胡愈之协助陈嘉庚办《南侨日报》，担任总编辑。陈嘉庚自1940年考察中国后，对国共两党的观感颇有改变。战后他仍力主国共合作。³⁰ 他办的《南侨日报》，以

无党派为立场，强调“团结、爱国与民主”。³¹胡愈之在战前把南侨比作抗日长城，如今把南侨比作“和平先驱”、“民主堡垒”。³²他主张“斗争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他认为“国父主张和平奋斗救中国”就是他们办报的态度。³³胡氏是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办事处的主席团的一个成员（李铁民也是办事处主席）。³⁴他一方面重视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关心中国政局的演变，另一方面注意马来亚政运的动向，华侨的出路，在舆论方面带动华侨从事民主宪制的运动。象“当地政制与华侨”（1946·12·3）、“马来亚往何处去？”（1947·1·16）、“华侨唯有自救”（1947·1·20）、“工潮与当局的责任”（1947·2·1）等《南侨日报》的社论，都是这类舆论的代表作。巴人也在《风下周刊》及《南侨日报》发表不少有关华侨民主运动的文章。在“略论华侨民主运动”一文里，巴人认为战后两年来华侨民主运动不断地展开着、推进而日趋高潮。他认为为了加强华侨今后的民主运动，“一种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经纬中国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的华侨新文化运动是必然掀起来了”。³⁵换言之，华侨民主运动是配合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而进行着的。巴人之外，杨骚时在印尼，也曾写稿在《风下周刊》发表，提出他对华侨问题的看法，如“正是代表华侨的呼声”（《风下》第43期，1946·9·28）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许由于时局变化的节奏过于急速，内战的热化，报上不断报捷，渐有结束之机，而英国殖民统治者对于新马政治的哲学又与中国作家们所笃信的、所阐述的、所希冀的有所冲突，中国作家渐渐不容于当局。其实，海外华侨社会的意见本来也十分分歧，大体上，他们商业的头脑多于政治的头脑，当然，爱护祖国的热情还是十分深切的。³⁶因此，胡愈之、沈兹九、巴人、杨骚、汪金丁等倡导民主运动，传播新思想，仍能够收取一定的效果。当时《南侨日报》很得读者拥护，销路很好，许多山芭农民，甚至省下咖啡钱来买《南侨日报》。³⁷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三、是作家，也是社会运动家

在第一章，我曾指出：中国作家到新加坡来，仿佛是结群而来或相继来后联成一气，有共通的工作范围与作风，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前一年最为明

显。”³⁸他们在新加坡，努力于文化事业，综观起来，确是有群体观念的。他们受过五四的洗礼，都是笃信民主与科学。他们本身是有成就的文学家，但文学之外，他们更是思想家与社会工作者。在战前与战后初期的廿几年间，中国作家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起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作家异于欧美作家，他们本身固然大半留学欧美日本等地（胡愈之留学法国，郁达夫、杨骚、沈兹九、夏衍、王任叔、吴天等留学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绝不是盲目地移植西方的哲学放到东方，他们还是了然于历史的传统与变革的途径。在当时，南洋，是一个地理名词，在政治上受英、法、荷等殖民势力的统辖。居住在这地区的华人效忠的对象是“祖国”（即中国），南洋只可说是“第二故乡”。他们的身份是“侨”，而不是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早在孙中山（1866——1925）的时代，华侨已经扮演了重要的革命角色，所谓“华侨是革命之母”。孙中山亡命南洋，尤其在新加坡的活动，为历史留下不平凡的纪录，于今人们记忆犹新。至于二十年代早期，著名作家苏曼殊（1884——1918）三下南洋，流落印尼，也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这些历史的先例，间接地说明中国作家向南洋流浪、逃亡或蛰居，都是出于环境的驱迫。在主观上，中国作家不曾想到永居南洋，他们只是暂时寄留异邦，心理上向往故土，即使在海外，也期望为“祖国”鞠躬尽瘁。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中国作家在新加坡，便不单扮演作家的角色，同时也扮演起社会运动家、思想家，甚至结合政治活动的角色。这种情形，在其他语文写作界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当然，由于他们本身的条件，他们并未直接介入当地的政治团体，但在意识型态上，他们确实起了不小的影响。如果我们把1927——1948年新马的历史抽出来考察，总不能忽略这批中国作家在历史上（主要是在精神文化的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严格说来，过高地评估他们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不对的，但过低地评估或抹煞他们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有欠公允的。

在战前（即新加坡沦陷前），他们竭力宣扬抗战，鼓吹救亡，不单以笔为文，更亲身在救亡组织时承担要职（如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王纪元等）。在战后，配合反对殖民统治的形势，配合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他们提出他们的政治见解，几乎是结合了战后独立民主的滚滚洪流。他们始终主

张“华侨团结”，而且强调这团结必须建立在不分帮派、不分党派、不分老少的基础之上。他们针对华侨对政治冷漠这个弱点，不断剖析，不断开方，仿佛在尽“发聋振聩”的社会任务。

他们以他们的地位与职业活动范围，因势利导，对当地的文化思想起了某个程度的“领导”作用。在他们心目中，南洋各地根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而南洋仍然是“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比起古老的中国（半殖民地），一些窳风陋俗，有过之而无不及。反侵略与争民主的思想于是成为战前及战后初期的社会思想主流。³⁹人是文化的携带者。⁴⁰中国作家南来，自然带来了中国的新文化。这也确定了战前及战后初期，马华社会受中国社会影响的历史本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所在，风云谲变，脱胎换骨的社会变革此起彼伏。内战纷纭，人心惶惶，反映于海外，当然教海外人心思变，同时渴求统一，想望和平。中国作家抓住这一个事实，企图在海外尽力传播精神文化的火苗，使思想反过来影响社会。⁴¹

四、结论

南来的中国作家所携带的中国文化，其实有它固有的传统。这传统，其特质是“感时忧国”的精神，对个人和国家都流露出同等的关心。⁴²中国作家由于早期对西方意识型态倾慕而导致后来思想左倾，但他们从来没有忽略过两大目标：个人的解放和国家的新生。⁴³中国作家奔向海外，自然也不忘为这两大目标努力。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杨骚等大作家在新加坡从事抗战救亡事业，俨然是社会运动家，而且，在工作成绩上，救亡活动反比文艺创作来得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证实了，无论政治压力如何强大，社会环境多么动荡恶劣，中国作家的创作信念和意志并没有因而而丧失，这是中国作家传统的性格；越是在艰辛的岁月，越表现了中国作家这种传统的伟大性格。⁴⁴

对中国作家在新加坡的影响，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他们不仅发挥文学上的启导作用，更发挥了思想上、文化变迁上的助长与激发作用。他们留居虽短，工作却很落实。他们充份体现感时忧国的精神，他们那高度的爱国热忱，也鼓舞了新马的写作者。他们是作家，但在新加坡，他们留下比作家创

作的作品更可贵的人格与人生路向，他们堪称是思想家、社会运动者。在历史上，他们留下深固的轨迹。



附注

第一章 引论

- 1、欧美及日本，以至苏联各国学者，近年来陆续有不少特地到访新加坡，搜寻有关马华文学的资料。他们喜欢到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咨询，也拜访对马华文学研究的前辈。谢克在《新马文艺创作索引》（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及南大毕业生协会出版，1969年）后记（页72）里说：“据我们所知，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澳洲的墨尔本大学，都先后写信来向此间的书局购买大批新马华文文艺作品……”。
- 2、李汝琳先生在《南洋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中曾指出：“对南洋问题的研究，世界各国的学者，有终生从事乐此不倦的，但无论如何总不如生于斯长于斯的学人，对当地的情况有更精深透澈的瞭解。文学作品亦然，如以东南亚社会为背景，反映东南亚人民的生活，即使是世界最著名的大文豪，也不能和当地一位普通作者相比，这就是南洋文学不应忽视的道理……”《南洋学报》第25卷第1期（新加坡南洋学会，1970年7月），页51。
- 3、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London: Penguin Book, 1970. Reprinted. 1st Published in the USA, 1949.), PP. 17—18. 这段中文译文是笔者按英文本自译的。本节论文写完后，才发现中译本面市。参见王梦鸥、许国衡译《文学论——文学研究方法论》。（台北志文出版社，1976年10月），页23—24。
- 4、关于“代”（generation）的概念，是读了李欧梵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一书而触发的想法。
- 5、郑振铎《蛰居散记》附录（上海出版公司，1951），页125—130。
- 6、《南北极》月刊第52期（香港，1974年9月16日），页49—52。
- 7、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76年12月），页143。
- 8、同上，页146。
- 9、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新加坡1964年），页2。
- 10、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页408—409。

- 11、同注9，页6。
- 12、以多（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59），页6。
- 13、同上，页7。
- 14、同上，页10。
- 15、同上，页11。
- 16、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页82。
- 17、趁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8集“史料”，页8。原文（英文）见下Wignesan（ed.）《Bunga Emas：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n Literature（1930—1963）》（Kuala Lumpur：Anthony Blond with Rayirath（Ray Book）Publication，1964），P.250。
- 18、如果凡从中国来的会写作的都算中国作家，则算来好比恒河沙数，绝难研究。
- 19、这些中国作家崛起时间先后不等，但都是有定评的中国作家，而且是全国性的。其中王纪元是名记者，文艺性的写作不多，但他来新加坡编《南洋商报》的“狮声”，却很有贡献。
- 20、邱菽园1898年寓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自号星洲寓公。邱氏主张维新变法，改革中国。苏孝先主编《漳州十属旅星同乡录》（1948），页64。黄遵宪于1891年11月1日到新加坡，任总领事，1894年回国。他的诗，也和旧时代的其他马华诗人一样，常常以“化外”“番地”“夷蛮”作为马来亚的代词。《郑子瑜选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年），页287。
- 21、林语堂在1954年10月2日抵达新加坡。1955年4月17日离开新加坡，飞往法国。柯南“林语堂与南大”，《知识天地》月刊第3期（新加坡，1976年6月）页6；第4期（1976年7月），页6。
- 22、《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页49—55，页79。凌淑华任教期限为1956—1959，担任“新文学研究”及“新文学导读”的课。《凌淑华选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后记，页259。凌淑华在1960年离开南大到英国伦敦，与丈夫陈源（西滢）团聚。杜诚“细雨霏霏访凌淑华教授”，《星洲日报》“星云”副刊，1977年9月3日。苏雪林任教期限是1965年至1966年。
- 23、谢冰莹《作家印象记》（台北三民书局，1967），页58。
- 24、方修《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70），页45。

第二章 中国作家南来新加坡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 1、把白纸黑字的写作比喻为作战的“子弹”，正是抗战文艺的具体特征。杨骚在《南洋商报》1941年9月5日“狮声”反侵略文学专号上曾写一篇杂文，题名《以纸弹配合原子弹》（方修先生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时标题作“《以纸弹配合子弹》”，副题为“对反侵略文学口号提出一点意见”。其他在同时期南来的中国作家无不具有这种精神。
- 2、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2》（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页27。
- 3、傅东华“十年来的中国文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页664。
- 4、Huang Sung-K'ang, 《Lu Hsü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Amsterdam, Djambatan, 1957），P. 126。
- 5、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新加坡万里书局，1974），页42。
- 6、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72），页10。
- 7、以多（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新文学运动》，页5—6。
- 8、老舍《老牛破车》（原版上海出版，1937，香港光华书局再版，1959），页23。
- 9、同上。
- 10、同上，页25。
- 11、同上，页26—32。
- 12、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18。
- 13、同上。
- 14、郑振铎“忆愈之”，《蛰居散记》，页128。
- 15、胡愈之《论南洋华侨两大会议：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浪潮》，《南洋商报》，1941年4月6日。关于“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在当时报章简直没有报导，连代表第三战区的官方报纸也只能把军事委员会公布的几条电文刊载而已。曹聚仁《采访外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4），页124。其实，这次事变确也震撼国外；1941年1月7日，新四军部九千余人向北移动时，在皖南的泾县遭国民党军八万余人阻击。新四军苦战七昼夜，终于弹尽粮绝，除一千多人突围外，几乎全部牺牲。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香港朝阳出版社，

1973), 页38。

16、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编(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3), 页88。

17、曹聚仁《采访外记》, 页184。

18、Amitendranath Tagore, 《Literary Debates in Modern China 1918—1937》(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67), pp 214—215。

19、Ibid。

20、郁达夫南来的初期, 发表了“几个问题”的论文后, 引起黄耶鲁等的笔战, 对郁达夫诸多责难, 指郁氏为逃难的作家。战后初期, 1948年初发生马华文艺独特性论战, 在论战过程中, 胡愈之、金丁、巴人等都曾被指为逃难作家, 颇有受贬的意味。参照本论文第八章第二节“几场论争”。

21、1937年底及1938年初, 马华文艺界曾发生有关“文化人南来”问题的争论。大家对文化人避重就轻地不断南来, 颇有微词, 但当时中国国内的境况确也日非一日。但这问题的争论指出一些人为了苟安偷生, 躲开抗战责任的事实。

22、郑振铎“忆愈之”, 《蛰居散记》, 页125—126。

23、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 1946年), 页2。

24、郁达夫1939年1月4日在槟城文艺界宴会上演讲, 报告了国内文艺界抗战工作的近情。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香港世界出版社, 1956年“代序”), 页7。

25、有关细节, 见本论文“郁达夫”及“胡愈之”专章。关于郁达夫南渡的经过及原因的剖析, 王润华博士在他的研究报告《A Study of Yü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Malaya, and Sumatra, 1939—1945》(《郁达夫在新加坡, 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生活1939—1945》, 英文手稿本, 1969) pp. 1—15, 有细致的叙述。本论文不赘。

26、郁达夫在旧诗《星洲旅次有梦而作》写道: “钱塘江口听鸣榔, 夜梦依稀返故乡, 醒后忽忘身是客, 蛮欢似哭断人肠”。郑子瑜“郁达夫遗诗补录”, 《青鸟集》(香港编译社, 1968), 页81。

27、郑子瑜《青鸟集》, 页80。这诗题名“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

28、“晨星”通讯(许广平致郁达夫), 《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1940年。已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出版史料”, 见页434。许氏回郁达夫信的末尾说: “闻先生颇有回国之思, 我意还是暂缓较佳。……一切望为国珍重!” , 许氏反劝达夫暂留南洋。

29、王映霞在答辩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时表示是“被骗到星洲”, 她认为郁达夫在国内不敢胡言乱道, 但到南洋后, 反而追算旧账。她认为

郁达夫在国内已经身败名裂，才要出走南洋。《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香港宏业书局，1963），页216—232。

- 30、《南洋商报》1941年8月23日第六版“本埠新闻”，报导沈兹九抵星，提及沈氏身体欠佳，听医生劝告，由港来星休养。参照本论文第六章“沈兹九”一节。
- 31、杨一鸣《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页250。
- 3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编，页232—233。
- 33、夏衍从新加坡回香港后，仍关心新马文学的动向。1948年4月13及14日，《南侨日报》发表他的著名长文《马华文艺试论》，是当时马华文艺独特性争论的一篇总结性文章。本文第七章有关夏衍一节及第八章第二节“几场论争”再对有关文章加以讨论。

第三章 1927年至1937年中国抗战前南来的中国作家

- 1、关于洪灵菲的生卒年岁，精确的资料已经不容易查出。根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5月第1版，东京株式会社、大安，1966年再版发行，星大图书馆藏）页186所述，参照了洪灵菲自传性质的小说的内容及其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排算，定为1901年或1902年。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香港中国笔会，1976年），页268，叙及洪灵菲生于1901年。至于死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根据多种资料，暂定为1933年，但注明还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 2、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页268。
- 3、《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页185《洪灵菲研究资料编目》（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编）。
- 4、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页268。
- 5、同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页185、199。
- 6、《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页200。
- 7、同上，页198。
- 8、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408。
- 9、同注7，页188。
- 10、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2》，页397。
- 11、洪灵菲《流亡》，《洪灵菲选集》（北京开明书店，1952），页111—112。
- 12、善秉仁、苏雪林、赵燕声合编《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

- 《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48), 页54。
- 13、同注7, 页187。
 - 14、林曼叔、程海、海枫编著《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 1976年5月), 页22。
 - 15、Ranbir Vohra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老舍与中国革命》(Harvard University, 1974), 页53。
 - 16、同注14。
 - 17、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老牛破车》, 页25。关于他在华侨中学(简称“华中”)教书的说法, 见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序例, 页5。
 - 18、康拉德是有史以来的著名海洋文学家, 1888年, 在新加坡 Vidar 号工作, 他的作品, 都是以海洋为背景, 作惊天动地描写, 将人与自然斗争的艰难, 刻划得淋漓尽致。老舍一向喜爱康拉德的作品, 他自己说: “可是康拉德在把我送到南洋以前, 我已经想从这位诗人偷学一些招数。在我写《二马》以前, 我读了他几篇小说。他的结构方法迷惑住了我。我也想试用他的方法。这在《二马》里留下一点——只是那么一点——痕迹。……”, 老舍“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文学时代》第一卷创刊号(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1935), 页11—12。
 - 19、老舍《老牛破车》页25。
 - 20、同上, 页25—26。
 - 21、同上, 页26—27。
 - 22、同上, 页28。
 - 23、同上, 页29。
 - 24、同上, 页29。又, 善秉仁、苏雪林、赵燕声合编《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 页84。
 - 25、老舍《小坡的生日》, 原版生活书店, 1934, 翻版晨光出版社, 页23。
 - 26、小坡, 是在新加坡吊桥头(新加坡河)北面, 即桥北路 North Bridge Road 一带。直到今天, 习惯上还是称该地区为“小坡”。与它相对的, 在桥的南面称“大坡”。同上, 页1。
 - 27、同注19, 页27—28。
 - 28、Zbigniew Slupski, “The Work of Lao She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His Career (1924—1932)”,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edited by

Jaroslav Průšek (Berlin, 1964), 页90。后来这一章收入已出版的《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 Analysis of Lao She's Fiction (Prague: 1966)》。

29、同注19, 页28—29。

30、同注19, 页30—32。老舍说: “……可是我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使我看不起这本书了。在新加坡, 我是在个中学里教几点钟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 和他们在作文里所写的, 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 和所要知道的问题, 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 他们是很浮浅; 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 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 不是在西方。在英国, 我所听过最激烈的演讲, 也知道有专门售卖所谓带危险性书籍的铺子。但是大概的说来, 这些激烈的言论与文字只是宣传, 而且对普通人很少影响。学校是简直听不到这个。大学里特设讲座, 讲授政治上经济上的最新学说与设施; 可是这只限于讲授与研究, 并没成为什么运动与主义; 大多数的将来的硕士博士还是叨着烟袋谈“学生生活”, 几乎不晓得世界上有什么毛病与缺欠。新加坡的中学生设若与伦敦大学的学生谈一谈, 满可以把大学生说得瞪了眼, 自然大学生可别刨根问底的细问。……”

31、同注19, 页32。

32、杜晖《老舍在新加坡》, 《南洋文摘》第八卷第二期〔总86期〕, (香港南洋文摘社, 1967年2月), 页132。又, 闻堂“老舍在新加坡”, 《明报月刊》第53期, (香港, 1970年5月), 页24。

33、华夫“奋斗出来的作家: 艾芜”, 《华报》“作家简介”栏(新加坡天马图书, 1968年1月14日)。华夫直截了当地指出艾芜为当地政府驱逐回国, 但没有阐述原因。

34、艾芜原籍四川新繁县。《艾芜选集》代序(香港文学出版社, 1957年), 页20又, 施秀乔编《近代中国作家论》(新加坡世界书局), 页106。

35、艾芜生于1908年。冯式编《中国文学家辞典》(香港东亚书局出版), 页45。他到新加坡既为1930年, 则仅22岁。

36、艾芜《南行记》(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3年), 页4“原《南行记》序”。

37、艾芜当时在新加坡的生活十分潦倒。据赵戎叙述, 当时殖民地有免费船票遣送失业华人回国之举, 艾芜即以难民之一被遣送走的。《现阶段马华文学运动》, 页6。

38、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 页352。

- 39、同上，页350。
- 40、华夫《奋斗出来的作家：艾芜》。又，《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Short Biographies of Authors”，页1。
- 41、庄志凌“文学家艾芜”，《和青年人谈读书》（香港万千出版，1955年），页58，附录“杰出的人们是怎样读书的”。又，华鹿铨“艾芜的读书故事”，《南侨日报》“出版周刊”，1948年6月21日。
- 42、《艾芜选集》代序第二节。又，黄俊东“自称墨水瓶挂在颈上写作的艾芜”，《现代中国作家剪影》（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页174。据艾芜自己在《我的青年时代》（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5月初出版，1949年11月三版），页1说：“尽管这个职业，是给人打扫屋子，倒痰盂，跑街送信，做号房，等等一类的卑职事情，并不适合一个做过四年师范学生的身份，但这在我却一点儿也感不到羞耻的。”
- 43、季林《作家的生活》（香港文学出版社），页55—56。
- 44、艾芜在他的小说选集“自序”中说：“……就由于这种对劳工神圣的简单认识，并相信半工半读可以作到，便用一种豪爽和愉快的心情，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我六年没有同我家通信，也没和同学通过信，我决心跟我那出身的社会割断了联系，就这样投进了人生的大海。……”《艾芜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页1。
- 45、同上，页1—2。
- 46、苗秀《马华文学史话》第三十八章“郁达夫的悲剧”，页408。
- 47、艾芜《南行记》，页245。按《南行记》是艾芜的第一部小说集，原本只收八篇小说，出版于1935年；后来因为陆续再写些题材类似的小说，所以重新付印时，保留原名，而篇数已经变成24篇。
- 48、同上，页245—246。
- 49、同上，页246—247。
- 50、同上，页251。
- 51、《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页105。吴天后来也是名导演之一。
- 52、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16。
- 53、同上。《星中日报》亦是胡文虎所创，创刊于1935年9月11日。大约出版至1941年。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73），页93。
- 54、同注2，页216—217。

- 55、萧克“叶尼的‘怀祖国’”，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二集“理论批评二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1），页441。原载1940年3月2日《新国民日报》“新流”副刊。
- 56、同上，页441—443。
- 57、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七集“散文”（新加坡世界书局，1971年），页328。原载1937年3月2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 58、“一件事的始末”原载《南洋周刊》第17期；“胜利”原载《南洋周刊》第22期。这两篇都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散文”集，页332—351。
- 59、《马华新文学大系》“散文”集，页355—356。原载1939年8月29日总汇报《世纪风》副刊。
- 60、同注52，页218—219。
- 61、《马华新文学大系》“散文”集，页357—358。
- 62、吴天在“写作‘父与子’的前前后后”一文里说：“然而，我还是一个青年，朋友还得要的，戏剧还得干的……”，原载《星中日报》“星火”副刊，1937年10月11日，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页372。
- 63、刘宾“杂谈‘伤兵医院’”，1937年11月3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页370—371。又，叶尼“关于‘伤兵医院’”，1937年10月28日《星洲日报》，见《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二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1），页43。
- 64、叶尼“关于‘伤兵医院’”，《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二集”，页44。
- 65、同上。“业余话剧社”是1935年8月间由朱绪、蔡飘云、吴适鸣等发起筹组，经两年多，至1937年尾才获得批准注册。第二年，假大世界咏春园举行成立典礼。初设社址在马吉街，后迁罗敏申律，最后又迁实登里街。吴天虽非该社发起人，但后来加入该社，成为该社一名中坚份子。朱绪“星华话剧活动四十五年”，新加坡艺术剧场《十五年》（新加坡艺术剧场十五周年暨绞刑架下的中锋演出纪念刊，1970），“史料”部份。
- 66、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1），页234。
- 67、节录自叶尼自撰“伤兵医院本事”，载1937年12月4日《星洲日报》午版周刊“现代戏剧”，兹转述自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戏剧”集，页13—14。
- 68、同注64，页43—44。

- 69、同上，页45。
- 70、同上。
- 71、同上。
- 72、有关导演的手法及意见，可参考田共党““伤兵医院”导演者言”，苍“谈‘伤兵医院’的导演”，同注64，页46—51。
- 73、同注52，页409。
- 74、同上，页409—411。
- 75、同上，页409。
- 76、关于这场有关“地方性”问题的论争，重要文章都收录在《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二集”。本文第八章第二节“几场论争”再作探讨。
- 77、以上剧本，除“海外”一篇，俱已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戏剧”集，页264—330。
- 78、见注52，页217。
- 79、朱绪“星华话剧运动四十五年”，《十五年》（新加坡艺术剧场）“史料”部份。
- 80、《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二集”导言，页10，又，见注2，页86。
- 81、同注64，页203。
- 82、同注55，页5—6。原载1938年《星中日报》新年特刊。
- 83、《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导言，页3。
- 84、有关“文学通俗化”的论争文章，可参看《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页92—267。东方丙即东方丙丁。
- 85、同注52，页217。
- 86、同注64，页191—201。
- 87、《南侨日报》1946年11月26、27及28日第8版。
- 88、同注52，页218。
- 89、司马长风“战时战后文坛大事记1937—1949”，《南北极》月刊第83期，1977年4月，页70。
- 90、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页129。
- 91、《椰子与榴梿》出版于1936年。吴天才编《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年），页159。
- 92、据方修先生忆述。
- 93、参看本论文第八章注22。又，据一位老师追述，马宁真名黄柏堂。
- 94、巴金《海行杂记》（香港南国出版社，1960），页26。
- 95、巴金《海行杂记》，页27。
- 96、“浓得化不开”是徐志摩散文体的小说之一，主角林廉枫，恐怕即徐

志摩的化身，徐志摩写廉枫在新加坡，遇到马来人，住旅店，遇姑娘，写出“浓得化不开”的境界。《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页37—41。

97、《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页37。

98、同上，页38。

99、同上，页40。

第四章 1938年底南来的郁达夫

- 1、中国抗战后，郁达夫就从上海南下武汉，以后一直在各战场奔跑。直到中央决计放弃武汉，他才和政治部同事分手，由长沙经江西而到福建。从闽西北又跑到闽南，走了一圈，住了两个月，才离开中国到香港，再到新加坡。郁达夫《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答柯灵先生》，《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38年2月28日。
- 2、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在新加坡三年》，《蕉风》总第153期（吉隆坡，1965年7月），页62。南天旅社属于南天酒楼，在大坡二马路的闹市地带，即旧日珍珠巴刹（今珍珠坊）隔邻。目前还在经营中。
- 3、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在新加坡三年》，《蕉风》第153期，页62。
- 4、同上。后来温梓川向达夫索取墨宝，请他将此诗写成条幅，达夫慨允，后即写好相赠。
- 5、同上，页63。
- 6、同上。
- 7、散文两篇即：《槟城三宿记》和《复车小记》。旧诗四首，即：(1)《廿八年元旦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友人》；(2)《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3)《云雾登升旗山菊花方开》；(4)《楚璞谓升旗山似匡庐因演其意》。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香港上海书局，1962年），页26—27。
- 8、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在新加坡三年》，《蕉风》第153期，页66。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二节《南洋商报》“生活”版，1975年1月23日。苗秀《马华新文学史话》，页418。中峇鲁Tiong Bahru是个相当大的邮区，中保路Tiong Poh Road是中峇鲁区的一条主要道路。太平洋战争前后，很多文化人来新加坡后似有不少住在中峇鲁，如名教育家及书法家的高冠天先生（1935

年南来，办岭南分校）即是。

- 9、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二节。
- 10、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在新加坡三年》。丘帆《郁达夫在南洋的二三事》，《作品》第九期，（北京1957年9月），页69，述及达夫住家，却作“里峇峇里路”，未提及中峇鲁。他说：“那时候，他在星嘉坡里峇峇里路的家经常聚集了一批文艺青年，他常常在他们之间朗朗而谈，……”。究竟达夫可有家在里峇峇里路，待考。其实，中峇鲁Tiong Bahru与里峇峇里路River Valley Road 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地方，虽然相隔不甚远，却也不可能混二为一。
- 11、郁达夫是个书痴。每至书局，必满载而返。他去檳城游玩，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逛书局。在新加坡，所有中英文书局都有过他的足迹。他常到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印度人的旧书店买书，曾经有一次买了一大堆，用黄包车载着，他高高地坐在上面，凯旋而归。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南洋商报》1975年1月23日。郁达夫逃离新加坡前夕，曾经留书给胡浪漫及胡秋杰先生，托他们尽力保存，可惜沦陷之后，鸠为之占，门庭依旧，面目全非，所以存书已亡失难保。胡浪漫《读〈郁达夫选集〉后函编者》，《星洲日报》“文艺”版，1977年11月7日。
- 12、王映霞当时也在《星洲日报》任职，主编该报的“妇女版”，她的文笔也很清丽流畅。金紫阁《郁达夫的爱情生活》（香港蓝天书屋，1962），页29。又，李冰人《永忆诗人郁达夫》，载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58），页61。
- 13、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147—149。按，“晨星”是1932年8月开始出版的文艺性日刊，一开始即由林健庵负责编辑。“繁星”则为同时出现的《星洲日报》晚报副刊，先后任编辑的有胡戍女、马康人、林健庵等。参考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10—15。
- 14、《星洲日报》1939年1月9日星期一早版第八页“晨星”副刊。已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史料”（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364。
- 15、同上。已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页363。
- 16、《星洲日报》1939年1月9日晚版第四页《繁星》副刊。
- 17、《星洲日报》1939年1月15日星期日第14页。已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史料”页367。郁达夫文中所指的“郑先生”，即郑卓群，亦即铁抗。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410。
- 18、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4—8。
- 19、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09。又，李向《郁达夫在

- 新加坡》第四节，《南洋商报》“生活”版，1975年2月6日。
- 20、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418。
 - 21、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四节。
 - 22、同上，页13。
 - 23、“编辑者言”刊于1939年1月19日“晨星”，收入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出版史料”，页365—366。《几个问题》刊于1939年1月21日“晨星”，收入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页444—448。
 - 24、《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39年1月19日。
 - 25、同上。
 - 26、《星洲日报》“文艺”周刊，1939年12月31日。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出版史料”，页368—370。
 - 27、所谓“马来亚的一日”，恐怕是模仿茅盾发起的“中国的一日”（1935年），而“中国的一日”又是仿照高尔基“世界一日”为体例。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2》，页473。丘帆“郁达夫在南洋的二三事”，《作品》第9期，页69—70。又，苗秀“记郁达夫”（写于1953年12月25日），收入他著的《文学与生活》（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67），页54。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在新加坡三年”，《蕉风》总153期，页66。
 - 28、《星洲十年》是《星洲日报》社出版的一部年鉴性质的参考书，出版于1940年1月。由关楚璞主编，编委除郁达夫外，有姚楠、张礼千、钟介民、许云樵、张匡人、李葆真。
 - 29、温梓川“郁达夫别传”，《蕉风》总156期，1965年10月，页25。又，《南洋学报》编者撰“纪念郁达夫先生”，《南洋学报》第四卷第一辑（新加坡，1947年3月），页70—71。
 - 30、西德汉学家马汉茂 Helmut Martin 辑“给郁达夫的信”，1970年编，第一封。《明报月刊》总第88期，第8卷第4期（香港，1973年4月），页64。
 - 31、同上，第二封。
 - 32、《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香港宏业书局，1963年），页214—215。
 - 33、王润华先生研究报告《A Study of Yü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Malaya, and Sumatra, 1939—1945》（1969），页24。
 - 34、陆丹林編集《郁达夫诗词钞》，页26。
 - 35、谢云声“郁达夫诗词及其他”，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

集》，页189。

37、同注33。

38、张秀亚“关于郁达夫”，载苏雪林、张秀亚、林海音合编《近代中国作家与作品》第一集（台北纯文学月刊社，1967年初版，1969年再版），页89。

39、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一节。“道记”烧腊摊今天还在，位于重建后的珍珠百货市场底层。至于老巴刹，也仍在，不过已重修，即在罗敏申律《星洲日报》旧址对面不远。

40、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一节。

41、著名南洋考古学家，晚年回北京，1970年去世。

42、《南洋学报》编者“纪念郁达夫先生”，《南洋学报》总第7期，第4卷第1辑（新加坡，1947年3月），页70。

43、珊珊（吴继岳）“回忆郁达夫”，《知识天地》第9，10期合刊，（新加坡，1976年12月），页35。

44、据说当年有一个以草裙艳舞轰动遐迩的舞后冯某，住在大世界游艺场附近，每晚登台，定必满座。郁达夫每天从《星洲日报》编完副刊，下班后必定和罗良铸博士同访那位冯舞后，喝酒聊天，借资解闷。温梓川“郁达夫别传——郁达夫与女人”，《蕉风》月刊，总161期（1966年3月），页45。

45、郁达夫因为去舞场喝酒，因此认识了当年曾经名满春申江上的舞国名姬，又是中国青年作家穆时英华所赏识的姊妹花。他与她们拍过一张照片，登在当时的画刊上，人所共知，有目共见。王映霞曾为了这张照片，大兴问罪之师，逢人便说：“他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两面是姊妹花的红舞女，他居其中……”温梓川“郁达夫别传——郁达夫与女人”，《蕉风》总161期，页45。又，朱淇绿“漫谈郁达夫与王映霞”，戴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页38。

46、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一节。笔者曾听施香沱先生追叙，郁达夫甚至当着儿子面前与女人“相好”，露骨无遗，真是浪漫不减当年！因名在“郁达夫与诗人厉鹗”中也说：“南洋人对郁的为人并不生疏，当他高兴时，眠花宿柳是常事。而且当着许多妓女舞女在座时，常欢喜把太太儿子带在一起……”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页31。

47、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在新加坡三年”，《蕉风》总153期，页66。

48、同上。

49、郁达夫“檳城三宿记”，收入《郁达夫南游记》，页48。

50、写作时间由1936年初至1938年底不等。方修《沉沦集》（新加坡

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1975), 页70。

- 51、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一节。王润华先生研究报告《A Study of Yü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Malaya and Sumatra, 1939—1945》, 页24—25。“毁家诗纪”又名“无题”, 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载, 无注语, 页27—30。《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所载则有注语, 页203—215。由于“毁家诗纪”的发表, 该期的《大风》旬刊竟一年内再版三次, 销路大增。
- 52、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一节。关于王映霞的信, 可参考《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页216—232。
- 53、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一节。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07; Anna Doležalová, 《Yü Ta-Fu: Specific Traits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Bratislava, 1971), P.204, 都说是1940年3月。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蕉风》月刊第154期(1965), 页69, 则说是1940年2月。
- 54、《南洋学报》编者“纪念郁达夫”, 《南洋学报》总第7期, 第4卷第1辑(1947), 页70。
- 55、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蕉风》月刊第154期, 页69。阳春(即郁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同住, 直到新加坡沦陷前, 才经疏散回重庆, 由陈仪代为抚育。谢云声“郁达夫二三事”, 载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 页210。殷春实为第四子, 在其上有一女儿, 但从小送给一个住在松江的娘姨。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香港宏业书局, 1965年再版), 页48。
- 56、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蕉风》第154期, 页69。
- 57、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蕉风》月刊第154期, 页69。温梓川说郁达夫即席做了三首律诗给她(王映霞)。可是, 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页31—32, 前两首标题《南天酒楼饯别感赋》, 末首标题《有寄》。南官搏“谈郁达夫毁家诗纪”则说:“当《毁家诗纪》刊出之后, 王女士出走, 达夫还念念不忘, 幻想她能重回, 当时, 他曾有一诗寄映霞, 时我在内地, 得达夫函见之。……”他提的诗即“大堤杨柳记依依”那首。王润华先生根据陆丹林编的《郁达夫诗词钞》, 在研究报告《A Study of Yü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Malaya, and Sumatra, 1939—1945》, 页25, 说:“On the eve of Wang Ying-hsia's departure for China, Ta-Fu gave her a farwell party at Nan Tien Hotel 南天旅店。Yu Ta-fu composed two

classical poems to mark the lamentable event at the party.”其实，陆丹林所收诗两首中的第二首原题《三月一日对酒兴歌》，发表于1940年5月22日的“繁星”版。至于《有寄》一诗，是王映霞走后达夫才作的，原题《与王氏别后托友人去祖国接二幼子来星王氏育三子长名阳春粗知人事已入小学幼名殿春建春年才五六》，发表于1940年6月6日的“繁星”版。据此比较，可知温梓川先生所谓赋诗三首，恐不确。至于两首，也可能是一首即席，一首早已做好的。此地仅录即席吟咏的一首。这首于1940年5月29日刊于“繁星”版。

- 58、王润华先生《A Study of Yü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Malaya, and Sumatra, 1939—1945》，页26。
- 59、温梓川“郁达夫别传”，《蕉风》第154期，页69。又，曾梦笔“遇郁达夫”，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页124—125。
- 60、珊珊“回忆郁达夫”，《知识天地》，第9、10期合刊，1976年12月，页37。
- 61、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40。又，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页39。
- 62、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32—33。
- 63、丘帆“郁达夫在南洋的二三事”，《作品》1957年第9期，页69。
- 64、《华侨日报》1946年3月11日第四版“星海”副刊。
- 65、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418。苗秀原名卢绍权，曾在南洋大学执教，主讲“文学概论”及“马华文学”。
- 66、苗秀《文学与生活》，页54。
- 67、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29—233。
- 68、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418。
- 69、同注63。
- 70、方修“读《冯蕉衣纪念特辑》”，《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4），页70。
- 71、《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40年10月17日。当时除《星洲日报》出版特辑外，《南洋商报》的“文艺界”也出版两个纪念蕉衣的特辑，1940年10月16日及17日；《光华日报》的“大路”也在1940年11月20日出版纪念蕉衣特辑。方修《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页69。
- 72、《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40年10月17日。
- 73、方修《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页70—72。
- 74、同注72。
- 75、《星洲日报》“晨星”，1941年2月12日，“序冯蕉衣的遗诗”。

- 76、郁达夫“悼诗人冯蕉衣”说：“……但当双十节的晚上，王修慧君忽于深夜跑到报馆来告我以冯君的死耗的时候，我真疑他是在说谎”。
《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10月17日。
- 77、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85。
- 78、方修“君实书简辑注”，《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页45—46。
- 79、同上，页46—47。
- 80、同上，页54—55。白荻，或署白琳，楼雨桐，原名黄科梅，1930年南渡新加坡，1961年杪在新加坡病逝。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65年），页161—164。
- 81、方修《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页55。
- 82、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85，又，《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页54—55。铃木正夫“马华文学と中国及び中国文学”（上），日本《野草》第18号（1976年），页24—25。金紫阁《郁达夫的爱情生活》，页66。
- 83、丘帆“郁达夫在南洋的二三事”。又，苗秀“记郁达夫”《文学与生活》，页53。
- 84、苗秀“记郁达夫”，《文学与生活》，页54—55。
- 85、同上，页55—56。
- 86、同上，页57—58。
- 87、丘帆“郁达夫在南洋的二三事”。又，林曼叔、程海、海枫编著《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67。
- 88、罗方“郁达夫先生轶事”，《华侨日报》，1946年3月2日第四版“星海”副刊。
- 89、刘前度“郁达夫在马来亚”，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页157。
- 90、王润华先生“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民报》（新加坡，1976年12月14日，转载自台湾《中国时报》）。
- 91、同注63。郁达夫写了“‘原野’的演出”，《星洲日报》“文艺”，1939年10月8日。
- 92、同注63。
- 93、郁达夫写了“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6月14日。关于金山与新中国剧团，在本论文第六章第二节里，有详细论述。此外，郁达夫还写了“再见王莹”（1940·3·10《星洲日报》“文艺”），“‘塞上风光’之演出”（1940·5·18《星洲日报》）等。
- 94、郁达夫写了“与悲鸿的再遇”，《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3月2日。又写了“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展目录序”《星洲日报》“晨星”，1941年2月6日。又，“刘海粟教授”，《星洲日报》“晨

星”，1941年2月22日。

- 95、“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4月在武汉成立，那时郁达夫还在中国任事。郁达夫在“关于协助文协的事情”一文中说：“我做事情，总只想从实在有效的方面做起，开始不妨小小的来做。以后再逐渐逐渐扩大，推行开去。所以，在这里，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所做得到的第一步，我只能提出这样一个提议。“晨星”三月份的稿费，将次结出了，凡曾在一月份的“晨星”上，发表过稿子的诸位同志，愿意将稿费的全部或一部捐助文协者，请于今日起，即赐以一张信片，陈述志愿程度，当可由我来代向会计处取齐汇出。姓氏款数，待结清后，再行登入此栏公布。……”（1939年4月7日“晨星”）。后来，郁达夫又发表“捐助文协计划”，1939年7月22日《星洲日报》“晨星”。
- 96、黄文贵“‘七七’抗战星华知识份子与救亡运动”，《新社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新加坡新社，1970年9月），页17—18。
- 97、G.P. Dartford原著，《马来亚史略》（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1959），页180。
- 98、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印《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1947），页56。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叙及此点，则称“文化界抗敌大同盟”，《蕉风月刊》第154期，1965年8月，页69。
- 99、《大战与南侨》，页56。
- 100、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2—3。
- 101、同注99。
- 102、同上，页57。
- 103、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第五节，《南洋商报》，1965年2月。
- 104、同注102。
- 105、“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或称“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英文称“Chinese Mobilization Committee”，又称“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或“华侨抗敌后援会”，名称颇多。当日军从北再往南长驱直下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呼吁华侨同心协力抵挡日军攻占新加坡。英国当局开始与华侨领袖商讨联合抗日事宜。经过慎重考虑，华侨各界都希望商界巨人陈嘉庚出而领导，英国当局也认为此事非陈氏领导不可。十二月底，在陈氏领导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终于成立。这个总会，不但得到新加坡总督珊顿·汤姆士·She-nton Thomas 爵士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当地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协助。这个总会一直积极从事，直到陈嘉庚于二月三日逃往苏门答腊才告一段落。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1946年），页335—338。

- 106、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3。
- 107、同上。
- 108、同上，页3—4。又，Ivan Simson, 《Singapore: Too little, too Late: The Failure of Malaya's defences in 1942》(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0), PP. 92—105。
- 109、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5。关于郁达夫离新的日期，当以胡愈之的说法可靠。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里说是2月6日。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则说是“新加坡沦陷前五天”(推算起来即2月10日或11日)。
- 110、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15。胡愈之在最初向文化界报告郁达夫被架失踪时说：“……郁君五年前逃至苏门答腊，西部，改名曹来，……”《华侨日报》，1945年10月6日晚版第二版新闻。这恐怕是惟一资料说达夫改名“曹来”的。可能郁达夫最早易名曹来，后再改为赵康。
- 111、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20。
- 112、同上，页16。
- 113、同上，页21。
- 114、同上，页30—31。郁达夫的死讯，最早由联军当局审讯日本战犯，录取口供后证实。
- 115、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P. 106。
- 116、《人间世》第26期。李冰人编《郁达夫集外集》(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58)，页190。
- 117、孔尊“郁达夫一气走南洋”，杨一鸣编《文坛史料》，页297—299。
- 118、苏雪林《文坛旧话》(台北：传记文学社，1969)，页62—63。
- 119、贺玉波该文作于1931年10月15日，载贺玉波编《郁达夫论》(上海大光书局，1936，香港实用书局1972年7月重印)，页211—212。
- 120、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页2(序)。其实，郁达夫在新加坡居留时间应该是三年一个多月，不是“两年余”。
- 121、方修“郁达夫留给本地的一笔文学遗产”，《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页29。截至本论文脱稿，市面上已有两种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作品集出版。一为方修编《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收入林徐典博士编《星马报人文丛》，新加坡世界书局，1977年2月。一为方修与张笳合编《郁达夫选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77年8月。两种版本编辑时间有先后，篇数也有出入，所以必须配合阅读。

- 122、“估敌”发表时，在文前有一小段作者介绍这么写：郁达夫先生，浙江籍。前北大，中大，武汉大学教授，军委会政治设计委员，为宣传抗战，不辞劳瘁，南来星洲，今日起，加入本报工作。因此，1939年1月1日为郁达夫上任的日期。
- 123、“估敌”，1939年1月1日《星洲日报》第十四版“元旦献金”。
- 124、同上。
- 125、同上。
- 126、李阳“郁达夫和他的作品”一文中说：“一九三八年冬，郁达夫‘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毁家诗纪’）”戴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页55。
- 127、即“岁朝新语”，写于来新加坡途中，写作日期是1938年12月23日。“岁朝新语”被收录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香港文学研究社），页307—309。
- 128、方修先生“郁达夫留给本地的一笔文学遗产”末段说：“再看郁氏一生的生活道路，特别是他晚年的思想上的发展，觉得一些文学史著称他为爱国主义者，倒也不是什么溢美之辞。……”《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页32。称郁达夫为爱国者的评语，可参看丁易为《郁达夫选集》写的“序言”（北京开明书局，1951）；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人民文学》第五、六期，1957年5、6月，页202至203）。又，Anna Doležalová在《Yü Ta-Fu: Specific Traits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Czechoslovakia: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71）的Supplement，页205中说：“……It is evident that the cause of his murder was Yü Ta-fu'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We do not share C.T. Hsia's view that this was an ironical end for a writer who had been neither a communist, nor a great patriot.”
- 129、《战时的忧郁症》，《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2月21日。
- 130、郁达夫“毁家诗纪”第二十“贺新郎”词，原载《大风》旬刊第30期，1939年3月5日。
- 131、《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7月9日。
- 132、《略谈抗战八股》，《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5月5日。
- 133、《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39年1月22日。
- 134、同上。
- 135、《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39年1月21日。

- 136、“槟城三宿记”发表于《星洲日报》地方新闻版，1939年1月。“复车小记”发表于《星洲日报》1939年1月11日。“马六甲游记”发表于《南洋商报》创刊号（1940年6月），页90—94。
- 137、《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39年2月20日。

第五章 1940年底南来的胡愈之

1、关于胡愈之的生平，就所找到的资料，有下列几种记载：

- (1)1895年（见霞山会编《现代中国人名辞典》，财团法人霞山会，昭和41年初版）。
- (2)1896年（《中共人名录》，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67年8月。又，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南北报》月刊第52期P.49，1974年9月16日版）。
- (3)1897年（《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Vol I,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又，Bonnie S. Mc Dougall,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into Modern China》，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P.349中提的胡愈之，也以1897为生年）。兹根据南侨报社1950年8月出版《新中国与南侨》页81“新中国人物志”一节里所述胡愈之生平“……今年53岁”推算，又据前辈友人转告，谓胡愈之今年（1977年）81岁，则定1896年为生年是可靠的，1895年及1897年之说俱非。

2、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作家小传里已有胡愈之的生平介绍。

3、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10月），页249。

4、同上。鲁迅对《莫斯科印象记》相当推崇，他在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的序文上说：“……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闻见录》。……”刘授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405。

5、王云五“关于东方杂志的回忆”《岫庐论学》（台北大华晚报社，1965），页452。

6、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南北极》第52期，页51。《世界知识》创刊于1934年9月，至1941年停刊，生活书店发行，在上海、汉口、香港各地出版，其他编辑包括钱亦石、邹韬奋等。

- 7、同上，页49。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史良（女）是江苏无锡人。
- 8、“郑振铎同志传略（1898—1958）”，作者未详，《考古学报》（季刊）总22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8年12月），页2。
- 9、同注6，页49。
- 10、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2。
- 11、同上。据《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Vol I, P.294, 则说：“……with Fan Ch'ang-chiang, founded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and Literary Supply Society in Kweilin, 1937。”
- 12、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南北极》第52期，页50。
- 13、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香港远东图书，1967年），页437。
- 14、Bonnie S. McDougall.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PP.220—227。“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7卷第1期（1920年1月）；“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期（1921年1月）。
- 15、樊茹编《中外历史大事年表》（香港：中华书局，1975），页135。
- 16、C.P. Fitzgerald: 《The Birth of Communist China》(Uk: Penguin, 1964), P.88: “……this Situation was the growing dissension between Chungking and Yenan, the Communist headquarters, in the years following 1940。”
- 17、《南洋商报》，创办于1923年9月6日。创办人为大企业家陈嘉庚。陈氏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当初创办是为方便他的树胶事业的广告与印刷。最初社址是罗敏申路28号。1931年11月，由于经济问题，印刷厂由罗敏申路迁至小坡三峇哇路陈嘉庚制造厂内，办事处则移到附近的大马路。第二年，以林庆年、李光前、叶玉堆、李玉荣等董事组成“南洋商报有限公司”，脱离了陈嘉庚有限公司。1937年再行增资，由李玉荣接办《南洋商报》，李氏担任董事主席，并将社址迁回罗敏申路47号。《南洋商报》自此有所改进。胡愈之受聘南来，已是在《南洋商报》改组之后。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1881—1972》，页41—44。
- 18、《南洋商报》1940年12月2日星期一第六版。新闻标题是：“本报新聘

胡愈之为编辑主任

王纪元为编辑二氏均已开始视事

本报暨《新国民日报》同人设宴欢迎”

- 19、胡愈之“反省与呼吁”，《南洋商报》星期刊“新南洋”第22期“记者节特刊”（第9版），1941年8月31日。
- 20、同上。
- 21、胡愈之“追念许地山先生”，《南洋商报星期刊》，1941年8月10日第10版。
- 22、据方修先生追述，胡愈之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的期间，该报社论大都出于胡氏之笔。如果不是胡氏所撰，从社论的笔调极容易分辨出来，因为胡氏笔调自成一格，既绵密深刻，又平易有说服力，如剥笋壳，一层一层深入，是不易仿学的大手笔。
- 23、据一位在报界服务的朋友转述《南洋商报》一位老排字工人的所见所历，该排字工人已逝。1941年9月30日的《南洋商报》社论“湘北战局的危机与转机”，最后一段这么写：“写到这里，接最后电讯，知道到昨午为止，长沙仍在我手中，敌军十万现正在离城八哩的捞刀河与汨罗河间被我层层包围，行将遭歼灭，这样，目前战局的危机，也许正是有利的转机罢。”可见胡愈之写社论，是一边起草，一边付排，这是最有新闻价值的社论写法。
- 24、据方修先生转述。
- 25、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31—32。
- 26、陈育崧主编《陈嘉庚》，页120—123。
- 27、陈嘉庚本来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海外华人，对于当时中国两大政党，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都毫无偏倚。他只是基于自己的一片爱护中国的热诚，希望两党能够亲密携手，共御外侮。后来，他目睹国民党的许多弱点，才逐渐作出自己的选择。尤其战后，他深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陈育崧主编《陈嘉庚》，页91，126。在《南侨日报》创刊号上，他写了一则“告读者”，言词恺切：

“余自民国光复后，矢志为国家社会服务，冀以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赋。故由农工商业而及于教育。旋并创办《南洋商报》，故为商业战之先导。迨民二十三年初，因世界不景气之影响，各业损失颇巨。致有限公司收盘。《南洋商报》遂亦易主，而与余脱离关系矣。至于服务国家社会之职志，余则仍本初衷，绝不因遭遇困难而稍馁。自……南侨回国慰劳，身历各境，深痛官吏之贪污，民生之惨苦，都臻于专制独裁所造成；尤其党派之不能团结，内战之无可避免，确因政治不行民主之故。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耿耿此心，可矢天日，重念此项促进和平民主之使命，实亦时代所赋

予。《南侨日报》其能克副此任务乎，则视同事诸君如何奋斗耳。……”

- 28、许甦吾“新加坡中英报业史话”，《东南亚研究》（许云樵主编）第七卷，（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71年），页82。
- 29、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南北极》第52期，页50。紧急法令是1948年6月实施的，胡愈之大约在该年3月左右已经离开。因为在胡愈之回中国写的一篇纪念《南侨日报》三周年的文章“寄给远方的朋友”中说：“我离开我所怀念的新加坡也有二十个月了。”该文写于1949年11月5日，照日期推算，20个月前，则为1948年3月。赵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作家小传，页414，记胡愈之在“当地宣布紧急法令后回中国”，恐误。
- 30、《南侨日报》1946年11月21日第一版。《南侨日报》后为英政府列禁，如今极难寻获资料。星大及南大图书馆保存显微影片，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 31、同上。
- 32、同上。
- 33、胡愈之“致谢一切爱护本报人士”，《南侨日报》编《新中国与南侨》，页65。
- 34、同上。
- 35、同上。
- 36、《新中国与南侨》，页70。
- 37、参见本论文第六章第六节“沈兹九”。
- 38、中共人名录编修委员会编修《中共人名录》（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67年），页198。
- 39、据施香沱先生忆述。
- 40、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32。
- 41、同注38。
- 42、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印《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页53—54。
- 43、同上，页53。
- 44、见本文第四章第五节“抗日救亡活动”。
- 45、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页81。
- 46、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8集“史料”，页646。
- 47、同上，页644。
- 48、同上，页618。
- 49、各篇俱见赵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所引目录，页611—641。
- 50、郑振铎《蛰居散记》，页129。

- 51、同上，页50。
- 52、闻一多说：“今天我们再不是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的中立者了，今天我们要站出来，做活动于两极之间的积极的中间人。但是所谓中间人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事佬。我们要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来做两极之间的公断人。我们除了牢不可破的对民主的信念以外，没有任何成见。……民主同盟是国共两党的小兄弟。”见《闻一多全集》第3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香港南通图书公司重印，1976），页23已，演讲录“民盟的性质与作风”（1946年6月28日演讲）。
- 53、《南侨日报》1947年1月30日“民主周刊”版“民主评坛”栏，胡愈之“答客问”。
- 54、同上。
- 55、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
- 56、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2。
- 57、《华侨日报》1945年10月6日晚版，第2版。曹来应为赵廉之误。
- 58、同上。
- 59、同上。
- 60、见《星洲日报》1947年1月20日报导。
- 61、见1941年6月26日至7月2日的《南洋商报》社论，标题是“本报的立场与态度”，论的是报人的责任与报格，宣定《南洋商报》抗战的立场、民主的立场与无党无派的立场。
- 62、《南洋商报》1941年新年特刊“岁首献辞”，所引为该文“南洋的新时代”的前言部分。
- 63、同上。这些文字在该文的第一小节“战争中的世界”。
- 64、同上。见该文的第二小节“战争中的祖国”。
- 65、同上。这是在该文的第三小节“战争中的南洋”。
- 66、同上。见该文最后一小节“怎样迎接新时代”。
- 67、亨德T. W. Hunt说：“一切文学的阅读的最后目的和最主要目的，就是‘兴奋’，‘冲动’，‘精神的和文学的感兴’——就是读者的心灵之深澈和通透的推动，而使他的情绪和知识的自我受着了电流而加速了机能的。这样的作用，最好可以用一个名词表出来——‘兴奋的文学’，就是推动和燃烧读者的全人格而唤醒他的一切潜伏能力的。”，亨德著，傅东华译《文学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重版，1971年），页267—268。胡愈之在来新加坡之前，也是介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老手。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建基于亨德的文学理论，此外，也受Moulton及Hudson的理论影响。见Bonnie S. Mc Dougall,《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 68、《南洋商报》1941年1月16日“狮声”副刊。已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九集“剧运特辑二集”，页450—452。当时《巡按》一剧是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演出的，导演李佑辰。
- 69、同上。
- 70、胡愈之“追念许地山先生”，载《南洋商报》星期刊第十版，1941年8月10日。这篇文章写作日期是1941年8月6日。《南洋商报》报导许地山逝世的新闻是在1941年8月5日。
- 71、《南洋商报星期刊》第十一版，1941年8月31日。
- 72、见本文本章第一节“主持报馆笔政”注27。
- 73、见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8集“史料”，页621。
- 74、同上，页356—357。
- 75、吴天才编《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附作者索引》，页197。
- 76、《南侨日报》1948年1月12日第5版。关于胡愈之这一论战，待“影响”一章再详细讨论，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1集“理论”收录了有关的主要文章。胡愈之的“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和“牛角尖图解”二文都有转录进去。
- 77、《南侨日报》1946年12月6日第七版“南风”副刊。
- 78、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的“后记”，页35—36。
- 79、同上，页33—34。

第六章 1937年中国抗战后至1941年南来的其他中国作家

- 1、张楚琨“亡友高云览和他的遗著‘小城春秋’”，高云览著《小城春秋》附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319。
- 2、林曼叔、程海、海枫合编《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67。
- 3、同上。
- 4、同注1，页320。
- 5、据王秋田先生口述。南洋女子中学原为女子小学，创设于1917年，于1930年改为中学。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页55。
- 6、同注2。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上册页94说：“民国廿八年冬，余想祖国抗战二年余，沿海重要出入口概失守，华侨回国甚形困难，对于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虽逐月输汇义捐，及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壮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

海外华侨救义实有未尽。故发起组织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曰‘慰劳团’，……………”。

7、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下册，页300—302。

8、同注1，页321。

9、《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41年1月1日，第9张“检讨与展望”版。

10、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册，页246。

11、同注9。

12、《南洋商报》“狮声”副刊，1941年9月9日。

13、“致日本高桥夫人的信”及“人理昭昭”，方修《马华文坛往事》（新加坡星云出版社，1958），页74—79，页82—83有节录。“翻脸”及“汉奸往见上帝记”，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七集“散文”，页416—424。“翻脸”原刊于1938年11月9日《南洋商报》“狮声”，“汉奸往见上帝记”原刊于1938年12月《南洋商报》“狮声”。

14、方修《马华文坛往事》，页78。

15、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392。

16、耶鲁曾写了“怎样理解‘日出’在马来亚演出的意义”，发表在1938年10月11日《南洋周刊》第15期，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九集“剧运特辑二”，页230—232。

17、《南洋周刊》第18期。原书已找不到，参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九集“剧运特辑二”，页233—234。

18、同注16，页235。

19、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4—5。

20、同注1，页321。

21、同注1，页321。

22、林曼叔、程海、海枫合编《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67。

23、尹雪曼等编《中华民国文艺史》（台北正中书局，1975），页723。

24、金山即是《一个角色的创造》（《演〈万尼亚舅舅〉手记》）的作者。他的名字与作品，也出现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7），页150—151。他率领新中国剧团在新马巡回演出，返国前报上新闻载：“誉满海内外之新中国剧团，自奉命出国南来抵星后，在南侨总会主持下举行巡回全马义演筹赈宣传，成绩卓著，正期继续努力，为国效命，不幸因环境关系，不得不于上月十日宣布结束海外工作……………”《南洋商报》1941年2月14日第九版。

25、陈翠“在抗战中生长的一群——新中国剧团人物介绍”，陆浮编《新

中国剧团在新加坡》(新加坡南洋报社, 1940), 页50—51。该书编者陆浮为新中国剧团一个主干, 负责对外宣传。该书出版于该团北上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之前。

- 26、朱绪“星华话剧活动四十五年”, 《新加坡艺术剧场十五周年暨统刑架下的中锋演出纪念刊“史料”部份》, (新加坡艺术剧场, 1970)。又, 在陆浮编《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内收录金山的文章, 全署名赵洵。
- 27、冯伊湄《我的丈夫司徒乔》(香港上海书局, 1977), 页99。
- 28、陆浮“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我们工作的回顾和前瞻”, 陆浮编《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 页27—30。
- 29、同上, 页30—31。
- 30、同上, 页61, “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筹赈义演纪录”。
- 31、《永定河畔》为田汉编著的四幕历史名剧, 金山将它改写增删为三幕剧。演出时, 利用体育馆的特殊建筑, 舞台以凸字形装置, 利用原有的石级座位, 变为宏伟的石桥石级。演出除新中国剧团团员, 还有新加坡一百多位爱好戏剧的青年朋友。当第一幕在炮声隆隆, 喊杀连天中闭幕, 剧场中央的半空突然挂下来一个五尺见方八尺高的玻璃献金箱, 于是大规模的献金运动开始了。不论是侨领、苦力、巨商、小贩……都纷纷捐献, 老太婆把金耳环、金戒指都献上, 而几个七八岁的小孩把整个“扑满”都献上了……, 陆浮《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 页35—36。
- 32、同注30。
- 33、同注28, 页31, 页38。
- 34、赵洵“‘永定河畔’导演琐语”, 陆浮《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 页13。
- 35、赵洵“‘永定河畔’导演感言”, 陆浮《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 页17—18。
- 36、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 页420。赵洵自己在“‘永定河畔’导演感言”也说: “此剧演出的形式, 在欧美固不鲜见, 然在吾国尚属两次试验……这次的演出, 可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希望从这次尝试中, 学到更多的教训和经验”。
- 37、同注28, 页38—40。
- 38、《南洋商报》1941年2月14日新闻, 1941年2月15日, “新中国剧团返国辞行启事”。
- 39、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九集“剧运特辑二”, 页449。原载1941年1月13日《星洲日报》; 大系作1940年1月13日, 误; 因《巡按》一剧乃在1941年1月13日假维多利亚剧院公演。

- 40、见本章第三节“王纪元”注47。
- 41、《南洋商报》1940年12月2日星期一第六版。参见本文“胡愈之”一章第一节注18。
- 42、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157—164。
- 43、《南洋商报》1940年12月5日“狮声”。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出版史料”，页435—436。
- 44、这篇“刊首的话”后面署上的写作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刊于1941年3月1日第12版“狮声”。录自南大图书馆藏显微影片，由于报迹有些模糊，为了存真起见，凡是看不清楚的文字概以□号代替。
- 45、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169。
- 46、《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41年1月1日第27版。
- 47、《南洋商报》1941年2月1日“狮声”。
- 48、有关的史实，可以参考本文郁达夫一章第五节“抗日救亡活动”，此地不赘。
- 49、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编，页202。
- 50、同上，下编，页45。
- 51、善秉仁等《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页107，108。
- 52、巴人《遵命集》（北京出版社，1957年），页131，“记杨骚”：“自1936年以至1937年的抗战爆发，我记不起是否有同他见过面。1941年3月，我自上海‘疏散’到香港；7月又从香港‘疏散’到新加坡，我又重新会见杨骚了。……他是比我早大半年到新加坡的。……”又，郁达夫在“诗人杨骚的南来”一文头段说：“与杨骚在福州别后，已经有三年不见了。虽在报章杂志上，时时看到他的消息，但是从武汉而湘西，从湘西而桂粤，我却终于没有机会和他在旅途中一见。现在他从抗战的陪都，经过香港，而到了这长年是夏的南国，我们很庆幸旧友的无恙，同时又欣幸着南荒的热带上，重增了一位执笔的战士。”既然王任叔说杨骚比他“早大半年到新加坡”，则杨骚无疑在1941年初南来。郁达夫“诗人杨骚的南来”写于1941年5月20日，则杨骚当在5月之前抵达新加坡。
- 53、据施香沅先生追述：“……杨骚是一位诗人，南来后和我住在一起，倒很少看过他写诗。……”又，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409。
- 54、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页48。又，陈育崧主编《陈嘉庚》，页77—87。
- 55、巴人《遵命集》，页131“记杨骚”一文。
- 56、同上，页131。
- 57、1941年9月5日《南洋商报》“狮声”。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页351—353。

- 58、据施香沅先生追忆。
- 59、同上。
- 60、同上。
- 61、巴人《遵命集》页131。
- 62、同上，页131。杨骚性格颇浪漫，在日本结识白薇，但后来离异，又另外爱别的女人。谢冰莹《作家印象记》，页120。
- 63、同上，页132。杨骚并不与郁达夫等同船逃跑。
- 64、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页451。据巴人所述，杨骚直到1952年才搬家回国，后患脑血管栓塞症，缠绵数年而后逝世。巴人《遵命集》，页134。
- 65、“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Vol 2，(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0), p. 678。
- 66、黄俊东“提倡‘鲁迅风’的王任叔”，《现代中国作家剪影》，页209。
- 67、同上。王任叔是属于新文学第一期的作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集“小说一集”里就可以找到他的短篇小说“疲惫者”。
- 68、余拯“王任叔”，载杨一鸣编《文坛史料》，页191。
- 69、同注66。
- 70、林曼叔、程海、海枫合编《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25。王任叔是提倡“鲁迅风”的，后来与孔另境、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风子、柯灵合著了一部七人杂文集《横眉集》。
- 7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页32。
- 72、同注66，页209—210。
- 73、抗战期间，王任叔曾以巴人为笔名，出版一部论文集《扪虱谈》。黄俊东《现代中国作家剪影》，页210。此外，著有《文学读本》、《文艺短论》等书。至于小说，出版有《疲惫者》、《破产》、《监狱》、《吸血鬼》、《殉》、《没落中》、《二代的爱》等。林曼叔等编《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25。
- 74、关于王任叔南来的日期，有关资料颇有出入，林曼叔、程海、海枫合编的《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25说王任叔于“1938年前后赴南洋，出任陈嘉庚所办的新加坡南侨师范学校校长”；香港Union Research Institute编的《中共人物志》“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页679说“……went to Singapore and became principal, Nanchiao (南侨) Normal School, 1940; ……”。其实，1938年与1940年这两个说法都不正确！截至1941年上半年，王任叔还是在上海的。在去国之前，他把一批杂文和文学评论集在一块，出版了一本《窄门集》，在“后

记”(署上的日期是1941年3月19日)里说“……现在收回校样,想作临别上海的一个纪念,希望有家书店会印出它。……”印书总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不可能马上离开上海。在1941年5月的《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开始刊出王任叔的一系列“文艺讲话”(给文艺青年的信),当时编者(王纪元)在文章前的小介绍还说是特约王任叔写稿,又称“海外文艺界”,可见王任叔仍未抵达新加坡。1941年6月9日及10日《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刊出巴人(王任叔)的“侨居杂记”,说明作者还“侨居”在香港;文中记述他的所见所闻,并未提到新加坡,可见1941年6月的时候他还未抵新加坡。善乘仁、苏雪林、赵燕声合编的《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页100则说“In August, 1941, he arrived Singapore, where he became a teacher in Nan Chiao Normal School 南侨师范学校,……。”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下册,页333所述,南侨师范于1941年8月开课,而王任叔又是南来执教。则“1941年8月”一说当最为接近事实。巴人在“记杨骚”一文,《遵命集》,页131,则说:“1941年3月,我自上海‘疏散’到香港;7月又从香港‘疏散’到新加坡……”,可见巴人实际上是7月到新加坡的。

- 75、南侨师范即是今天新加坡南侨女子中学的前身。南侨女子中学是战后建立的,沿用旧址,在金炎律。赵承榜“南侨二十三年”,《南侨女子中学创校二十三周年暨新校舍落成纪念特刊(1970年11月)》。南侨师范是陈嘉庚发起兴办的。1941年7月,陈嘉庚以南侨筹赈总会主席的身份视察祖国归来,鉴于全国教育人才因受战时影响,迁居改业,已成普遍现象,兼以抗战以后,各省推行义务教育,现有教育,犹感不足,闽粤二省缺乏尤甚。南洋师资恐慌,问题严重,他于是建议在新加坡先行创设华侨师范学校。其实,起初陈嘉庚是电重庆教长陈立夫,请在闽粤两省各设一华侨师范,后陈氏复电认为先办一校,但不必设于闽粤。陈嘉庚认为当局缺乏诚意,难收实效。那是1941年初的事。既然在闽粤开办师范不成,只好在新加坡倡办了。结果筹了三十六万元的开办费,破南洋华校开办费的记录,第一期预招十班,学生四百名,并定1941年7月中开学。不料在招生考试中,中国教育部令该校改办成中学或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将由教育部统筹统办,但令命无效,南侨师范终于在八月中开课。延至双十节举行开幕礼,聘北京师范大学出身的庄奎章任校长,教员十余人,学生二百余人。可惜开学不及半年,日本南侵,战势紧急,1942年1月便停课。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页57。又,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下册,页305,307—308,333—334。香港 Union Resea—

rch Institute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页 679 说王任叔任南侨师范的“校长”(Principal), 不实, 因为当时校长是庄奎章。《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说王任叔在南侨师范教书(became a teacher)倒是翔实的。

- 76、《南洋商报》“狮声”副刊, 1941年5月17日。
- 77、《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1版, 1941年7月6日。
- 78、同上。
- 79、《南洋商报》“狮声”副刊, 1941年8月26日。
- 80、同上。
- 81、《南洋商报》“狮声”副刊, 1941年9月5日。
- 82、《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1939年5月5日。
- 83、《南洋商报》“狮声”副刊, 1941年8月16日。
- 84、同上。王任叔在1939年9月5日来新加坡之前写的一篇杂文“风头杂记”里说:“然而今天中国不要‘抗战八股’的, 却正是不需要民众抬头做人的一类货色。……这人类的良心, 这国家的法律, 我们是要用力去争取的。争取的唯一的, 还是要用这‘抗战八股’, 去唤起民众……”《窄门集》, 页140。可见1939年时, 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抗战八股”的。这与郁达夫的看法十分接近。
- 85、《南洋商报》“狮声”副刊, 1941年9月20日。
- 86、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印《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 页56。有关活动参见本文郁达夫及胡愈之部份所述。
- 87、巴人“记杨骚”《遵命集》, 页133。
- 88、林曼叔、程海、海枫《中国当代作家小传》, 页25。该小说只见书目, 原作此地找不到。
- 89、巴人等著《无言抄》(新加坡新时代文艺出版社, 1946年), 页1—4。
- 90、同注88。
- 91、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70。
- 92、杨一鸣, 《文坛史料》, 页250。
- 93、《南洋商报》1941年8月23日第六版“本埠新闻”。
- 94、中共人名录编修委员会编修《中共人名录》, 页198。
- 95、杨一鸣《文坛史料》, 页250。
- 96、杜君谋《作家赋事》页95—96, 见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 《南北极》月刊第52期页50, 1974年9月16日版, 转引。
- 97、杨一鸣《文坛史料》, 页250。

- 98、同上。又，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南北极》月刊第52期，页50。
- 99、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页300，“马华文艺及综合性杂志出版简目”。
- 100、同上，页355。
- 101、《南侨日报》1948年3月8日第一版。
- 102、林曼叔、程海、海枫《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122。又，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页354。
- 103、陈残云来新的确实年月，不象郁达夫、胡愈之等的可以稽考，兹据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357所述：“……无奈不久珍珠港事变爆发，敌人的炮火蔓延到马来亚的土地上来了。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除了陈残云的诗歌和文之流的小说‘一九四一年春’三数篇作品曾获得一定评价外，似乎也就没有再产生过更可观的反侵略文艺作品了。……”可见珍珠港事变后陈残云还有诗歌发表，那么，他应当是在这个期间前来不久到新加坡，因此我推定为1941年下半年。至于确定的年月，有待进一步查核。笔者曾就教于方修先生、李汝琳先生、王秋田先生等，俱无法追忆，所以存疑。
- 104、据李汝琳先生述，但李先生亦不敢肯定是不是在吉隆坡。
- 105、以多（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页8。在述及新加坡沦陷前的新马文艺时，赵戎说：“……至于巴人的什文，陈残云的新诗更不在话下。……”
- 106、《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122。
- 107、同上。
- 108、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页610有该篇的目录。《风下周刊》，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份定期杂志，材料丰富，后为英政府禁刊，以致今天亦难觅见。
- 109、《风下周刊》第127期，1948年5月22日出版。
- 110、该书由香港文艺生活社出版。见《文艺生活》海外版第一期（总第37期），香港，1948年2月，页9：“文生社出版经售新书目录”。
- 111、《中国当代作家小传》，页122。
- 112、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44。
- 113、据李汝琳先生忆述。
- 114、金丁“发展南洋文化的诸问题”，《南洋周刊》第五期，1938年8月1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页493。
- 115、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页497。
- 116、已经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页25—45。
- 117、《南洋商报》“狮声”副刊，1941年9月9日。

- 118、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编《大战与南侨》，页56。
- 119、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页4。
- 120、参照本论文第七章第二节“夏衍及其他”注46。
- 121、黄蒙田《我的丈夫司徒乔》新版后记，冯伊湄《我的丈夫司徒乔》，页276。
- 122、冯伊湄《我的丈夫司徒乔》，页92。
- 123、同上，页95—111。
- 124、陆浮编《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页51。
- 125、同上。
- 126、郁达夫写了“再见王莹”（1939·10·2）及“看王女士等的演剧”（1940·3·10）等文章。
- 127、参看本章“金山”一节。郁达夫“再见王莹”一文说：“……王莹女士，也许会在这一两天内到星加坡来。昨晚自马六甲回来，……又听一位同事说，王莹女士来了，就住在南天的二楼。”郁达夫该文写于1939年10月2日，可见王莹是在那段期间抵新。

第七章 1945年至1948年南来的中国作家

- 1、杜运燮的籍贯是据李汝琳先生追述。李先生战后曾与杜运燮同校教书。杜氏生年据尹肇池等编《中国新诗选》所载，香港大地社，1975年6月，页295。
- 2、许芥昱 Hsu kai-yu《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43。
- 3、据李汝琳先生追述。
- 4、尹雪曼总编纂，中华民国文艺史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文艺史》，页214。又，林以亮认为杜运燮是二次大战期间出现的一批新诗人中最突出的几个之中的一个。《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书店，1976），页13。
- 5、《热带风光》共收散文十五篇，由香港学文书店印行，1953年5月再版。书前有张明的序，署上的日期是1951年4月3日，相信该书初版当在1951年，是作者离开新加坡后出版的。目前初版已经找不到。
- 6、张明《热带风光》序，《热带风光》序页1—2。
- 7、林徐典博士主编的中学适用的《华文》第五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年）第25篇即选吴进的“热带三友”，誉为“一篇情调优美

的小品文”。

- 8、据新加坡华侨中学图书馆主任丁先生追忆。“虎豹楼”今已不存。
- 9、吴进《热带三友》，页1。
- 10、同上，页2。
- 11、同上，页2—3。
- 12、同上，页3—4。
- 13、同上，页4。
- 14、同上，页5。
- 15、《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散文一集”，页37—41。参照本论文第三章第五节注97—99。
- 16、同注2，页243—244。
- 17、王志健《现代中国诗史》（台湾商务印书版，1975年），页272—275。
- 18、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页38，转录怀奇阿“略谈‘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提及夏衍于一九四八年在本地作短期的逗留，其实不确，应该是1947年才对。据夏衍“笔耕二十年——‘劫余随笔’自序”，《风下周刊》第113期，1948年2月14日版，页10，夏衍在该文说：“……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星加坡，下半年在香港，写下来手边可以搜集得起来的就是这集子里的几篇……”可见他是1947年来新加坡的。
- 19、“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Vol IV、(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Revised Edition), 页110。
- 20、曹聚仁《采访外记》，页83。又，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页277。《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办时，原是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刊，由郭沫若主持，四开一张。后来郭沫若转向武汉，《救亡日报》移到广州。广州时期的《救亡日报》由汪馥泉主持，杂乱无章。直到《救亡日报》移到桂林，才由夏衍主持。
- 21、《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页78。
- 22、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页36—39。论争经过，参见下章第二节“几场论争”。
- 23、已录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页214—215。
- 24、同上书，页266—267。
- 25、夏衍在“马华文艺试论”开头即说：“今年一月下旬，当在星洲的朋友把几篇有关马华文艺论争的文章剪寄给我的时候，当时‘文生’的编者先生就曾怂恿我写一点关于这问题的意见……。”夏衍提到的“文生”，即《文艺生活》的简称，编者为司马文森。

- 26、夏衍“马华文艺试论”第一段。原载《南侨日报》1948年4月13日“南风”副刊，已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页274。
- 27、《南侨日报》1948年4月13日“南风”副刊。
- 28、同上。
- 29、《南侨日报》1948年4月14日“南风”副刊。
- 30、据王秋田先生追忆。
- 31、关于岳野南来的准确日期已不可考，兹根据1947年10月3日《南侨日报》第五版新闻，谓中国歌舞剧艺社昨晚（指2日）开始在大世界大西洋戏院演出三幕悲喜剧《重庆廿四小时》，推定岳野等在九月底抵新。
- 32、据王秋田先生追述。
- 33、参阅丁波《风雨牛车水》序。原书已找不到，只找到新加坡艺术剧场排演时的油印本，1955。
- 34、赵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七集“剧本”导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页4。
- 35、据方修先生述。
- 36、赵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集导论转述，页4。
- 37、岳野《风雨三条石》“遁词”，（作于1948年11月28日）新加坡上海书局，1948。
- 38、《南侨日报》1947年10月19日“中艺剧讯”，报导10月9日至12日中国歌舞剧艺社在快乐世界体育馆演出的消息。
- 39、同上。
- 40、《南侨日报》1948年1月4日第五版“中艺近讯”。
- 41、《南侨晚报》1947年10月4日第三版新闻。
- 42、《南侨日报》1947年9月23日第五版新闻。
- 43、据方修先生及李汝琳先生推测。
- 44、吴天才编《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页213。
- 45、据李汝琳先生述。
- 46、据李汝琳先生追忆推测。
- 47、金丁《三星旗下》由新南洋出版社出版，1946年。
- 48、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页410。
- 49、同上。
- 50、吴天才编《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页1。这首长诗由青年文艺研究社出版。诗的内容包括：序诗：我们的歌唱；第一部：历史的里程碑；第二部：血！泪！第三部：半岛上的景色；尾声：怒吼吧！新加坡。
- 51、收入韩萌编《南洋散文集》（香港求实出版社，1951年），页90—91。
- 52、吴天才编《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页11。

第八章 中国作家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

- 1、郁达夫“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答柯灵先生”，《星洲日报》“晨星”副刊，1939年2月28日。收入方修、张笏合编《郁达夫选集》，页48—50。
- 2、同上。
- 3、同上。
- 4、同上。
- 5、同上。
- 6、郁达夫“看稿的结果”，《文艺两周刊》，1939年2月26日，收入方修、张笏合编《郁达夫选集》，页51—52。
- 7、同上。郁达夫为了鼓舞马华文坛，不断刊登中国作家的作品。参见本论文页41。
- 8、见第五章第一节注19。
- 9、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本来应该是指1930年至1939年之间的文艺，但是中国大陆并不这么地计算，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概括性”的年代。换言之，上溯至1927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胚胎的初期，下展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文艺讲话”的前夕。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页1。
- 10、苗秀“记郁达夫”，《文学与生活》，页53—54。
- 11、温梓川“马华文坛廿五年”，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页29。
- 12、同注1。
- 13、原文“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收入Stallknecht and Frenz。《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Carbondale, 1971)，PP·84—97。此据王润华先生中译“文学影响与比较文学研究”，见《蕉风》282期（1976年8月），页12—21。
- 14、李采芹“郁达夫访问记”，《南洋商报》1938年12月2日第十八版“中外要闻”。
- 15、温梓川“郁达夫三宿檳城”，《文人的另一面》，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页143。温梓川（1911——）现在是马华作家。1929年，他曾经与郁达夫在诗人汪静之的家晤面（当时温梓川在中国读书），恰逢汪静之刚刚出版诗集《寂寞的国》。温梓川因为背抄了两首自己

作的描写南洋风光的竹枝词给达夫听，引起达夫对南洋的兴趣。达夫表示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由于达夫与温梓川有此交谊，所以南来后，与温氏碰面，也就讨论起文学问题了。见温梓川《郁达夫南游记》代序，页3。

- 16、《新国民日报》1939年1月30日“新国民文学”副刊。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页460、463。
- 17、该文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页470—471。
- 18、参见本论文页38。
- 19、参见本论文页41。
- 20、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43。
- 21、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94及97。
- 22、“夫归”刊于1931年7月25日《光华日报》“戏剧”版，“凄凄惨惨”刊于1931年8月3日《光华日报》“戏剧”版，“女招待的悲哀”刊于1931年8月24日《光华日报》“戏剧”版。三篇俱已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戏剧集，页84—112。
- 23、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90—91。
- 24、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90。
- 25、郑文通在南来新加坡前，在中国福建当小学教师，搞古典诗词，他的从事新文学创作，还是来新加坡后才开始的。他算是在当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马华作家之一。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149。
- 26、据方修先生述。
- 27、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一辑，页329—337。
- 28、参照本论文第三章第四节“吴天”注73—75。
- 29、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二辑，页158。
- 30、同上，页161。
- 31、同上，页165—190。这些文章包括：

文翔：“为‘南洋地方性剧本’与田先生讨论”（《星洲日报》“晨星”，1937·12·18）

田：“论作品的地方性及其他——兼答文翔先生”（《星洲日报》“晨星”，1937·12·21）

泰铎：“理论的研究与批评的态度”（《星洲日报》“晨星”，1937·12·24）

文翔：“关于‘南洋地方性剧本’——再与田先生讨论”（《星洲日报》“晨星”，1937·12·28）

田：“再论地方性作品及其他——最后的阐明”（《星洲日报》“晨星”，1937·12·30）
- 32、当时文艺界提出“独特性”的口号，强调“写此时此地”，固然是为

了显示马华文艺和中国文艺的区别，同时也是为了澄清当地文艺活动的主流。方修“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避席集》（新加坡文艺出版社，1960），页15。

- 33、苗秀《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集导言，页12。
- 34、秋枫、漂青、凌佐的文章俱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页197—204。
- 35、该篇纪录，已收入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集，页88—94。
- 36、《战友报》今已荡然无存，周容文章没法找到。兹据苗秀《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导言转述，页13。
- 37、据苗秀《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导言，页3。
- 38、已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页208—211。
- 39、同上，页229—233。
- 40、主要文章包括：

李玄：“论‘侨民文艺’”（《南侨日报》“南风”1948·1·8）

金丁：“开窗子，透空气——与周容先生略谈‘马华文艺’”（《风下周刊》113期，1948·2·14）

李玄：“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南侨日报》“南风”1948·2·14）

克刚：“我对于‘侨民文艺’的见解”（《现代周刊》91期，1948·2·15）

丝丝：“马华文艺之路——谈‘独特性’诸问题”（《现代周刊》94期，1948年3月）

丝丝：“关于马华文艺的论争”（《现代周刊》94期，1948年3月）

- 41、《文艺生活》第37期（海外版第1期），香港文艺生活社，1948年2月，页1。
- 42、铁亢1939年至1940年间的遗作，由友人辑为《马华文艺丛谈》，新加坡维明公司，1956。内中有“马华文艺是什么”、“马华文艺在现阶段”、“马华文艺的地方性”等见解精辟的论文。
- 43、方修“谈战后马华小说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新加坡艺术剧场文艺晚会特刊》，1976年5月），页7—8。
- 44、有关文章主要包括：

西樵（即赵戎）：“略论侨民文艺”（《星洲日报》“晨星”，1948·1·15）

海郎：“是‘侨民文艺’呢，还是‘马华文艺’？”（《民声报》“新风”，1948·2·4）

光明：“我对马华文艺论争的意见”（《民声报》“新风”，1948·2·6）

西樵：“问题的开脱”（《星洲日报》“晨星”，1948·2·8）

闻人俊（即苗秀）：“论‘侨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星洲日报》“晨星”，1948·2·25）

- 45、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页250—256。
- 46、收入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页95—106。
- 47、郭沫若的文章载1948年3月16日的《南侨日报》，夏衍的文章载1948年4月13日及14日的《南侨日报》。参照本文第七章第二节“夏衍及其他”注22—29。
- 48、观止《文艺杂论》（新加坡星洲书屋，1964），页1。
- 49、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页525。
- 50、方修编《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页111。该文发表于1939年9月1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 51、参照本论文第四章郁达夫的专章。
- 52、《南洋商报》1941年3月8日社论。
- 53、参照本论文第六章“王纪元”一节。
- 54、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页19。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作家不再温驯从容，而变得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早在1932年2月7日，处在上海的文人和作家，已经痛感“一二八”事变而发起“著作者抗日联合会”，发表一篇“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胡愈之、郁达夫、杨骚等即在上面签字。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页80—82。
- 55、王赓武教授把东南亚华人分为三个集团：甲集团——他们主要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乙集团——他们主要关心社区政治；丙集团——他们已进入了非华人的权力政治金字塔（不管是由土著、殖民地宗主国或民族主义者掌权）。“政治华人对现代东南亚的作用”，《泛论东南亚》，新加坡向日葵出版社，1977，页85。南渡的中国作家应该是属于甲集团。

第九章 中国作家对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

- 1、J.T.Shaw, “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 2、王任叔“还需沉着——纪念七七四周年”，《南洋商报星期刊》1941年7月6日第11版。
- 3、《南洋商报》1941年5月22日社论“论海外宣传工作”。
- 4、胡愈之“三论保卫南洋——保卫南洋与保卫中国”，《南洋商报》1941年2月17日社论。
- 5、郁达夫“今天是‘九一八’”，1940年9月18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又，方修编《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页254。
- 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册，页47—68。
- 7、杨进发“左翼领导层与战前星华社会”，《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页74。
- 8、《南洋商报》1941年6月24日社论。
- 9、同上。
- 10、郁树锟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39），页165。
- 11、《生活报》（临时半周刊）第14期社论“多多回国考察”，耶加达，1945年12月8日。
- 12、《南洋商报》1941年6月13日社论“我们应当做什么”。
- 13、李金泉“战前反日情况忆旧”，《南洋商报》“商余”版，1974年8月24日。
- 14、据王秋田先生忆述。
- 15、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编《大战与南侨》，页56。
- 16、《大战与南侨》，页57。
- 17、提亨格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初版，1972年三版），页168。
- 18、同上，页150。
- 19、鲁迅致刘炜明信（1934年11月）：“……星洲也非言论自由之地，大约报上的消息，是不会确于上海的，……”《鲁迅书信集》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页671。
- 20、巴人“水客和工头——‘风下之国’散记马来亚之什”：“……却说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重庆政府密令香港领事馆，不发文化人出国护照。而小可也在文化人之列，自然不好去新加坡了。再说，不知何年何月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限制华侨新客入境……”《风下周刊》第122期，1948年4月17日，页10。尽管南渡困难重重，结果巴人（王任叔）还是巧妙地来到新加坡。
- 21、统战，为“统一战线”之简称，又名“联合阵线”。其主要涵义，是根据矛盾统一法则，亦即依靠群众，利用矛盾，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笼络明天的敌人，打击今天的敌人，借以孤立敌人的一种联多打少，以敌制敌的斗争策略。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页29。

- 22、《南洋商报》1941年5月22日社论“论海外宣传工作”。
- 23、王任叔“还需沉着——纪念七七四周年”，《南洋商报》星期刊，1941年7月6日第11版。
- 24、同上。
- 25、同上。
- 26、《南洋商报》1941年6月13日社论“我们应当做什么”。
- 27、《南洋商报》1941年9月20日社论“南洋华侨团结问题”。在其他社论与单篇论文中，胡愈之也再三呼吁华侨团结。在“反省与呼吁”这篇专文里，他说：

我们要团结一致，团结重于一切！

我们要为公众服务，要成为民众的喉舌，我们不能变成任何私人任何党派帮派的留声机或应声虫！

我们不能出卖良心，不能出卖人格。出卖人格就是出卖我们的国格！

我们要永远站在国家民族立场！

我们反对一切华侨社会的内部分裂与摩擦！

.....

- 《南洋商报》星期刊“新南洋”副刊第22期，1941年8月31日。
- 28、冯爱群《华侨报业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页65—73。
- 29、Han Suyin. “Forward” of《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ed. by Ly Sing-ko, (Hong Kong: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Written in 1966, 1st published 1967, Reprinted 1975), p.8, 10—11.
- 30、参见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南侨印刷社，1949）。
- 31、《南侨日报》创刊词，1946年11月21日。
- 32、同上。
- 33、同上。
- 34、《南侨晚报》1947年9月27日第3版。
- 35、《南侨日报》1948年1月12日。
- 36、《生活报》（临时半周刊）社论“多多回国考察”，耶加达，1945年12月8日。
- 37、胡愈之“致谢一切爱护本报人士——本报周年纪念招待会演词”，《南侨日报》编《新中国与南侨》，页65。
- 38、见本论文页3。
- 39、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页121—132。

- 40、B. Malinowski 著，费通等译《文化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1967台一版），页85。
- 41、一个知识份子运用思想的样式，常常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受了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然而，我们同时也得承认如果各个人能够努力超脱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为本国家本阶级的环境所囿，则亦可以排除了定命论的束缚，而求得思想上的解放。因为“社会影响思想”，而思想亦可以反过来影响社会的。B. Malinowski《文化论》，页95。
- 42、夏志清《文学的前途》（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初版，1976年三版），页32。
- 43、同上。
- 44、华夫“从姚雪垠的新著说起来”，《新观察》月刊第2期（香港，1977年9月），页42。



参考书目

一、中文部分

1. 一梦：“易君左与郁达夫”，《星洲日报》“星云”副刊，1975年8月20日。
2.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3. 马汉茂 Helmut Martin 辑：“给郁达夫的信”，《明报》月刊，香港，1973年4月，页63—68。
4. 于行：“谈起郁达夫”，《星洲日报》“青年知识”副刊，1972年2月7日。
5. 上海周报社编：《当代史贖》，上海上海周报社，1933年。
6. 匀庐：《匀庐琐忆》，香港南天书业，1973年。
7. 中共人名录编修委员会：《中共人名录》，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67年。
8.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编：《五四谈文艺》（文协十周年暨文艺节纪念特刊），1948年5月4日。
9. 巴人：《窄门集》，香港海燕书店，1941年。
10. 一一：《遵命集》，北京出版社，1957年。
11. 一一：《无言抄》，新加坡新时代文艺出版社，1946年。
12. 尹雪曼等编：《中华民国文艺史》，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
13. 尹肇池等编：《中国新诗选（从五四运动到抗战胜利）》，香港大地社，1975年。
14. 方青：《现代文坛百象》，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53年。
15.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上卷，1975年10月，下卷1976年12月。
16. 一一：《马华新文学简史》，新加坡万里书局，1974年。
17. 一一：《马华新文学大系》（一至十册），新加坡世界书局，1970—1972年。
18. 一一：《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70年。
19. 一一：《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74年。
20. 一一：“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避席集》，新加坡文艺出版社，1960年，页14—20。

21. ——: 《马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加坡洪炉文化企业,1976年。
22. ——: “马华戏剧文学的发展(1919——1941)”,新加坡艺术剧场《十五年》纪念特刊史料部份,1970年。
23. ——: “谈战后马华小说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新加坡艺术剧场文艺晚会特刊,1976年5月,页5—13。
24. ——: “郁达夫与王映霞”,《沉沦集》,新加坡洪炉文化企业,1975年,页63—80。
25. ——: 《马华文坛往事》,新加坡星云出版社,1958年。
26. ——: 《马华文艺史料》,新加坡四海书局,1962年。
27. ——: “马华新文学的发展与分期”,《南洋学报》第16卷第1、2辑合刊,新加坡,1960年,页18—20。
28. ——: 《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7年。
29. ——、张笏合编:《郁达夫选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77年。
30. ——:《轻尘集》,香港中流出版社,1974年。
31. ——(观止):《文艺杂论》,新加坡星洲书屋,1964年。
32. 王平陵:《卅年文坛沧桑录》,台北联合书店,1966年。
33. 王芸生等:《劫后的上海》,上海战时出版社,出版日期未详。
34. 王志健:《现代中国诗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
35. 王润华:“郁达夫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民报》,1977年6月22日至24日。
36. ——:“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新加坡《民报》1976年12月14日至18日。载入《郁达夫游记》附录,台湾慧龙出版社,1977年,页213—245。
37. ——译,Joseph T. Shaw原撰:“文学影响与比较文学研究”(“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Newton P.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84—97)
38. ——译, Henry H.H. Kemak 原撰:“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功能”(“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Newton P.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57)

39. ——: “从四种立场四种观点看文学作品”,《新加坡文艺》第3期,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年7月,页4—5。
40.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香港远东图书公司重版,1967年)
41. 王赓武讲,崔贵强整理:“华人、华侨与东南亚”,《星洲日报》“文化”版,1976年5月12日。
42. 王赓武著,张奕善译注:《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66年。
4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
44. 丘帆:“郁达夫在南洋的二三事”《作品》第9期,北京,1957年,页69—70。
45. 冯式:《中国文学家辞典》,香港东亚书局,出版日期未详。
46. 冯伊湄:《我的丈夫司徒乔》,香港上海书局,1977年。
47. 冯爱群:《华侨报业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
48. 古鸿廷,张震东:“论‘南洋华人民族主义运动之研究’”,《南洋学报》第29卷第1、2期,1974年,页1—10。
49. 左舜生:《万竹楼随笔》,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年。
50. 艾芜:《南行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51. ——:《我的青年时代》,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
52. ——:《艾芜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53. ——:《艾芜选集》,香港文学出版社,1957年。
54.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
55. ——:“战时战后文坛大事记1937——1949”,《南北极》第82及83期,1977年3月,4日,页93—96,页69—71。
56. ——:“战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新观察》创刊号,香港,1977年8月1日,页43—44。
57. 田汉、金山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
58. 许牙:“老舍——文坛人物记”,新加坡《南侨日报》,1946年11月30日。
59. 许云樵:“星马之南洋研究与华学关系”《中马中星文化论集》,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
60. ——:“五十年来的星马华文报业史”,《南洋文摘》总第86期,新加坡,1967年2月,页113—116。
61. ——:“纪念郁达夫先生”,《南洋学报》第7期,新加坡,1947年3月,页70—71。
62. 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年。

63. ——: “新加坡中英报业史话”, 许云樵主编《东南亚研究》第七卷,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1971年12月, 页79—84。
64. ——: 《南洋学会与南洋研究》, 新加坡南洋学会, 1977年。
65. 刘心皇: 《郁达夫与王映霞》, 台北畅流出版社, 1962年。
66. ——编: 《郁达夫诗词汇编》, 台北学术出版社, 1970年。
67. 刘咏娴: “郁达夫与王映霞”, 《中外杂志》第6卷第2期, 台北, 1969年8月, 页46—48。
68. 刘前度译, Victor Purcell 著: 《马来亚华侨史》, 檳城光华日报社, 1950年。原著见页197注276项。
69. 刘绶松: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年。
70. 刘霭如: “郁达夫在星洲”《蕉风》半月刊, 吉隆坡, 1957年8月10日, 页5。
71. 关楚璞等: 《星洲十年》, 新加坡星洲日报社, 1940年。
72. 吉田幸夫: “艾芜伝”, 《目加田诚博士还历纪念中国学论集》, 大安株式会社, 1964年。
73. 孙百刚: 《郁达夫与王映霞》, 香港宏业书局, 1962年。
74. 华夫: “奋斗出来的作家: 艾芜”, 《华报》“作家简介”栏, 新加坡天马图书, 1968年1月14日。
75. 华鹿钜: “艾芜的读书故事”, 新加坡《南侨日报》, 1948年6月21日。
76. 朱绪: “星华话剧运动四十五年”, 新加坡艺术剧场《十五年》纪念特刊史料部份, 1970年。
77. 米军: “米军诗选”, 《创作与文摘》第一辑, 新加坡创作与文稿编辑部, 1970年。
78. 老舍: 《小坡的生日》, 上海生活书店, 1934年。晨光出版社重印本。
79. ——: 《老牛破车》, 原版上海出版, 1937年。香港光华书局再版, 1959年。
80. ——: 《老舍选集》, 香港文学出版社, 1966。
81. ——: “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文学时代》创刊号,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1935年, 页8—18。
82. 余惠: 《现代中国作家选论》, 香港海洋文艺社, 1976年。
83. 陆丹林编: 《郁达夫诗词钞》, 香港上海书局, 1962年。
84. 陆浮编: 《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商报社, 1940年。
85. 陈山: “日军侵占马来亚史略”, 《史地》, 新加坡南洋大学史地学会, 1961年10月, 页54—59。

86. 陈中行：《中国人到东南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年。
87. 陈立：“论今天的马华新文化运动”，《南洋商报星期刊》，1940年10月6日。
88. 陈序经：《南洋与中国》，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
89. 陈育崧等：《陈嘉庚》，新加坡厦门大学同学陈嘉庚研究丛书，1969年。
90. 陈雪风：“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新加坡南大创作社，1962年，页1—38。
9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下），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
92. ——：《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南侨印刷社，1949年。
93. ——：《新中国观感集》，新加坡南侨印刷社，1950年。
94. 邱奕松：“郁达夫”（民国人物小传之三十八），《传记文学》，第173期，台北，1976年10月，页123—124。
95. 连士升：“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南洋学报》第15卷第2辑，1959年12月，页47—48。
96. ——：“悼念郁达夫”，《南行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63年，页12—17。
97. ——：“当地文艺的特性”，《闲人杂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63年，页169—170。
98. 苏雪林：《文坛话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99. 吴天才：《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附作者索引）》，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年。
100. 吴体仁：“民国三十年来的马华文化”，《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41年1月1日。
101. 吴琼玉：《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比较文学”研究报告（22页），手抄本，1975年。
102. 张礼千：“华侨与文化”，《星洲日报》，1939年1月1日。
103. 张秀亚：苏雪林、林海音：《近代中国作家与作品》第一集，台北纯文学月刊社，1967年初版，1969年再版。
104. 张奕善译，Victor Purcell著：《近代马来亚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原著见页197注277项。
105. 张笳：“郁达夫遇害事件补言”，《星洲日报》“文化”版，1976年1月7日。
106. 张楚琨：“亡友高云览和他的遗著《小城春秋》、《小城春秋》附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317—325。

107. 杜运燮：《诗四十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初版，1948年再版。
108. ——（吴进）：《热带风光》，香港学文书店，1953年。
109. 杜南发译，刘若愚撰：“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趋势”（“The Study of Chines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5, No.1, Nov 1975, pp.21—30），《新加坡文艺》第7期，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7年7月，页48—55。
110. 杨一鸣（之华）：《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大连书店翻印本，1941年。
111. 杨子：“亚洲人的血泪”，《联合报》“联合”副刊，台北，1976年4月26日。
112. 杨进发：《战前星华社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
113. 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助委员会，1972年。
114. 李立明：“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南北极》月刊第52期，香港，1974年9月16日，页49—52。
115. ——：《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10月。
116. 李守孔：《中国现代史》，台北光华出版社，1958年。
117. 李冰人，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新加坡南洋热带出版社，1959年。
118. ——：《郁达夫集外集》，新加坡南洋热带出版社，1958年。
119. 李汝琳：“南洋文学研究刍议”，《南洋学报》第25卷第一期，新加坡，1970年7月，页51—53。
120. 李向：“郁达夫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生活”版，1975年1月23日至2月15日。
121.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
122.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1973年。
123. 李采芹：“郁达夫访问记”，《南洋商报》中外要闻版，1938年12月2日。
124. 李金泉：“战前华文报人生活”，《星洲日报》“星云”版，1975年5月30日。
125. ——：“郁达夫在星数事”，《星洲日报》“星云”版，1974年7月22日。
126. ——：“由星洲日报乔迁谈到报人工作情况的今昔”，《星洲日报》

- “星云”版，1976年1月19日及20日。
127. ——：“战前筹赈热况点滴”，《南洋商报》“商余”版，1974年11月7日。
 128. ——：“战前反日情况忆旧”，《南洋商报》“商余”版，1974年8月24日。
 129. 李建：《中国新文学讲话》，新加坡：马来西亚出版服务社，1968年。
 130. 李锐华：《马来亚华侨》，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54年。
 131.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东亚书局，1970年。
 132. ——：《三言两语》，香港文学研究社，1975年。
 133. 周树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外文学》第50期，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1976年7月1日，页4—11。
 134. 周锦：《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年。
 135. 郑子瑜：“忆曼士先生并提到南洋学会的一些旧事”，《星洲日报》“星云”版，1976年5月19日。
 136. ——编：《郁达夫诗词集》，香港世界书局，1955年。
 137. ——：《郑子瑜选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年。
 138. ——：《青鸟集》，香港编译社，1968年。
 139. 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1881—1972》，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73年。
 140. 郑卓群（铁亢）：《马华文艺丛谈》，新加坡维明公司，1956年。
 141. 郑学稼：《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香港亚洲出版社，1953年。
 142. 郑振铎：“忆愈之”，《蛰居散记》附录，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页125—130。
 143.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
 144. ——：《文学与生活》，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1967年。
 145. ——：“五十年来马华文学一瞥”，新加坡《民报》“新生代”副刊第147期，1969年8月22日。
 146. ——：“马华现代小说发展史初稿”，《南洋学报》第19卷第一、二合辑。新加坡，1965年，页1—22。
 147. 林以亮：《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
 148. 林芳声：“抗战中的马来亚华侨”，《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38年1月1日。
 149. 林英强：《郁达夫先生及其作品》，马来西亚居銮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
 150. 林莽：《中国新文学廿年》，香港世界出版社，1957年。

151. 林绿：“关于郁达夫”，《郁达夫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1977年。
152. 林曼叔、程海、海枫合编《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6年。
153. 林臻：“翡翠带上行”（“与郁达夫老友一夕谈”一节），《星洲日报》“文化”版，1977年6月2日。
154. 季之华：“马华救亡运动之检讨与展望”，《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38年1月1日。
155. 季林：《作家的生活》，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期未详。
156. 青：“日本侵略军在荷属印尼的巴东”，《南北极》第84期，香港，1977年5月，页74—76。
157. 金山：《一个角色的创造》，香港戏剧出版社，出版日期未详。
158. 金紫阁：《郁达夫的爱情生活》，香港蓝天书屋，1962年。
159. 南侨日报编：《新中国与南侨》，新加坡南侨报社，1950年。
160. 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新加坡狮岛书报社，1964年。
161. 南洋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1905——1966》，新加坡，1968年。
162.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编：《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
163.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68年。
164. ——：《奇零集》，香港实用书局，1966年。
165. ——：《郁达夫选集》，香港文学出版社，1957年。
166. ——、王映霞：《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香港宏业书局，1963年。
167. 郁树锟等：《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39年。
168. 洪灵菲：《洪灵菲选集》，北京开明书店，1952年。
169. 洪炜堂：“郁达夫与王映霞”，《南洋商报》商余版，1975年6月18日。
170. 洪锦棠：《劫后回忆录》，新加坡：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
171. 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2》，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172. 闻辛：“郁达夫的眼泪”，《新社文艺》第16期，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年12月，页3—4。
173. 姚乃麟：《现代作家论》，上海万象书屋，1937年。
174. 施秀乔：《近代中国作家论》，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日期未详。
175. 珊珊（吴继岳）：“回忆郁达夫”，《知识天地》第9、10期合

刊,新加坡,1976年12月,页32—37。

176. 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
177. 柔密欧·郑:“郁达夫在望嘉丽”,《当代文艺》第80期,香港高原出版社,1972年7月,页43—47。
178. 柳存仁:《人物谭》,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
179. 贺玉波:《郁达夫编》,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
180. 费通等译, Malinowski 著:《文化论》(附吴文藻著“论文化表格”),台北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1967年台一版。
181. 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明报》月刊第96—106期,香港,1973—1974年。
182. 胡浪漫:“读《郁达夫选集》后函编者”,《星洲日报》“文化”版,1977年11月7日。
183.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
184. 钟祺:“战后马华诗歌发展一瞥一九四六—一九六四年”,《南洋学报》第19卷第一、二合辑,新加坡,1965年,页23—47。
185. 高云览:“《小城春秋》的写作经过”,《小城春秋》附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315—317。
186. 高湖:“郁达夫论马华文化界”,《星洲日报》“文化”版,1972年9月26日。
187. 一一:《忆农庐杂文》,香港中流出版社,1973年。
188. 谢冰莹:《作家印象记》,台北三民书局,1967年初版,1969年再版。
189. 谢克等编:《新马文艺创作索引》,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暨南大毕业生协会,1969年。
190. 诸家:《中国新文学大系》(一至十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
191. 一一:《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一至十册),香港文学研究社,1968年。
192. 一一:《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东京株式会社大安影印,1966年)。
193. 一一:《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1975年。
194.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年。
195. 郭沫若:“论郁达夫”,《历史人物》,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47

年初版，1956年新版。

196. ——：“再论郁达夫”，《天地玄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
197. 郭湘章译，Victor Purcell原著：《东南亚之华侨》（上、下），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初版，1967年二版。原著见页197注278。
198. 袁涌进：《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
199. 莫洛：《记十二年来（1937——48年）死难的文化工作者》，上海，1948年。
200.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初版，1974年三版，页79—106。
201. ——：《文学的前途》，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初版，1976年三版。
202. 曹聚仁等：《现代作家传略》，香港一新书店，出版日期未详。
203. ——：《采访外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4年。
204. ——：《文坛五十年》（正，续集），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年。
205. 铃木正夫：“马华文学と中国及び中国文学”，《野草》第18号，日本，1976，页14—34。
206. ——作，杜国清译：“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住在苏门答腊的日本人的证言”，《纯文学》总第49期，台湾纯文学月刊社，1971年1月，页40—64。
207. 康培初：《文学作家时代》，香港文学研究社，1973年。
208. 萧公畏（萧遥天）：“马华文坛轮廓纵横谈”，刘问渠编：《1910——1960这半个世纪：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檳城光华日报社，1960年，页109—114。
209. 梁子衡：《华侨社会研究》，香港海潮出版社，1958年。
210. 梁山：“战前的几个副刊编辑”，《星洲日报》“星云”版，1976年12月30日。
211. ——：“再谈战前的几个副刊编辑”，《星洲日报》“星云”版，1977年1月17日。
212. 黄文贵：“‘七七’抗战星华知识份子与救亡活动”，《新社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新加坡新社，1970年9月，页16—18。
213. 黄枝莲：《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71年。
214. ——：《马华历史调查研究绪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72年。

215. 黄俊东：《现代中国作家剪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3年。
216. 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年。
217. 黄奕荣：“战后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编目”，《南洋学报》第14期，1958年12月，页51—56。
218. 黄锦池：《中外文学家辞典》，香港世界出版社，1957年。
219. 傅东华：“十年来的中国文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页659—686。
220. ——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
221. ——编：《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222. ——译，亨德原著：《文学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
223. 傅紫曦：“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加坡”，《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38年1月1日。
224. 温梓川：“郁达夫别传”，《蕉风》第143—163期，吉隆坡，1964—1966年。
225. ——：“马来亚文学与文化的形成”，《蕉风》第115期，1962年5月，页3。
226. ——编：《郁达夫南游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6年。
227. ——：“郁达夫三宿槟城”，《文人的另一面》，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年，页138—143。
228. 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7年（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大安影印）。
229. 葛凡：“郁达夫之死”，《星洲日报》“文化”版，1975年8月13日。
230. 鲁人：“郁达夫的子女”，《南洋商报》“商余”版，新加坡，1967年5月27日。
231. 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人民文学》第91期，1957年5月、6月，页184—204。
232. 新南洋出版社编：《新南洋年鉴》，新加坡，1947年。
233.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新加坡和平出版社，1946年。
234. 蒋保：“马华文艺的时代性与独立性”，《蕉风》半月刊，第44期，马来亚，1957年8月25日，页4—5。
235.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年。
236. ——：“新马华文学概论”，《新加坡文艺》第4期，新加坡，1976年9月，页33—40。
237. ——：“论二十年来的马华文学思潮”，《南洋商报》第25卷第2期，新加坡，1970年12月，页91—99。

238. ——(以多):“战后马华小说底收获”,《新社文艺》第14期,新加坡,1970年6月,页16—24。
239. ——(以多):《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59年。
240. 赵承榜:“南侨二十三年”,《南侨女子中学创校二十三周年暨新校舍落成纪念特刊》,1970年11月。
241. 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
242. 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香港中国笔会,1975年初版,1976年再版。
243. ——:《五四文坛点滴》,香港友联出版社,1964年初版,1973年再版。
244. ——:“浪漫作家郁达夫”(蕉风)第43期,吉隆坡,1957年8月10日,页4—5。
245. 颜开:《诗人郁达夫》,香港宜斋书屋,1965年。
246. 黎烈文:“关于郁达夫”,《南侨日报》第8版,新加坡,1947年12月17日。
247. 霞山会编:《现代中国人名辞典》,日本财团法人霞山会,1966。
248. 戴望舒译,提格亨著:《比较文学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初版,1972年三版。
249. 韩萌编:《南洋散文集》,香港求实出版社,1950年初版,1951年再版。
250. 《南洋商报》1927——1941年9月/1945——1948年。
251. 《星洲日报》1929——1941年9月/1945——1948年。
252. 《华侨日报》1945年9月——1946年4月。
253. 《南侨日报》1946年——1948年。
254. 《南侨晚报》1947年——1948年。
255. 《风下周刊》合订本(胡愈之主编)1947年2月——1948年6月。
256. 《文艺生活》新四卷合订本(司马文森主编),香港智源书局,1948年(海外版第1—4集)。

二、英文部分

257.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1960.
258. Doležalová, Anna. Yü Ta-fu: Specific Traits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 Czechoslovakia: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71.
259. Ee Joyce. "Chinese Migration to Singapore, 1896 - 1941", Journal Southeast Asia History Vol 2 No. 1. Singapore: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March 1961. pp. 33-51.
260. Gibbs, Donald A. and Yun-chen Li.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8 - 194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61. Goldman, Merle.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62. Hsia C.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 - 195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263. Hsia Tsi-a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264. Hsü Kai-yü.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Originally printed by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4.
265. Huang Sung-kang. Lu Hsü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 Amsterdam Djambatan, 1957.
266. Hu Pu-yu. A Brief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 Taipei: Chung Wu Publishing Co., 1974.
267. Israel, Joh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 - 1937.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1966.
268. Jessy, Joginder Singh.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1400 - 1965. Singapore: Longman Malaysia Sdn Berhad, 1974.
269. Klein, Donald W. and Anne B. 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 - 196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70. Lang, Olga. Pa Chin and His Writings: 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71. Lee Ou-fan Leo.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72. Ly Sing-ko. 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With a Forward by Han Suyin). Hong Kong: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1975. 1st published, 1967.
273. Max, Perleberg. Who's Who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to the End of 1953). Hong Kong: Ye Olde Printerie, Ltd., 1954.

274. McDougall, Bonnie 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 - 1925.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 Cultural Studies, 1971.
275. Png Poh Seng. "The Kuomintang in Malaya, 1912 - 1941", Journal Southeast Asia History Vol 2 No. 1. Singapore: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March 1961. pp. 1-32.
276.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st published 1948.
277. _____. 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0 (Revised). 1st published, 1956.
278. _____.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st published, 1951.
279. Schurmann, Frenz and Orville Schell. Republican China: Nationalism, War,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m, 1911 - 1949. London: Penguin, 1967.
280. Schyns, Joseph and 苏雪林, 赵燕声 ed. 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48. Reprinted by 龙门书店, 1966.
281. Shu, Austin C.W. Modern Chinese Authors: A List of Pseudonyms. East Lansing, Michigan: Asian Studies Centr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9.
282. Simson, Ivan. Singapore: Too Little, Too Late: The Failure of Malaysia's Defences in 1942. 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0.
283. Slupski, Zbigniew. 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 Analysis of Lao She's Fiction. Prague: Oriental Institute in Academia, 1966.
284. _____. "The Work of Lao She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His Career (1924 - 1932)", Jaroslav Průšek ed.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4. pp. 77-95.
285. Stallknecht N.P. and H. Frenz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I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 Press, 1971.
286. Tagore, Amitendranath. Literary Debates in Modern China, 1918 - 1937.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67.
287. Tan S.H. (Mrs). "A Note on Malayan Chinese Newspapers", Malaysian Historical Sources, ed by K.G. Tregonning. Singapore: History Dept.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2. pp. 93-94.
288.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ed.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Vol 1 and 2.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and 1970.
289. Vohra, Ranbir.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290.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 in Malaya", T. Wignesan ed.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n Literature 1930 - 1963). Kuala Lumpur: Anthony Blond with Rayirath (Ray Books) Publication, 1964. pp. 249-256.

291.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London: Penguin, 1970. 1st published in USA, 1949.
292. Wong Yoon-wah. A Study of Yü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Malaya, and Sumatra, 1939 - 1945. (Manuscript), 1969.
293. Yefimov, D. World War Two and As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5.



后 记

1976年4月初，在王润华先生建议下，拟定了“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这个专题研究。王先生觉得在新加坡研究中国文学，最终目标一定要本地化，以新加坡人的立场及眼光，来作为出发点，这样比较有收获，而且有意义。

研究开始后，碰到很多资料搜集上的困难。资料不全，不免影响归纳分析工作的进行。由于战火（新加坡沦陷）的洗礼，许多战前的资料淹没了；由于人为的因素，战后文艺界不少史料与文献也莫名其妙地散失。若干作品集只闻其名，不得其书（象吴天的《怀祖国》、陈残云的《南洋伯还乡》、夏衍的《劫余随笔》、巴人的《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尽管找老作家、遍访国家图书馆、南大及星大图书馆，甚至到历史悠久的华侨中学图书馆，都不得要领。我生也晚，无缘一读，委实遗憾！

由于本论文是个新鲜的题目，前人从未作过系统的探讨，可资参考的书面研究微乎其微，因此，必须广泛披阅原始资料，从旧报章下手。另一方面，我尽可能汲取口头资料，听前辈追忆点点滴滴的故实，补充书面的资料。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为了章节的连贯，为了某一问题的质疑，握笔长思，个中甘苦，真如蚕之饱吃桑叶，吐丝织茧！

整个写作，得到指导老师润华博士的全力帮助、悉心评改。至于协助解决文坛故实的，要谢谢方修先生、施香沱先生、李向先生、李汝琳先生、王秋田先生等。此外，星大中文图书馆许国华主任、南大图书馆许毓义主任、国家图书馆东南亚室及南洋商报资料室诸位负责人、华侨中学校长与图书馆主任，慨允借阅书籍与显微影片，更是情不可殒。又，蒙诸多友好及学生多方协助蒐寻旧籍、影印并抄录资料，合应在此特别志谢。

1978年1月南洋大学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
林万菁 著

出版：万里书局
地址：G-40,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 7.
承印：东艺印务公司
日期：1978年12月
定价：S \$ 5.00
